

夜行军：与印度革命游击队同行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又称纳萨尔派，是目前仍然活跃在印度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武装组织。本书《夜行军·与印度革命游击队同行》讲述了作者阿尔帕·沙阿（Alpa Shah）在 2010 年与纳萨尔派游击队的一次连续七天的夜晚行军，以及作者在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居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经历。

目录

夜行军：与印度革命游击队同行	1
前言	13
参考	23
第一部分：深入地下	23
参考	31
半个世纪的武装抵抗（一）	32
参考	39
半个世纪的武装抵抗（二）	40
参考	52
半个世纪的武装抵抗（三）	52
参考	60
居于泥屋	60
参考	67
第二部分：普拉桑特，羊群中的孩子	67
参考	75

第二节：林中之城.....	75
第三节：女扮男装.....	81
第三部分：吉安吉，敏捷的心灵.....	89
第一节：第一夜.....	90
第二节：牺牲、放弃、解放与暴力.....	99
参考.....	104
第二节：牺牲、放弃、解放与暴力（中）.....	104
第二节：牺牲、放弃、解放与暴力（下）.....	116
照片.....	129
第四部分：科利的“家外之家”.....	133
参考.....	143
第二节：平等主义的理想、人文关怀和亲密关系.....	143
参考.....	168
第三节：第三夜.....	168
第五部分：维卡斯：缝合的人生.....	176
第一节：第四夜.....	176
参考.....	185
第二节：加速与国家和资本的接触.....	185
第三节：第五夜.....	215
参考.....	220
第六部分：索玛尔：摆脱父权制的枷锁.....	220
第一节：仍在第五夜.....	220

参考	225
第二节：性别，世代，阶级和种姓（上）	225
参考	235
第三节：第六夜	235
参考	239
第七部分：预言	239
第一节：第七夜	239
参考	256
第二节：化身	256
参考	264

2008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里，在贾坎德邦（Jharkhand）树木丛生的丘陵中，我通过三个岗哨，来到了村庄里一个孤零零的泥屋。泥屋里有一个微微秃顶、说话轻声细语的中年男子，他的代号是“吉安吉（Gyanji）”。同屋外守卫着这位领袖的游击队员们一样，吉安吉穿着橄榄绿的制服，他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都装在一个小背包里。但在煤油灯发散的昏暗光线中，我注意到他柔软的浅色脚底。我在那里的森林里生活了几年，我知道这二十五年里，吉安吉一直在与世隔绝的印度落后农村地区奔波，极少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在森林里露天而眠也是常事。但与外边的士兵们宽大黝黑、如他们出生以来赤脚踏上的红土一般粗糙干裂的脚底不同，因为小时候在高种姓的父母家里得到的保护和照顾，吉安吉的双脚还是柔软的。

在山区，森林中回荡着那格普利亚（Nagpuria）当地语言歌一般的韵律，在这里，会说印度主流语言——印地语的人都很稀罕。在这样的环境下，吉安吉流利的英语便也就显得不同寻常。我发现他能背诵雪莱和萧伯纳的作品，他还有一个数学硕士学位。他的兄弟姐妹里，有一位银行职员，一个会计，还有一个移民到加拿大的计算机科学家。只有吉安吉偏离了父母为他们铺设的通向中上层的道路——他被大学里洋溢的革命氛围和三十年前席卷全印度的农民起义所鼓舞，在二十四岁那年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宣誓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与一群男男女女一同放弃了舒适的家庭和大学课堂，同自己出身的高阶级和高种姓决裂，加入到马列主义革命的悠久传统中，决心为反抗压迫、不公正和不平等而斗争，去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他们就像是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中巴黎的示威者和美国反主流文化的辍学者们——不过对西方的许多人来说，激进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归宿，但对吉安吉和他的同志们来说，这是一个改变一生的选择。今天，这群人称他们自己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也叫纳萨尔派，或者毛派——他们正领导着当今世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革命运动。

虽然他们只是一支不到一万人的武装力量，而且现在主要局限于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山区和森林里，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纳萨尔派叛军一直困扰和嘲弄着印度政府。他们的“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步兵主要来自印度的部落社区，他们被称为阿迪瓦西人^[1]。阿迪瓦西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

8.6%，共 1 亿多人，与德国或越南的人口数差不多。他们被统治种姓和阶级视为“野蛮”和低贱的人。几个世纪以来，阿迪瓦西人居于印度社会的边缘。他们在丛林中靠耕种他们仅有的一点土地生存，靠打猎、采集水果和花草等森林资源为生，他们伐木来建造他们的房屋、为炉灶提供燃料以及制作他们的犁和锄头。如今，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国家和公司挤出森林故土，他们每年都要有几个月迁徙到大小城镇的建筑工地和工厂打工。在那里，他们被拉去从事最艰苦、最劳累和最危险的工作，用他们廉价的劳动力来为印度经济繁荣提供燃料。

阿迪瓦西士兵们战斗的目标往往和吉安吉这样的领导所持的抽象理念相差甚远。在大的方面上，他们的斗争是为了争取部落自治，反对他们认为充满压迫、残暴和偏见的国家。不过具体到每位阿迪瓦西人个体，他们加入毛派队伍的原因常常包含着更多的个人因素。举个例子，科利（Kohli）是一位温柔善感的十六岁阿迪瓦西青年，他皮肤黝黑光亮，笑容腼腆，和他的步枪差不多一样高；他有一回在被派去当我的保镖时，坚持要帮我拿行李。他在他父亲的茶馆工作时，因为一杯打翻的牛奶与父亲发生了琐碎的争斗，便跑到游击队那里去住。阿迪瓦西青年们没有像吉安吉那样与过去决裂，而是在游击队里找到了一个家外之家，他们经常像拜访叔叔婶婶一样搬进搬出。

而对于新德里的政府来说，吉安吉和科利不过都是恐怖分子罢了，他们是国家必须要切除的肿瘤。在叛军发起革命的 50 年后，印度的媒体和

政府机构又因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在中部的恰蒂斯加尔邦巡逻修路工地时遭到袭击而再次陷入反毛派的狂热。2017年4月25日和26日，二十六名士兵的尸体被包裹在印度三色旗中，并用大多数印度教仪式中使用的花——金盏花来装饰。他们从苏克玛（Sukma）县的森林（译注：战斗发生的地点）中被空运到遥远的家乡火葬场，从喜马拉雅山麓到700多英里外的亚穆纳（Yamuna）河畔。加入安全部队是农村人摆脱赤贫的途径之一，因此这些士兵中许多人的背景与杀死他们的游击队员一样贫困。

而这只是纳萨尔派和印度政府间众多血腥冲突中的一例。近年来，起义者攻击安全部队、使进入他们封锁区的火车脱轨、杀死他们认定的警方线人，并在他们的“人民法庭”上进行即决审判。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全国的电视频道经常用“最新恐怖袭击”作为新闻标题，它们在印度中产阶级中制造恐惧气氛——对他们而言，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农村地区现在是“禁区”。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及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发布的《恐怖主义问题年度国别报告》收集的数据显示，按2016年袭击总数计算，印共（毛）是全球第三大高产恐怖组织，仅次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和“塔利班”

^[2]。

最近一次印度政府军打击叛军的行动开始于十年前。2006年，在我以社会人类学家的身份开始在他们的游击队据点生活的两年前，也是三大纳萨尔派武装组织联合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两年后，当时的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宣布这支叛军是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并给了他们“恐怖分子”的名号。这标志着新一轮追捕毛主义分子和压制其同情者与支持者的安全行动。印度情报机构声称，印度40%的土地面积受到影响，包括28个邦中的20个邦和640个县中的223个县，这画出了一条从北部尼泊尔边境到南部安得拉邦的“红色走廊”。这些数字很难核实，可能被夸大以证明增加安全和国防预算的合理性。实际上，政府派出了超过10万名士兵包围了印共毛游击队在该国中部和东部的根据地。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中队的直升机和特种部队，这些特种部队有着“眼镜蛇”、“贾坎德美洲豹”、“灰狗”等匪夷所思的名字，他们在丛林战学校接受过训练，有自己的一套与游击队作战的战术。

人权活动家们争辩说，在政府摧毁纳萨尔派、“教化”阿迪瓦西人们的欲望背后，是他们想要清理这些地区以开发矿业的企图^[3]。在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奥里萨邦（Odisha）、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和特伦甘纳邦（Telangana）的阿迪瓦西人所处的森林之下，蕴藏着印度最丰富的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铜、锰、云母等资源。商业分析人士称，印度的采矿业拥有广阔的前景。大公司们纷纷签订协议来开发资源，购得土地用于采矿作业、修建钢铁厂和发电厂。米塔尔集

团 (Mittal)、埃萨集团 (Essar)、瓦达塔有限公司 (Vedanta)、力拓集团 (Rio Tinto Group)、浦项制铁 (POSCO) 都在尝试进行着这一类的开发活动。但阿迪瓦西人在殖民时代反抗得来的历史性法律规定, 禁止轻易将他们的土地售卖给非阿迪瓦西人——所谓的外来者。阿迪瓦西人, 以及生活在他们之中的纳萨尔派, 径直堵在了印度经济蓬勃发展的道路中央。

在我住的游击队所在的村庄里, 安全部队的搜寻和打击任务反而制造了恐怖气氛。当巡逻队上山时, 那些能逃的人都逃到了邻近的村庄。据称, 为了在森林里搜寻毛主义者, 安全部队把村民当作肉盾或线人使用。还有一些被卷入交火现场的人在突袭中遭到士兵的残酷殴打, 还被指控窝藏叛乱分子。越战电影中的情节在印度的森林中经常上演。和越南一样, 印度的将军们也会向媒体吹嘘更高的“战损比”。“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援引的印度内政部的数据表明, 在过去十年中, 有 7500 多人被杀, 其中 57% 是平民, 23% 是安全部队, 20% 是毛派^[4]。

在苏克马袭击事件发生后, 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 (Rajnath Singh) 召集政府部长、警察、安全部队和情报机构召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 以策划一场强势的平叛计划。“我们要把‘侵略性’加入到我们的政策里。要有侵略性的思考、侵略性的策略、侵略性的兵力部署、侵略性的行动, 以及, 侵略性的道路建设。”拉杰纳特·辛格如是说^[5]。政府承诺的最终目标是: 在安全和发展两条战线协调作战, 战斗到底, 誓言胜利。

新德里政府过去曾经多次承诺过要消灭毛派分子，但毛派却继续存在着。每年 11 月，在森林中的根据地里，毛派举办“烈士周”纪念先烈。游击队在林中空地上举行短暂的集会，两边挂着一行行绉纸做的彩旗，烈士的纪念物上盖着红布。结束以后，他们必须抹去所有痕迹，以躲避安保部队。然而，当他们升起画着镰刀锤子的红旗、唱着社会主义的颂歌《国际歌》的时候，他们所缅怀的那千万名死者在革命的精神中重生了。

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游击队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武装起义似乎是不合时宜的。那么究竟为什么这场斗争会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非暴力反抗”的发源地、将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印度的核心地带持续存在？这场斗争是怎么进行的？

我与游击队的交集发生在 1999-2002 年我的博士田野调查即将结束时，那时候他们开始进入我当时生活的贾坎德邦的阿迪瓦西农村地区。当时，我把他们看作是地头蛇，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并无二致，都以暴力相威胁，向国家发展计划和大企业勒索保护费。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当我从伦敦继续跟踪他们的进展时，我惊奇地发现竟有如此多的阿迪瓦西人加入了毛派，并决定必须了解其中的原因。

我知道，我应当回到贾坎德邦进行民族志研究，并且以社会人类学的标志性方法——“参与式观察”，用至少一年的时间长期深入到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以尽可能全面的方式通过

他们的观点以及行动了解和体验世界。进行这种长期的开放式田野调查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可以超越那些仅基于几天的采访和考察就草率形成的对毛派的印象。以前对类似情况（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秘鲁的“光辉道路”叛乱）的这种研究常常声称，人们是被夹在了两支军队之间，他们支持革命是被逼迫的，或是因为一些功利性的好处，又或是游击队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长期的冤屈。看来，显然只有在游击队根据地与阿迪瓦西社群呆在一起，才能更加细致地理解他们的困境。但直到2008年，不巧正值印度政府发起新一轮的平叛行动，我也终于得以回到贾坎德邦。

我并没有带着很大的野心前往：我打算在阿迪瓦西人中间度过一段时间，以理解在这场据称要更为平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运动的背景下，他们的生活是怎样改变的。我并没有指望见到游击队，更不要说和他们打交道了。但在我呆在那里的时间里，我很快意识到游击队无处不在——在每一间房屋，在每一座村庄，在每一片森林。我碰巧住在纳萨尔派眼中的“红色首都”，印度两个游击队根据地之一。随着国家平叛行动的升级，外人被禁止在没有安全部队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击区。那些敢于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冒险进入的人很少停留超过几个小时，最多也只有几天。

随着局势越来越危险，我开始考虑返回伦敦。但在红色首都遇到的人的故事已经深深地把我吸引进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我必须更秘密地进行这项任务。这份田野调查已经比我之前所能想象的更为任重道远。

“夜行军”指的是 2010 年我与纳萨尔派游击队的一个排一起在新一轮的密集平叛行动中意外进行的一次的七夜徒步行军，那时我像男性一样身穿橄榄绿游击队制服。我作为唯一的女性和唯一没有武器的人，与一群游击队员一起在夜幕的掩护下走了 250 公里，从印度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本书围绕这次行军展开，讲述了我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在阿迪瓦西人中间生活的四年半时间——其中一长段时间是在游击队根据地外，其他时候是在根据地内。“夜行军”是我进入这个次大陆底层的旅程的开始——我要去了解在闪亮的“新印度”表象背后，为什么一些穷人逃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去和革命思想家联合，拿起武器去反抗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本书介绍了世界上最令统治者头痛和最缺乏报道的反叛之一，反思了为何一场看似失败的革命能在印度经久不衰，又在哪些方面遭到了削弱。这本书也展现了在不断激化的矛盾中，革命热情如何维持，又如何面临挑战。

《夜行军》既关注思想家的愿景，也关注那些加入他们的穷困农村社群。这本书的核心是游击队领导和他们的士兵之间长久相处之中的那些微妙、复杂和讽刺的事。

《夜行军》展现了年轻部落男孩们的故事：他们出生在泥屋里，为了工作季节性迁徙——在遥远的砖窑里肩扛砖头，建造“崭新印度”的摩天大楼——但也在游击队的队伍中行进、朗诵诗歌、唱革命歌曲、手持武器。

它也讲述了那些有良好家境和教育的印度人的故事：当国家的不平等触动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安全的家，为了更高的理想而长年转入地下工作。

然而，它也是部分青年们的故事：他们在游击队中学习读书识字，长大后却有了更平凡的梦想——有钱在城市里买一块地，盖两层砖房，把孩子送进说英语的私立学校——并最终背叛了游击队。

它也是女性们的故事：她们奔向革命大家庭，希望找到更平等的家园；她们也在游击队的等级制度中与父权制斗争。

这也是那些生活被游击队和平叛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所撕裂的村民们的故事：他们转向印度教极右翼组织的精神教派寻求慰藉。

简而言之，《夜行军》不仅展示了为什么来自相当不同背景的人会共同拿起武器改变世界，也讲述了是什么让他们分崩离析、反目成仇、转而反对自己原本的目标。本书是对解放的雄心、革命的热情和游击队行动中的那些矛盾、局限和悖论的思考。本书突出了那些选择了革命道路以

使世界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和改革者们面对的根本困局。尽管他们不畏牺牲、全心投入，他们的理想还是被自己的人性弱点所破坏。这反映了当代印度心脏的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权利被剥夺和冲突。

前言

2008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里，在贾坎德邦（Jharkhand）树木丛生的丘陵中，我通过三个岗哨，来到了村庄里一个孤零零的泥屋。泥屋里有一个微微秃顶、说话轻声细语的中年男子，他的代号是“吉安吉（Gyanji）”。同屋外守卫着这位领袖的游击队员们一样，吉安吉穿着橄榄绿的制服，他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都装在一个小背包里。但在煤油灯发散的昏暗光线中，我注意到他柔软的浅色脚底。我在那里的森林里生活了几年，我知道这二十五年里，吉安吉一直在与世隔绝的印度落后农村地区奔波，极少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在森林里露天而眠也是常事。但与外边的士兵们宽大黝黑、如他们出生以来赤脚踏上的红土一般粗糙干裂的脚底不同，因为小时候在高种姓的父母家里得到的保护和照顾，吉安吉的双脚还是柔软的。

在山区，森林中回荡着那格普利亚（Nagpuria）当地语言歌一般的韵律，在这里，会说印度主流语言——印地语的人都很稀罕。在这样的环境下，吉安吉流利的英语便也就显得不同寻常。我发现他能背诵雪莱和萧伯纳的作品，他还有一个数学硕士学位。他的兄弟姐妹里，有一位银

行职员，一个会计，还有一个移民到加拿大的计算机科学家。只有吉安吉偏离了父母为他们铺设的通向中上层的道路——他被大学里洋溢的革命氛围和三十年前席卷全印度的农民起义所鼓舞，在二十四岁那年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宣誓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与一群男男女女一同放弃了舒适的家庭和大学课堂，同自己出身的高阶级和高种姓决裂，加入到马列主义革命的悠久传统中，决心为反抗压迫、不公正和不平等而斗争，去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他们就像是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中巴黎的示威者和美国反主流文化的辍学者们——不过对西方的许多人来说，激进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归宿，但对吉安吉和他的同志们来说，这是一个改变一生的选择。今天，这群人称他们自己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也叫纳萨尔派，或者毛派——他们正领导着当今世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革命运动。

虽然他们只是一支不到一万人的武装力量，而且现在主要局限于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山区和森林里，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纳萨尔派叛军一直困扰和嘲弄着印度政府。他们的“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步兵主要来自印度的部落社区，他们被称为阿迪瓦西人^[1]。阿迪瓦西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8.6%，共1亿多人，与德国或越南的人口数差不多。他们被统治种姓和阶级视为“野蛮”和低贱的人。几个世纪以来，阿迪瓦西人居于印度社会的边缘。他们在丛林中靠耕种他们仅有的一点土地生存，靠打猎、采集水果和花草等森林资源为生，他们伐木来建造他们的房屋、为炉灶

提供燃料以及制作他们的犁和锄头。如今，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国家和公司挤出森林故土，他们每年都要有几个月迁徙到大小城镇的建筑工地和工厂打工。在那里，他们被拉去从事最艰苦、最劳累和最危险的工作，用他们廉价的劳动力来为印度经济繁荣提供燃料。

阿迪瓦西士兵们战斗的目标往往和吉安吉这样的领导所持的抽象理念相差甚远。在大的方面上，他们的斗争是为了争取部落自治，反对他们认为充满压迫、残暴和偏见的国家。不过具体到每位阿迪瓦西人个体，他们加入毛派队伍的原因常常包含着更多的个人因素。举个例子，科利（Kohli）是一位温柔善感的十六岁阿迪瓦西青年，他皮肤黝黑光亮，笑容腼腆，和他的步枪差不多一样高；他有一回在被派去当我的保镖时，坚持要帮我拿行李。他在他父亲的茶馆工作时，因为一杯打翻的牛奶与父亲发生了琐碎的争斗，便跑到游击队那里去住。阿迪瓦西青年们没有像吉安吉那样与过去决裂，而是在游击队里找到了一个家外之家，他们经常像拜访叔叔婶婶一样搬进搬出。

而对于新德里的政府来说，吉安吉和科利不过都是恐怖分子罢了，他们是国家必须要切除的肿瘤。在叛军发起革命的 50 年后，印度的媒体和政府机构又因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在中部的恰蒂斯加尔邦巡逻修路工地时遭到袭击而再次陷入反毛派的狂热。2017 年 4 月 25 日和 26 日，二十六名士兵的尸体被包裹在印度三色旗中，并用大多数印度教仪式中使用的花——金盏花来装饰。他们从苏克玛（Sukma）县的森林（译注：

战斗发生的地点) 中被空运到遥远的家乡火葬场, 从喜马拉雅山麓到 700 多英里外的亚穆纳 (Yamuna) 河畔。加入安全部队是农村人摆脱赤贫的途径之一, 因此这些士兵中许多人的背景与杀死他们的游击队员一样贫困。

而这只是纳萨尔派和印度政府间众多血腥冲突中的一例。近年来, 起义者攻击安全部队、使进入他们封锁区的火车脱轨、杀死他们认定的警方线人, 并在他们的“人民法庭”上进行即决审判。在报道这些事件时, 全国的电视频道经常用“最新恐怖袭击”作为新闻标题, 它们在印度中产阶级中制造恐惧气氛——对他们而言, 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农村地区现在是“禁区”。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及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发布的《恐怖主义问题年度国别报告》收集的数据显示, 按 2016 年袭击总数计算, 印共(毛) 是全球第三大高产恐怖组织, 仅次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 (ISIS)”和“塔利班”

^[2]。

最近一次印度政府军打击叛军的行动开始于十年前。2006 年, 在我以社会人类学家的身份开始在他们的游击队据点生活的两年前, 也是三大纳萨尔派武装组织联合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的两年后, 当时的总理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 宣布这支叛军是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 并给了他们“恐怖分子”的名号。这标志着新一轮追捕

毛主义分子和压制其同情者与支持者的安全行动。印度情报机构声称，印度 40%的土地面积受到影响，包括 28 个邦中的 20 个邦和 640 个县中的 223 个县，这画出了一条从北部尼泊尔边境到南部安得拉邦的“红色走廊”。这些数字很难核实，可能被夸大以证明增加安全和国防预算的合理性。实际上，政府派出了超过 10 万名士兵包围了印共毛游击队在该国中部和东部的根据地。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中队的直升机和特种部队，这些特种部队有着“眼镜蛇”、“贾坎德美洲豹”、“灰狗”等匪夷所思的名字，他们在丛林战学校接受过训练，有自己的一套与游击队作战的战术。

人权活动家们争辩说，在政府摧毁纳萨尔派、“教化”阿迪瓦西人们的欲望背后，是他们想要清理这些地区以开发矿业的企图^[3]。在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 (Chhattisgarh)、奥里萨邦 (Odisha)、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 和特伦甘纳邦 (Telangana) 的阿迪瓦西人所处的森林之下，蕴藏着印度最丰富的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铜、锰、云母等资源。商业分析人士称，印度的采矿业拥有广阔的前景。大公司们纷纷签订协议来开发资源，购得土地用于采矿作业、修建钢铁厂和发电厂。米塔尔集团 (Mittal)、埃萨集团 (Essar)、瓦达塔有限公司 (Vedanta)、力拓集团 (Rio Tinto Group)、浦项制铁 (POSCO) 都在尝试进行着这一类的开发活动。但阿迪瓦西人在殖民时代反抗得来的历史性法律规定，禁止轻易将他们的土地售卖给非阿迪瓦西人——所谓的外来者。阿迪瓦

西人，以及生活在他们之中的纳萨尔派，径直堵在了印度经济蓬勃发展的道路中央。

在我住的游击队所在的村庄里，安全部队的搜寻和打击任务反而制造了恐怖气氛。当巡逻队上山时，那些能逃的人都逃到了邻近的村庄。据称，为了在森林里搜寻毛主义者，安全部队把村民当作肉盾或线人使用。还有一些被卷入交火现场的人在突袭中遭到士兵的残酷殴打，还被指控窝藏叛乱分子。越战电影中的情节在印度的森林中经常上演。和越南一样，印度的将军们也会向媒体吹嘘更高的“战损比”。“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援引的印度内政部的数据表明，在过去十年中，有 7500 多人被杀，其中 57% 是平民，23% 是安全部队，20% 是毛派^[4]。

在苏克马袭击事件发生后，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 (Rajnath Singh) 召集政府部长、警察、安全部队和情报机构召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以策划一场强势的平叛计划。“我们要把‘侵略性’加入到我们的政策里。要有侵略性的思考、侵略性的策略、侵略性的兵力部署、侵略性的行动，以及，侵略性的道路建设。”拉杰纳特·辛格如是说^[5]。政府承诺的最终目标是：在安全和发展两条战线协调作战，战斗到底，誓言胜利。

新德里政府过去曾经多次承诺过要消灭毛派分子，但毛派却继续存在着。每年 11 月，在森林中的根据地里，毛派举办“烈士周”纪念先烈。游击队在林中空地上举行短暂的集会，两边挂着一行行绉纸做的彩旗，烈

士的纪念物上盖着红布。结束以后，他们必须抹去所有痕迹，以躲避安保部队。然而，当他们升起画着镰刀锤子的红旗、唱着社会主义的颂歌《国际歌》的时候，他们所缅怀的那千万名死者在革命的精神中重生了。

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游击队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武装起义似乎是不合时宜的。那么究竟为什么这场斗争会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非暴力反抗”的发源地、将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印度的核心地带持续存在？这场斗争是怎么进行的？

我与游击队的交集发生在 1999-2002 年我的博士田野调查即将结束时，那时候他们开始进入我当时生活的贾坎德邦的阿迪瓦西农村地区。当时，我把他们看作是地头蛇，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并无二致，都以暴力相威胁，向国家发展计划和大企业勒索保护费。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当我从伦敦继续跟踪他们的进展时，我惊奇地发现竟有如此多的阿迪瓦西人加入了毛派，并决定必须了解其中的原因。

我知道，我应当回到贾坎德邦进行民族志研究，并且以社会人类学的标志性方法——“参与式观察”，用至少一年的时间长期深入到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以尽可能全面的方式通过他们的观点以及行动了解和体验世界。进行这种长期的开放式田野调查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可以超越那些仅基于几天的采访和考察就草率形成的对毛派的印象。以前对类似情况（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秘鲁

的“光辉道路”叛乱)的这种研究常常声称,人们是被夹在了两支军队之间,他们支持革命是被逼迫的,或是因为一些功利性的好处,又或是游击队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长期的冤屈。看来,显然只有在游击队根据地与阿迪瓦西社群呆在一起,才能更加细致地理解他们的困境。但直到2008年,不巧正值印度政府发起新一轮的平叛行动,我也终于得以回到贾坎德邦。

我并没有带着很大的野心前往:我打算在阿迪瓦西人中间度过一段时间,以理解在这场据称要为更平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运动的背景下,他们的生活是怎样改变的。我并没有指望见到游击队,更不要说和他们打交道了。但在我呆在那里的时间里,我很快意识到游击队无处不在——在每一间房屋,在每一座村庄,在每一片森林。我碰巧住在纳萨尔派眼中的“红色首都”,印度两个游击队根据地之一。随着国家平叛行动的升级,外人被禁止在没有安全部队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击区。那些敢于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冒险进入的人很少停留超过几个小时,最多也只有几天。

随着局势越来越危险,我开始考虑返回伦敦。但在红色首都遇到的人的故事已经深深地把我吸引进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我必须更秘密地进行这项任务。这份田野调查已经比我之前所能想象的更为任重道远。

“夜行军”指的是 2010 年我与纳萨尔派游击队的一个排一起在新一轮的密集平叛行动中意外进行的一次的七夜徒步行军，那时我像男性一样身穿橄榄绿游击队制服。我作为唯一的女性和唯一没有武器的人，与一群游击队员一起在夜幕的掩护下走了 250 公里，从印度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本书围绕这次行军展开，讲述了我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在阿迪瓦西人中间生活的四年半时间——其中一长段时间是在游击队根据地外，其他时候是在根据地内。“夜行军”是我进入这个次大陆底层的旅程的开始——我要去了解在闪亮的“新印度”表象背后，为什么一些穷人逃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去和革命思想家联合，拿起武器去反抗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本书介绍了世界上最令统治者头痛和最缺乏报道的反叛之一，反思了为何一场看似失败的革命能在印度经久不衰，又在哪些方面遭到了削弱。这本书也展现了在不断激化的矛盾中，革命热情如何维持，又如何面临挑战。

《夜行军》既关注革命思想家的愿景，也关注那些加入他们的穷困农村社群。这本书的核心是游击队领导和他们的士兵之间长久相处之中的那些微妙、复杂和讽刺的事。

《夜行军》展现了年轻部落男孩们的故事：他们出生在泥屋里，为了工作季节性迁徙——在遥远的砖窑里肩扛砖头，建造“崭新印度”的摩天大楼——但也在游击队的队伍中行进、朗诵诗歌、唱革命歌曲、手持武器。

它也讲述了那些有良好家境和教育的印度人的故事：当国家的不平等触动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安全的家，为了更高的理想而长年转入地下工作。

然而，它也是部分青年们的故事：他们在游击队中学习读书识字，长大后却有了更平凡的梦想——有钱在城市里买一块地，盖两层砖房，把孩子送进说英语的私立学校——并最终背叛了游击队。

它也是女性们的故事：她们奔向革命大家庭，希望找到更平等的家园；她们也在游击队的等级制度中与父权制斗争。

这也是那些生活被游击队和平叛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所撕裂的村民们的故事：他们转向印度教极右翼组织的精神教派寻求慰藉。

简而言之，《夜行军》不仅展示了为什么来自相当不同背景的人会共同拿起武器改变世界，也讲述了是什么让他们分崩离析、反目成仇、转而反对自己原本的目标。本书是对解放的雄心、革命的热情和游击队行动中的那些矛盾、局限和悖论的思考。本书突出了那些选择了革命道路以使世界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和改革者们面对的根本困局。尽管他们不畏牺牲、全心投入，他们的理想还是被自己的人性弱点所破坏。这反映了当代印度心脏的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权利被剥夺和冲突。

- 翻译：镜鱼、酥酥狼

- 校对：三角贸易、食语虫、viu

参考

- ^阿迪瓦西人 (adivasi, 意为“最早的居民”), 被认为是印度的原住民之一, 在达罗毗荼人与印度雅利安人之前。但现今的许多阿迪瓦西社区是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衰落形成的, 与印度其他群体的血缘关系与交往历史尚不明确。
- ^来源 (作者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截取) :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 ^可以参考: Arundhati Roy 所著 (2011 年) : Broken Republic. (新德里 Hamish Hamilton 出版社) ; Nandini Sundar 所著 (2016 年) : The Burning Forest: India' s War in Bastar. (新德里 Juggernaut 出版社) ; Gautam Navlakha 所著 (2012 年) : Days and Nights in the Heartland of Rebellion. (新德里 Penguin 出版社) ; 另外, 也可以参考:
<https://www.forbes.com/forbes/2010/0510/global-2000-10-maoistsnaxalites-tata-steel-india-dirty-war.html>
- ^来源 (作者于 2018 年 9 月 9 日截取) :
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maoist/data_sheets/fatalitiesnaxalmha.htm
- ^来源 (作者于 2017 年 8 月 7 日截取) :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india-news/rajnathsingh-outlines-new-aggressive-operational-strategy-to-take-onmaoists/659673/>

第一部分：深入地下

第一节：跟随着电话的指引

2010 年 2 月, 在日出前的刺骨寒风中, 我摸黑从兰契城 (Ranchi city) 开始了我的旅程。前一天的晚上我收到了他们的消息。电话响了, 我认出了另一头的声音, 它只说: “明天下午两点”, 就挂了。

黎明时分, 巴士缓缓爬上山头。透过裂开的车窗玻璃, 我看到一支推着自行车的队伍, 车上堆满了装满煤炭的黄麻麻袋。就像一群蚂蚁扛着三倍于身体的食物, 他们与汽车一道前行, 黝黑赤裸的背上全是汗, 被太阳照得发亮。他们应该是凌晨两点就开始工作了, 把从工作的矿井、废

弃的矿床，或者从村里公共土地上发现的煤层中挖出来的煤打包。他们把煤运给当地的商人，由他们卖给城市的家庭、当地的企业、小工厂和砖窑。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Sebastião Salgado) 以周游世界记录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而闻名，他在我的想象中首次描绘了一幅充满穿透力的画面，即今天印度贾坎德邦煤田里的男女，“贾坎德”的字面意思是“森林之国”。那时伦敦的皇家节日大厅正在举办他的摄影展，而我当时正好在沿着泰晤士河南岸散步。我看见印度东部的煤矿工人背着镐头，脸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煤，他们银色的嘴唇就像涂上了昂贵的荧光白唇膏一样引人注目。他们的眼袋同样是一片银白色，与疲惫的神态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反差。他们仿佛在昭示着自己要继续战斗的尊严决心，说在这凄凉的环境中，这种磨练永远也打不垮他们。他们的意念和决心令人心惊肉跳。如今他们距我如此接近，他们就在大巴窗户的另一边。

自行车消失在路边的一条泥泞小道。当我们在公交车、吉普车和汽车的喇叭声中突然停下时，我才意识到原因。在这里，森林已经让位于干燥的荒地，遮天的沙尘淹没了我们，烟雾从土地的裂缝中冒出。我觉得呼吸困难，就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

公路上有半公里长的路段已经塌陷，留下一个巨大且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坑。这又是一起贾坎德邦臭名昭著的地下火^[1]，它使大片的土地变成了燃烧的蜂窝。这一次的地下火来自一个废弃的煤矿，火焰沿着道路正下

方的煤层迅速蔓延，使道路下陷。目前还没有人承担起修复损失的责任。无论是私人矿业公司、中央煤田公司^[2]还是地区行政部门都没有。而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来修复。

附近的村民巧妙地开辟了一条尘土飞扬的石子路，这条路穿过他们的泥屋，供车辆通行。一群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青年，穿着牛仔裤，袒胸露背，头上绑着帽子或头巾，在土路上设置了三个关卡。我看见大巴上的中产阶级乘客缩在后座，吩咐司机摇上车窗，显然是害怕这群围住大巴，用棍子敲打车窗的年轻人。这些人要求支付 10 卢比的过路费，并对不照做的人怒吼。

这些矿业项目背后的国企和跨国公司的老总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些印度的百万富翁们在伦敦的梅菲尔（Mayfair）和肯辛顿（Kensington）买下了最昂贵的房产，通常还不止一两套。坐落在英国乡村的豪宅和印度大都市的多层住宅也一样是他们的资产之一。但在晚上，孟买的人行道上却躺满了无处安家的人们沉睡的身体。事实上，印度仍然是一个极端两极分化的国家，其贫困人口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8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8 个邦的贫困人口比非洲 25 个最贫困的国家加起来还要多^[3]。

青年们无法接触到矿业公司背后开发商们的特权世界，10 卢布仿佛是他们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是痛苦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外界的征税，他们的家园要么沉入矿坑，要么，如果还在的话，陷入矿区交通带来的灰尘，泥泞和污染。

中午，巴士的速度又加快了。当我们驶出蜿蜒的山路，眼前闪过平坦的稻田时，我就知道已经从贾坎德邦进入比哈尔邦了。此时的阳光如此强烈，使得柏油马路上浮起了海市蜃楼。

指示是到离兰契市仅 200 公里，在亚洲干线和大干线中间的小镇。谢尔-沙-苏里 (Sher Shah Suri)，把首都定于新德里的苏里帝国创始人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修建了这条从孟加拉国吉大港到阿富汗喀布尔的道路。我的目的地是莫哈尔河和索哈尔河两岸的一个小镇，这里是谢尔沙-苏里曾经猎杀过一头狮子的地方。它现在只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没有任何特征符合那个威武的名字：舍尔加蒂 (Sherghati)，意为狮子关。

舍尔加蒂也是人们所知的第一块火星陨石，舍尔加蒂陨石，掉落的地方，那是在 1865 年。它在天文学家中很有名气，我曾在去隔壁地理系讲课的路上，在剑桥的塞奇威克地球科学博物馆 (Sedgwick Museum of Earth Science) 看到过陨石的一部分。陨石，自燃的煤，还有现在的叛乱，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这个地方一直是火药桶。

当巴士离开柏油路，伴着飞扬的尘土摇晃着停下来时，我焦急地透过窗户向外望着舍尔加蒂的集市。我被告知，游击队会派一个“交通员”来接应我，并引导我到他们藏身的森林。但要多久才能发现那个人呢？卖菜的、卖表的、卖鸡羊的、卖化妆品的，各色商贩蜂拥在大巴车、面包车、吉普车之间。人们有的在买卖，有的在喝拉茶^[4]，或者只是在闲逛，打发着时间。如果“交通员”不在，会发生什么？我应该等多久？回兰契的最后一班车什么时候出发？

关于这个（接人）阶段曾经出现的差错流传着很多故事。有个让游击队员捧腹大笑的故事，是关于印度南部的一个纳萨尔派领导人的，他拿着串香蕉作信号，在贾坎德邦一座繁忙的寺庙外等待他的“交通员”。当他站在一棵榕树下苦等时，有只猴子爬到他身上抢了香蕉窜上树。它对下面扔来的石子不为所动，依然镇静地吃着香蕉，看着树下愤怒的人。更让领导苦恼的是，香蕉在贾坎德邦已经过了季节，虽然他到处都找了，但是附近根本买不到。规定的会面时间已经过去，他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出发的城市。他花了半年时间来重新安排了前往贾坎德邦森林的行程。从那时起，纳萨尔派就一致认为，双方至少需要带两个东西来相互识别，需要一个共同的问候语，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第二次会面时间，以防第一次会面时出问题。

一个矮个子男人拿着一箱小罐子爬上了巴士，熟练的叫卖声就像一首歌，推销一种煤黑色的粉末，能奇迹般地让牙齿闪闪发光。他宣称，任何医生、牙医或牙膏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为此乘客们争相购买他的东西。在男人身后，一位身穿彩虹条纹纱丽的老妇人，提着一个装满花生的且用小报纸包裹着的篮子。在她后面，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挤上车卖手电筒，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镇上没有路灯，村里也没有通电。

当车站的喧嚣把车上的人吞没时，我对“交通员”的到来就越发焦急了。极目远眺，从汽车的高度能够看见远处有顶红帽子。帽子的主人是一个高大黝黑的男人，胳膊下卷着报纸。一切都和描述的一样。

我的黑发整整齐齐地扎成一个光滑的发髻，还在身上裹了一件廉价的红黄相间的雪纺纱丽。以混入当地人。但因为个子比当地妇女高，肤色也比她们浅，我知道自己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还是很显眼的，“交通员”一定能认出来。不过，按照约定，我还是带了一块面包，拿着它走近了“交通员”。

那人没有看我。他穿着一件熨得整整齐齐的素白领棉布衬衫，米色长裤，一双黑色仿皮鞋，虽然擦的很亮，鞋底却是破的。我看得出他有些斜视。“你一定累了吧？”他问。“是的”我回答。如释重负的叹气。对出暗号。任务完成。

我默默地跟在那人身后，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除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路无话。保护我们的匿名性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周围有平叛行动的情况下。

男人走向了另一座公交车站。这站台是为了跨省交通而建立的，但却比省内交通的站台更为繁忙。我们乘坐的大巴是如此拥挤，已经到了车身危险地倾向一侧的程度。人们坐满了车顶。而最强壮的青年则紧拥着车后的扶梯。甚至在车窗上也晃荡着一排人腿。我的“交通员”也被淹没在了大巴中间拥挤的人群中。作为一名女性，我被提供坐在一个位于翻滚着汽油的炽热变速箱上歇息，还有五位妇女也坐在这里。我的膝盖撞上了坐在我对面的妇女，她两位女儿中的一位则坐在我的腿上。在我的右侧，一排塑料制的神像排列在有裂缝的车窗上。象神迦内什（译注：毁

灭神湿婆的儿子，象征财富和健康，因此作为印度最受欢迎的守护神之一常常被供奉在商店中）被华丽闪耀的灯所包围着。

在极大的关照下，大巴轰鸣着离开了舍尔加蒂。售票员声嘶力竭的大喊着大巴的终点站，好似机关枪开火一般重复念诵着目的地。在大巴离开车站时分，仍有最后一拨乘客将他们的身体挤进任何空当，试图登车。很快，我们上了高速公路，然后转进了一条更加安静的泥泞小路。尽管旅途颠簸又不适，我的疲惫克服了一切——我睡着了。

重型载具的轰鸣声让我跳了起来。我们被坦克和装甲输送车（一个军事术语，英文为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包围了，其中一些军队载具和大巴一样大。这是印度安全部队的巡逻队中的一支，后来演变为更加广为人知的“猎绿行动”部队，这个镇压起义的组织目标为消灭游击队，且几个月来行动逐渐升级。被称为 CRPF（中央储备警察部队）的大约十万名政府反起义武装力量被送到印度中部和东部起伏的森林中，以加强政府的警力。BSF（边防部队）和 ITBP（印度-中国西藏边防警察部队）也被动员了。十支 CoBRA（果敢行动）突击营被培养，散布到对抗中去，他们是被训练以游击队的方式对抗游击队的精英武装。由十架来自印度空军的直升机组成的组成的机队也在此为军队提供支援。

记者越来越被排除于游击区之外，除非是（印度政府）为了表现一些可怖的恐怖主义袭击。有些报道过游击队地区的记者们被支付了封笔费，以保证以后不再写作关于此类的文章^[5]。印度内政部门于 2008 年宣布任何支持毛主义的人都有可能被（防止）不法活动法案的第 39 章所迫

害。已经有人权活动家被逮捕入狱。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儿科医生，兼人权活动家比那亚·沈恩（Binayak Sen）于 2007 年，在《恰蒂斯加尔邦公共安全法》下被首次逮捕，他被指控煽动罪及帮助毛派建立反抗政府的网络。他之后于 2010 年被宣判终身监禁，在一众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译注：美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支持下，又被颁发许多国际人权和平奖后才被保释。但这种封口行动并没有被报道过。许多试图进入游击战中心地的人权运动家，律师和记者曾经向警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维护宪法上的责任，将内战扼杀在摇篮里，或仅仅是搞清楚印度的中心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人都会被暴力，或是被威胁以暴力驱逐了。

我缩回了自己的临时座位。我很担心，虽然我是印度出身，但我的“西方化”仍让我十分显眼。如果安全巡逻注意到我，我不得不回答过多的问题。

我们在下一个村庄下了车。这座村庄建于一系列路边商店周围，而最前方是一个繁忙的露天市场。本地人看上去已经无视了安全部队的护送，但我已经口干舌燥，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就是专门部署用来于屠杀我希望会面的人的战争机器。

我们快速走过了坐在街边上贩卖茄子、豌豆和西红柿的男男女女，我们来到了一个小五金货摊。从这儿，我们看到安全部队在村庄中驶过。我数了数，至少有二十辆载具。这意味着至少有五百名武装人员。

我将要安排和毛派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一进行一场期待已久的访谈。那是全印度最想逮捕的男人之一，他已经在地下活动了三十余年。这就是我还没有会面的人，尽管在过去的一年半，我都和拉尔冈（Lalgaon）和阿迪瓦西人们生活在一起，那里深藏于贾坎德邦中起伏的森丘，被纳萨尔派人员称为他们的“红色首都”。这只是一场短期旅行，最多两天，我被如此告知。但是这场采访的应许远大如此。

我的胃一阵恶心。或许是因为我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又或者是因为大巴上长时间的摇晃？当我们在崎岖小路上颠簸前行时，汽油的恶臭和排出的尾气已然将我们吞噬？又或是因为刚刚看见军队而导致的焦虑？

-
- 翻译：镜鱼、卡米、酥酥狼
 - 校对：三角贸易

参考

- [^]地下火又称地火、地下煤火、阴燃火等，是煤炭地层在地表下满足燃烧条件后，产生自燃，或经其它渠道燃烧所形成的大规模地下燃烧发火。
- [^]印度煤炭公司的子公司，是印度的国企。
- [^]K.P. Kannan (2012) ‘How inclusive is 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 *The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5 (1): 33–60, 36; Sabina Alkire and M.E. Santos (2010) ‘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38*.
- [^]印度国饮,用牛奶煮过的红茶里加入豆蔻、肉桂、丁香、黑胡椒和姜等等,本地人还喜欢加糖。
- [^]参见 <https://kafila.online/2009/04/22/the-art-of-not-writingshubhranshu-choudhary/>. 作者最后一次能够访问该地址是在 2017 年 1 月 22 日

半个世纪的武装抵抗（一）

很难想象苏维埃俄国和毛时代中国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印度的革命斗争。但纳萨尔派的确是真真正正地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 1920 年建立的印度共产党中诞生的。和其他的共产主义组织一样，他们的目标是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武装力量，来推翻资产阶级、废除国家制度、创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没人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但它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资产、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没有社会和经济压迫的社会。虽然在中国和俄罗斯，随着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并不断发展，实现这些目的的实验失败了，但这种无阶级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创造性一直在激励着革命者。

实现这样的社会的手段一直是造成左翼分裂的关键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各种涉及直接行动的手段以推翻国家的权威和组织小型的自治公社。另一些人则效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张采取建立广泛的群众运动的战略，让农民、士兵和所有被压迫的群体参与进来，并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为核心。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创建，而党由这些人中更加“有阶级意识”的人来领导，称为先锋队。数年来，党组织因为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而分化——是利用国家的议会体系还是诉诸武装力量并走向地下工作；行动是应该按发展阶段组织起来，还是应该自发地进行；运动应该由城市工人阶级领导，还是由农民集中参与；

斗争应该从城市开始，成为一场叛乱，还是应该从农村渗入，慢慢占领城市地区。

在印度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后，共产党在南亚次大陆的主要派别开始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选择和巴基斯坦结成同盟，而苏联则和印度建立了更近的联系。苏联的共产党政府希望印度共产党能够支持印度的开国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缓和对印度国家的批评，加入议会。但印度国民大会党早先——20世纪40年代——在特伦甘纳邦（Telangana）对印度共产党发起了残暴的攻击，这使得印度左翼在是否接受苏联的建议上起了分歧。^[4]而且，那时的苏中关系正在恶化。毛已经开始批评苏联共产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和否定革命地下战争的一系列措施，随后发生的中苏分裂使一些印度共产党人同情毛，而另一些人则支持俄罗斯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962年在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导致的战争引发了印度共产党的分裂。数百名支持中国的印度共产党员因背叛印度而被监禁，而他们的同志只是袖手旁观。于是，当那些被监禁的人在加尔各答（Kolkata）的杜姆杜姆监狱（Dum Dum jail）进行辩论和再动员时——监狱往往是进一步动员的渠道——该党最终分裂为亲俄的人和亲华的人，他们认为在印度建立一个不同的革命流派很重要。

这些印度激进者——随后他们称自己为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声称，尽管脱离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仍然在印度存在，并且它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是封建主义的。他们说这个国家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独立，

它的主权不过是被移交到了“殖民者的印度伙伴”的手里罢了。受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场旷日持久的农民战争——的启发，他们认为印度需要的革命策略应当和 20 世纪 30 年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的策略一致，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和那时的印度所处的情况相似，后来毛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继续采取这一战略。他们为一场持久人民战争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将动员农村的农民，建立农村基地，并组织一支由无地的贫困劳工和被剥削的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希望这场斗争最终能包围城市，争取在建立全球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夺取国家权力。

这些革命者们在 1967 年，从一个西孟加拉邦 (Bengal) 的村子，纳萨尔巴里村 (Naxalbari) 的一个小规模起义开始，他们的名字就来自这里。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和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领导着农民和工人占领土地，将土地分给农民，并要求地主取消所有债务，终结对他们世世代代的奴役。经过几个月的示威和占领，在当地一个最大的茶园通过裁员破坏工人的罢工后，抗议活动升级。工人们夺取了收成，一个地主被处以私刑，其他地主逃跑了。当警察开展行动镇压抵抗时，占领者放出的一支箭马上就杀死了一名警督。第二天，警察进行了报复。他们向抗议者开火，杀死了 11 人，其中包括 8 名妇女和 2 名婴儿，并在整个农村引发了内乱。^[2]

纳萨尔巴里的起义被残忍地镇压了。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赞扬道：“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他们在北京电台广泛报道在纳萨尔巴里发生的事情，宣布“一块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地区在印度诞生

了”。中国共产党在原先就建立了与查鲁·马宗达的通信联系。一位共产党员农民曾穿越喜马拉雅山，将马宗达的“历史性八大文件”交给了毛。这些著作概述了纳萨尔派领导人为印度提出的激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原则，这些原则是对中国领导人奠定的道路的致敬^[3]。随后在 1967 年，卡努·桑亚尔和其他三位共产党同志也从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到了中国，他们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在回到印度前，他们甚至还见到了毛和周。桑亚尔回到印度，给同志们传达了毛给他临别赠言，“忘记你在中国学到的一切。一旦回到纳萨尔巴里，就制定你们自己的革命战略，牢记那里的实际情况。”^[4] 尽管如此，但“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这句话还是成为了许多早期的纳萨尔派革命者们高喊的口号。

纳萨尔巴里叛乱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印度，在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 的斯里卡库拉姆 (Srikakulam)、奥里萨邦 (Orissa) 的科拉普特 (Koraput)、比哈尔邦 (Bihar) 的博杰普尔 (Bhojpur) 和西孟加拉邦 (West Bengal) 的比尔胡姆 (Birbhum) 等森林和丘陵地带，也爆发了类似的斗争。在其中一些地方，动员工作借鉴了较早的起义历史。例如，1946-1951 年在特伦甘纳邦 (Telangana) 发生了反对封建领主和海德拉巴的尼扎姆 (Nizam of Hyderabad) 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人说，即使在印度宣布独立后，尼扎姆仍作为君主继续统治。在那里，印度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的口号，并动员农民和工人反对封建领主，接管了 3000 个村庄，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并建立了类似苏联米尔 (mir) 的村社制度来管理该地区。政府进行了

报复，并派出军队来消除抵抗，将海德拉巴并入印度联邦。那次军事入侵是残暴的，直到最近才最终确认，据不完全估计，有 3 万至 4 万人被杀，至少有 1 万名所谓的共产党员被捕。^[5]然而，游击队叛乱和农民叛乱的想法也激励了该地区的人们，并赋予了他们力量。20 世纪 60 年代末，印度各地的革命党试图重新点燃这些早先的起义记忆，推翻，有时甚至消灭压迫农民的地主，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最贫穷的人，使他们摆脱束缚，取消他们的债务。

被纳萨尔巴里叛乱的浪漫理想所吸引，许多来自中上层家庭的聪明城市青年感到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和他们的大学教室，到村庄里去为穷人工作。他们感到自己会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系列反殖民主义—毛主义运动结盟。那时候，毛思想激励着人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从事革命变革。当时，文革刚刚开始，那是一场摆脱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传统因素的激进运动，而这一时期的暴力清洗和杀戮还不为人所知。毛思想不仅在南半球的许多国家，而且在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丹麦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识形态形式。它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波伏娃和萨特，到福柯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6]

在拉丁美洲，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的一系列游击队采用了毛派的游击战术，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的边缘人口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将各种本土的文化符号融合，开始了持久人民战争。桑地诺主义者和人民解放军

(EPL-Ejército Popular de Liberación) 在哥伦比亚的最初传播是如

此（他们后来转向选举政治），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他们后来实质上成为土著自治运动）和秘鲁的光辉道路也是如此。

在津巴布韦，由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反殖民主义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游击运动在发展中接纳了各种毛派元素。在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封建”的埃塞俄比亚，激进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EPLF）受到毛主义思想的极大启发，建立了厄立特里亚共和国。在刚果，卡比拉（Kabil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组建了人民革命党，在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以西建立了分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土耳其和伊朗北部，库尔德工人党（PKK - 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毛主义人民战争战略的影响（尽管与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一样，今天他们的斗争最常被当作生态女性自治运动）。在东南亚，同样受到毛主义影响的菲律宾共产党及其新人民军正在形成。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正在该国东部的丛林中集结。毛主义思想在各地蓬勃发展。

同其他形式的左翼社会运动相比，毛主义思想在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传播更为广泛。这可能是因为毛理论化了农民在革命变革中的作用。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其经典形象是非人化的城市工厂工人——是将创造无阶级社会的真正革命的阶级。他们认为农民是反动的，是会从历史上消失的力量，因为他们最终会被从土地上连根

拔起，加入城市无产阶级的行列。毛颠覆了这一当时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主张农民可以从农村发动革命战争，农民也能创造革命历史。考虑到当时相当一部分国家压根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工业化，更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实，毛主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了革命社会变革的摇篮。

除了对农民的关注之外，毛主义思想能够如此流行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毛认为资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认为必须将革命变革视为社会主义力量与帝国主义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因此，毛对许多正在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人来说立即变得有意义了，他们或者领导着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反殖民运动，或者正在进行对他们认为与殖民势力结盟的本国精英的批评。第二，毛思想允许通过毛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政治、组织和领导方法来转化广泛的地方条件和问题，其核心是与群众协商，在革命框架内解释和吸收他们的建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如群众路线强调的——是基于对人民情况的了解，去学习和参与他们的斗争，从群众那里得到新办法，并根据革命目标，根据他们关切的目标，制定行动计划。这无疑暗示，毛主义可以根据当地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蓬勃发展，与其他地方的毛主义关系不大，或者这么说，与中国的实践关系不大。

在印度，在动员农民和无地穷人的同时，还进行了知识和文化活动，以及对政府大楼和教育系统的攻击。新的期刊和杂志，如《解放》和《南方国家》（Dakshin Desh，指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印度，中国则是北

方国家) 被出版, 以宣传斗争背后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印度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 为什么印度独立是一个“假象”; 为什么必须抵制选举。甘地等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偶像被打碎, 因为据说他们支撑着印度的殖民体系。新的激进戏剧也出现了, 如《维护纳萨尔巴里的箭》《列宁的呼唤》和《未被征服的越南》等戏剧。

印度政府继续进行着毫不妥协的镇压, 许多领导人和同情者被警察杀害或在被捕后失踪。^[7]1972 年, 查鲁·马宗达被逮捕并死于警察拘留所。到了 1973 年, 约三万两千纳萨尔派嫌疑分子入狱, 许多人未经审判被关押多年。^[8]不同的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分裂, 对马宗达的批评也出现了。然而, 整整一代的城市青年已经被激进化, 叛乱的种子已经在农村播下。在加尔各答的街头和大学校园里, 爆发了支持农民起义和抗议警察镇压的示威活动。那些逃过监禁的人在农民中开展了缓慢而耐心的地下工作,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一些出狱的人又到高校和乡村, 在全国各地再次战斗。最初的纳萨尔派起义继续激励着印度的新一代青年拿起武器为革命变革而战。

-
- 翻译: 镜鱼、卡米、酥酥狼
 - 校对: 三角贸易

参考

- . ^Sundarayya, P. (1972) *Telangana People' s Struggle and Its Lessons*. Calcutta: Desraj Chandha.
- . ^对早期纳萨尔运动，直到 1972 年查鲁马宗达去世的最佳记录，可能还是 Sumanta Banerjee 在 1980 年出版的《*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A History of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India*》，由加尔各答 Subarnrekha 出版社出版。
- . ^Sreemati Chakrabarti (1990) *China and the Naxalites*. London: Sangam.
- . ^Paul Bappaditya (2014) *The First Naxal: An Authorised Biography of Kanu Sanyal*. New Delhi: Sage. See p. 130; Suniti Kumar Ghosh (2009)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Kolkata: New Age Publishers. See especially Appendix B.
- . ^1948 年关于印度军队军事入侵海德拉巴邦的后果的 Sunder Lal 报告在 2013 年才公布。
- . ^参考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
- . ^Banerjee, S. (1984) *India' s Simmering Revolution: The Naxalite Uprising*. London: Zed Books
- . ^Bappaditya, P. (2014) *The First Naxal: An Authorised Biography of Kanu Sanyal*. New Delhi: Sage.

半个世纪的武装抵抗（二）

多年来，印度的革命者试图与秘鲁的“光辉道路”和菲律宾共产党结成联盟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们培养了尼泊尔毛派，从 1996 年开始，毛派与尼泊尔政府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后来在摧毁尼泊尔的印度教君主制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们建立了一批新兴的革命政党，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都采用了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拥有自己的文化部队和自己的杂志和期刊。

他们在各种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例如，武装力量和群众组织之间重心的平衡，或者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议会选举制度。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都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参与议会选举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投票支持某一特定候选人或政策的权利不能被误认为是真正的权力或真正民主的权利。^[1]也因此，许多革命者认为，参与选举是工人阶级提出他们的想法、方案 and 对抗统治阶级力量的宝贵（尽管非常有限的）工具。但他们最终的革命目标是夺取权力以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由生

产者直接控制工作场所和土地的体制。一些政党——如**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 解放党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Liberation)** ——转向选举政治。但其他党的立场是，在印度参加选举意味着成为一个腐败到极点的系统的一部分，贿赂、敲诈和挪用公共资金对整个系统的运作至关重要，它将腐蚀任何试图争夺席位的人；因此最好是完全抵制议会选举的参与。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部分地区有**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

(Maoist Communist Centre) 1，在比哈尔邦的其他地区有**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统一中央组织委员会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Party Unity) 2**，在南部的安得拉邦有**印度共产党 (马列主义) 人民战争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People' s War) 2**，还有其他几个小团体，有时为争夺领土而相互争斗。

1.二者已经于2004年合并

2.与印度共产党 (马列主义) 人民战争于1998年合并

印度毛派对经济的上层理论建构处处转化到他们反对不平等、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实践之中；他们反抗地主的压迫，反抗种姓歧视，争取劳工权利和土地权利。在任何地方，他们都试图动员最被边缘化的人群，要求保护他们的尊严和权利。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前往乡间，和穷人一同工作。他们用镰刀等冷兵器武装自己，直到袭击警察局获得火器为止。随着武装队伍一起在农村中传播开的还有唱着

革命歌曲和表演戏剧的文化部队。在任何地方，革命者都因过度使用暴力而受到批评，特别是因为他们会杀掉那些被他们称作“阶级敌人”的人——地主，国家官员和警察的线人。国家对他们的压制无处不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纳萨尔派及其支持者与占主导地位的种姓地主之间激烈的种姓战争，印度的一些农业平原变成了著名的“交火地带”。

例如，在印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比哈尔邦，平原地区的特点是有控制大片土地的高种姓地主与小农户，他们和无地的达利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达利特作为农业工人为地主工作，受到农奴般的对待。

达利特种姓，曾经也叫作“不可接触者”，被贴上了不洁和脏污的标签，在印度各地，人们都不肯接近他们。这些人被迫从事最卑微和“不洁”的工作，如清除死牛和人粪尿，所谓的不洁——这是宗教规定的——影响到达利特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体液被认为是有污染的。达利特不允许接触高种姓的食物，不允许喝他们井里的水，不允许走过他们房子的门槛，不允许在他们的寺庙里祈祷。达利特人的“不洁”甚至被认为会影响空气。因此，允许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有界定，他们的聚落被限制在村庄的南部边缘，因为人们认为风很少从南向北吹，这样就减小了污染高种姓住宅区空气的风险。

达利特人被视为动物，在路过村中高种姓甚至普通人所在区域都需要脱鞋，在高种姓面前要低头，永远不准看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劳动报酬微

薄，每逢婚、丧、病、孕，常常不得不向高种姓的雇主贷款来支付相关费用，贷款的利率则被设置为他们永远还不完的数额，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世代为这些主导种姓工作。

尽管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一些缔造者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些极端等级制度和不平等问题，但是，基于种姓和部落的社会歧视在印度依然存在。在达利特人领袖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尔（Bhimrao Ambedkar）的领导下，印度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不仅取消了贱民，还为印度的低种姓和部落在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服务部门以及中央和邦立法机构的下议院中保留了特殊地位。通过把达利特列为“在册种姓”，阿迪瓦西列为“在册部落”，一些达利特（和阿迪瓦西人）确实从这些平权措施中受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分种姓的仪式性因素有所减少。但是，种姓压迫远远没有作为一种过时了的东西消失，而是在现代经济中扎根下来^[2]。

在整个印度，绝大多数低种姓的人依然干着没人愿意做的职业，他们是拿着低工资为高种姓人工作的农业工人，因为必须靠预付款生存而被绑死在岗位上。在工厂和建筑业中，他们是被劳务承包商雇佣的临时工，签的往往是随时可被解约的零工时合同(雇主可自由改变雇员工作时间甚至无须保证有任何工作时间的合同)，从事的却是最困难、最不安全的临时体力劳动。种姓暴力以多种形式普遍存在——从学校和工作中的辱骂和歧视，到强奸、谋杀。

尽管迟至 1989 年，议会出台了《防止暴行法》，以进一步保护阿迪瓦西人和达利特，但当人们鼓起勇气站出来反抗施暴者的压迫和剥削时，他们往往会遭到镇压和噤声，警察则是同谋。

受到毛泽东的启发，纳萨尔派在比哈尔邦平原上开展斗争时复刻了秘鲁“光辉道路”及菲律宾共产党采取的反封建战略，努力深入到达利特人的家庭中，帮助他们摆脱统治阶级的奴役。他们在达利特人的聚居地举行夜间秘密会议，动员他们站起来反抗压迫，加入纳萨尔派的游击队，还杀死了几个最残酷的地主，把其他地主赶去了城市，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无地者和小农。他们组织集会、抗议和劳工罢工，要求地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消除强迫劳动和债役劳动制，并更公正地给佃农分配劳动所得。起义者还公开打击对女工性骚扰的男子，并集体前往政府，要求清洁的饮用水、更好的住房和医疗保健。

而高种姓地主也对纳萨尔派和他们的支持者进行报复。他们组成了私人武装和民兵团，比如让维尔军 (Ranvir Sena)，昔弥军 (Bhumi Sena) 和太阳军 (Sunlight Sena) 在同情纳萨尔派的村子里大肆破坏。这些军团 (Sena) 也有自己的战斗口号：“对纳萨尔派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砍短六英寸。”尤其是达利特，他们在一夜之间被屠杀。一般都是斩首——就像那个口号所说的那样，短了六英寸。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被杀害。一晚上八个，另一晚九个，第三晚二十二个，然后是二十二个，三十五个——越来越多的杀戮在继续，而警方却只是袖手旁观。纳萨尔

支持者的房屋被烧成废墟，游击队没办法躲在屋子里了，而稻田只有在庄稼长高时才能提供庇护。他们已经无处可躲^[3]。

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按照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战术，纳萨尔派希望能找到一个印度的延安——一个远离印度政权、可以让他们继续战斗的根据地。他们于是开始寻找对游击战更有利的地理环境，并开始撤退到印度中部和东部的丘陵和森林中——进入现在的贾坎德邦和恰蒂斯加尔邦，以及奥迪萨邦南部、安得拉邦和特兰加纳邦北部、中央邦东南部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部分地区。

我所居住的拉尔冈（Lalgaon）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游击区。这是一个森林茂密、广阔无垠的平顶高原，有大约 30 个分散的村庄和 4 万人。它耸立在平原上，是一个由德干熔岩组成的山丘，当地人叫它“小块儿”。拉尔冈北面是宽阔的奥兰加河，南面是北库尔河，并被许多较小的溪流和小河分割开，因此在季风季节就与平原完全隔绝。

这个新的落脚点也是个理想的发展游击队的地方，因为政府几乎无法到达这里。因此，当柏林墙倒塌、中国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的共产主义武装斗争也随之开始衰落之时，在印度，尽管当时政府严酷镇压革命，农村似乎也仍然秩序井然，纳萨尔派也仍能继续动员社会上最受歧视的群体：阿迪瓦西人。

虽然来自城市和农业平原地区的纳萨尔派领导人也曾经和阿迪瓦西人打过交道，但是当他们进入这些偏远地区的时候，他们还对这些主导着森林、山地的部落民——霍人 (Hos)、桑塔尔人 (Santhals)、戈德人 (Gonds)、孔德人 (Konds)、穆赫亚人 (Murias)、科亚人 (Koyas) 及许多其他阿迪瓦西人群体的社区知之甚少。在拉尔冈，有奥哈翁人 (Oraons)、穆达人 (Mundas)、可合瓦尔人 (Kherwars)、罗赫刺人 (Lohras)、比霍人 (Birhors)、帕哈里亚人 (Paharias)、比利亚人 (Birjias)、阿苏人 (Asurs) 和阿吉利亚人 (Agarias) ——其中一些人仍然靠在森林中打猎和采集为生，并根据他们采集的东西季节性迁徙。^[4]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阿迪瓦西人逐渐迁入到深山老林中，试图摆脱他们在其他地方面临的等级制度和压迫，建立起不同于种姓制的平原地区的社区。^[5]虽然印度的政府顾问、活动家和学者经常把阿迪瓦西人和达利特一样视为印度最受压迫和最贫穷的群体，但是因为在山区里的阿迪瓦西人能够与土地和森林有一些直接接触，他们的日常生存并不像处于农业平原的达利特那样依赖于其他群体。在平原地区，不同种姓的群体紧凑地住在村子中，不平等地相互依存：较高级别和占主导地位的种姓社会等级处于制度的顶端，控制着土地和大多数其他重要资源；达利特人处于最底层，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但越靠近森林，平原地区种姓社会的群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影响就越小，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就越有自主权。^[6]在最偏远的地区，阿迪瓦西人住在分散开的房子里，在周围的森林里狩猎，

或者清理掉森林以种植谷物等农作物。有些群体仍然实行轮垦，在一片森林中开垦几年，然后再转移到其他地区。不过，这种自给自足的自主权在不断被破坏。

当地居民受到的待遇和世界上其他部落一样，被外来人认为是残酷、野蛮、原始的。他们在印度被称为“丛林人 (Jungli)”，这是一个贬义词，意在指责他们和他们居住的森林一样野性难泯。不过，英国殖民国家和之前的莫卧儿王朝还是希望从他们的土地上获得收入，就像他们在整个国家的大地上所做的一样。他们带来了外来人——通常是来自平原地区的高等种姓——来控制、“驯服”和安置这些人口。这些新来的人尝试了各种策略，如强行将人们迁移到那些更像平原地区的村庄的村子里，或者通过放贷人使这些人负债，将他们变成债役工。虽然一些阿迪瓦西社群屈服了，但许多人要么退到更深的山里，要么与外来者对抗。结果就是，尽管高种姓外来人有一些散居在森林和山上，^[7]但他们大部分还是喜欢住在远离森林和山区、离城镇更近的地方，试图从远处完成他们的工作。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与外来定居和剥夺土地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对森林的商业性砍伐，因为它们提供大量铁路枕木、军舰和实木家具的原料。这种开采模式是古老的、全球性的。全世界的殖民帝国——无论英国，西班牙或荷兰——都建立在此之上。今天，在英国保存完好的庄严住宅中，可以找到在英属印度时期开采的原木。在白金汉郡、贝德福斯郡和伯克郡的一些豪华房间里，堆满了雕刻精美的抽屉柜、镶嵌象牙的梳妆

台，偶尔还能找到孟加拉虎皮地毯，以及用从印度中部和东部以及喜马拉雅山的森林中开采的柚木和乌木制成的古董钟。

森林居民的痛苦还不止于此。随着森林成为“保留地”或“保护地”，那些在不同的土地到处游荡、狩猎、采集和移动耕作的林区居民慢慢地被迫在森林边缘建立更多的永久定居点。许多小村庄——有的还不到50户——就这样发展起来。新的外来人口也来到定居点，他们是来森林工作、为森林采伐和放贷所开辟的市场服务的。在拉尔冈，这些人是比较哈尔平原的中等种姓的信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商人（其中信印度教的叫做 Sahun，也被印度政府归入 OBC[Other Backward Classes 其他落后阶层]）。他们共同住在生活最便利的地方，那里有每周一次的集市。这些人大多数是商人和中间商，对农业活动不感兴趣，从没打算积累耕地，主要还是让阿迪瓦西人去耕种土地和采集森林水果。但他们新带来的以货币为基础的市场使得阿迪瓦西人负债累累，与此同时，管理森林的官员还不让阿迪瓦西人拥有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资源。

阿迪瓦西人不断被剥夺，因此起来反击。穆达人（Mundas）、柯罗人（Kols）、霍人（Hos）、桑塔尔人（Santhals）、布胡米基人（Bhumij）、切罗人（Chero）都拉起了弓箭，攻击那些使他们陷入困境的外来者。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印度中部和东部山区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叛乱。这些反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但并非第一次）是桑塔尔-胡尔（Santhal Hul）叛乱。事实上，它比开始于1857年、被视为印度独立第一战的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士兵叛变（sepoy mutiny）

还早两年。在 1855-56 年间，数以万计的桑塔尔人在西土 (Sidhu) 和坎胡 (Kanhu) 两兄弟的领导下，试图杀死英国政府带来的地主和放债人——正是这些人剥夺了阿迪瓦西人的土地和森林，使他们成为债役工。但是，桑塔尔人简单的弓箭、镰刀和小刀根本无法与英国政府抗衡，英国政府派来了骑着大象、带着大炮和火枪的军队。这些殖民部队摧毁了村庄，把它们烧成废墟，杀掉了一万桑塔尔人，包括领导他们的两兄弟，最终粉碎了起义。^[8]

但是，抵抗仍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着，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 1899—1901 的比尔萨·蒙达起义。^[9]虽然这场起义据说只持续了一个月并且死亡了不到 30 人，但它作为部落反抗剥夺他们土地与森林的象征而长存至今，比尔萨的画像现在都还悬挂在印度议会，他是阿迪瓦西人中唯一有此殊荣的人。或许是由于一些保护措施终于落实了，比尔萨运动成为了阿迪瓦西人反抗的历史性标志。由基督教传教士调解达成的乔塔那格浦尔地租法案——经常被视作是阿迪瓦西人自己的大宪章——阻止了阿迪瓦西人的土地与森林低价出售给外来者，这样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变成卑微的廉价劳动力。

尽管制定了保护土地措施（它们后来被写进印度宪法第五和第六条），这些法律却不断地被破坏。而且，在印度脱离英国统治以后，尽管大规模采伐被官方禁止了，政府依然通过新的方法延续了这项剥削性的政治遗产。利润丰厚的森林产品黑市持续存在，对阿迪瓦西人资源的掠夺也在继续。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森林被采伐殆尽后，和世界各国一样，印度林业的重心从采伐变为保护。拉尔冈地区的一部分变成了老虎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这无疑进一步限制了阿迪瓦西人利用森林的权利，只不过这次的旗号换成了保护老虎。

新的保护政策也影响了来自比哈尔平原的外来者。森林采伐的黄金时代给予了这些外来者不错的生活，但当林业的风向从采伐转为保护时，虽然一些人继续非法采伐和走私林产品（他们一般搬出森林，居住在地区中心城市），大多数人的日子还是越过越穷了。他们寻找着新的谋生手段，包括开杂货店；贸易无需伐木的合法林产品，比如用来酿酒的长叶紫荆木（mahua tree）的花；承接政府合同（譬如销售济贫口粮的“公共分配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商店）；抑或做些裁缝活儿之类的小生意。那些没做成生意的人则季节性地流动到外地打零工，但他们很少做那些专门由阿迪瓦西人和达利特做的最高强度的工作。与此同时，尽管阿迪瓦西人仍然试图在森林里耕种来自给自足，但随着他们获取周边资源的手段日益受限，他们也被迫季节性地迁徙到外地打零工。他们从事着最繁重的工作，例如在砖厂当搬运工和烧窑工。这些都是被高种姓认为有辱身份的职业。

无论是英国殖民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印度政府都没有为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尝试。认为当地人凶暴野蛮的偏见根深蒂固，而那些管理阿迪瓦西人的森林与山地的官员们也很少尝试将这些他们认

为“不够文明”的人整合为平等、合法的印度公民。被派到这里工作对官员们来说是一种惩罚。

虽然全世界都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而惊叹，但哪怕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在贾坎德邦居住过的任何一个村庄都没有供电、供水，也没有医疗保健和卫生设施。扫盲的努力也可谓微不足道，在我访问的大多数村庄中，将近 90% 的阿迪瓦西人是文盲。尽管在当地可以零星看到一些学校，但学校的大规模建设在进入 21 世纪后才刚刚开始。印度宪法雄心勃勃地规定，在国家机关中按照阿迪瓦西人和达利特种姓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为他们预留岗位。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获得这些职位所必需的教育水平。^[10]

虽然生活在国家政权的压榨之下，但阿迪瓦西人自古以来面对这些外来者的反应便只是保持距离，他们用一种与外来者水火不容的文化进行抵抗。“我们是丛林政权（Jungle Raj）的人民，是林中之国”，许多阿迪瓦西长老骄傲地对我说。我开始把丛林政权理解为阿迪瓦西人反正统文化的象征，一种因为同高种姓外来者互动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既与外来者谈判，亦与外来者对抗。

-
- 翻译：镜鱼、卡米、酥酥狼
 - 校对：三角贸易

参考

- ^参考 August Nimitz (2014) *Lenin's Electoral Strategy from Marx and Engels through the Revolution of 1905: The Ballot, the Street or Bo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参考 Alpa Shah, Jens Lerche, Richard Axelby, Dalel Benbabaali, Brendan Donegan, Jayaseelan Raj and Vikramaditya Thakur (2018) *Ground Down by Growth: Tribe, Caste, Class and Inequality across India*. London: Pluto Press.
- ^对这一时期最好的描述是 Bela Bhatia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Bela Bhatia (2000)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Central Bihar' (Ph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 ^尽管所有这些群体之间当然存在差异，而且名称和分类也经常有争议，但在本书中，作者一般用“阿迪瓦西人”这个流行的术语来称呼他们，这个术语是 1930 年代在贾坎德邦的跨群体动员中出现的，并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
- ^这与 Pierre Clastres (1974) 所描述的亚马逊印第安人的“反国家的社会”或最近 James Scott (2009) 所描述的从平原地区不断扩张的民族国家逃到东南亚山区形成“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民族群体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有明显的相似性。Pierre Clastres (1987 [1974])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Zone Books; James Scott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e also my earlier arguments on Adivasis: Alpa Shah (2007) 'Keeping the State Away: Democracy,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India's Jharkh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3 (1): 129–45; Alpa Shah (2010) *In the Shadows of the State: Indigenous Politics, Environmentalism and Insurgency in Jharkhand, India*.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还可参考 Frederick Bailey (1961) '“Tribe” and “Caste” in India.'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5: 7–19.
- ^在渗入森林的一些小块区域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的人是 19 世纪 50 年代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学习当地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帮助他们接触到的阿迪瓦西人抵抗高种姓外来者的压迫。
- ^对桑塔尔-胡尔叛乱最好的参考是 Vasudha Dhagamwar (2006) 的 *Role and Image of Law in India*. New Delhi: Sage
- ^Kumar Suresh Singh's (2002) *Birsa Munda and His Movement, 1872- 1901: A Study of a Millenarian Movement in Chotanagpur*. Kolkata: Seagull Press, is a classic. See also Alpa Shah (2014) 'Religion and the Secular Left: Subaltern Studies, Birsa Munda and the Maoist,' *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 9.
- ^邻近地区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学校和他们要求国家为当地人民服务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因此受益。正是在这些有基督教传教士和皈依活动的地区，从 1930 年代起，出现了第一批要求为阿迪瓦西人提供土地权、森林权、教育和工作的阿迪瓦西社会运动。但在纳萨尔派安家的山区和森林里，尽管独立了 60 年，却很少有人试图将阿迪瓦西人当成印度国家的公民。

半个世纪的武装抵抗（三）

正如其种姓制度体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拥有典型等级制社会的国家，这些居住在丛林中的社区以其相对平等的价值观和他们对此的尊

严和自豪感而鹤立鸡群，这在同印度平原地区的种姓隔离社区相比较时显得尤为明显。这并不是说阿迪瓦西人内没有等级制度，也不是说阿迪瓦西人群体都是平等的，而是要表明，和农业平原上基于种姓的明显不平等比起来，这些丘陵和森林中的社区的平等主义精神实在是引人注目，这种精神使他们相对地免于产生因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撕裂。平等主义价值观体现在阿迪瓦西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宗族在自治的血亲团体上构建的方式；社群的领导方式；对生产和消费的态度；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处理。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印度森林社群以其无政府社会制度为特征，它们是有秩序的社会，却并不存在哪个持久的社会结构能够占据支配地位进行剥削。^[4] 在一些我熟悉的穆达人(Munda)和奥哈翁人(Oraon)的村庄，当地领导人是通过特殊的随机过程选出的。一个幽灵附身在一个蒙眼人的身上，而被附身的人在村里所有的房屋中走动，幽灵在谁家离开，谁家就是新领袖。这些精神巫术是如此民主，以至于谁能成为下一任领导人全凭运气。这是一种带有部落特色的曾被视为民主典范的古老雅典民主形式。领导人并不发号施令，而是推动讨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争端，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达成协议——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共识民主 (democracy by consensus)”。作为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一部分，他们还有责任耕种公田，公田的收成一年三次供全村人食用，并提供给任何处于困境的人。并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承担起领导职责，有些人把领导一职转交给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人。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能见到，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社会结构建立在相互照顾，分担责任的

平等主义社会价值观之上，不分地位高低、不看级别上下、无论魅力如何、财富多寡。^[2]

事实上，在阿迪瓦西人社会中，基于财富积累的内部分层通常不会得到鼓励。^[3]仅仅出于维持生计而进行的采集和生产是很常见的，许多人也只抱着及时行乐的态度生活。吃喝玩乐是阿迪瓦西人日常社交生活的核心部分，但这种消费首先是为了与他人分享而非炫耀优越感或标新立异。通过家庭间非货币化的劳动交换实现的互助和集体援助对生存至关重要。阿迪瓦西人自豪地继续集体狩猎和采集，并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像他们参与社群内的劳动交换一样：我盖房子你帮了忙，你盖房子我就帮你的忙；或者今天你帮我种田，明天我帮你种田。人们被视为自己生产和消费的主人，当他们无法依靠周围的东西生存，不得不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参加有薪劳动时，他们往往以类似的精神，作为“工资采集者”，将工资视为另一种为生存而采集的形式。^[4]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以男女不平等为标志性特征的国家中，和平原上高种姓社会相比，印度中东部森林里的妇女享有两性平等和经济、社会与性上的自由。不仅妇女在家外工作（有些妇女甚至去打猎），还经常看到男人做饭和做其他家务，如洗衣服、取水、扫地和照顾孩子。在喝酒和跳舞的时候，阿迪瓦西人的男性和女性一样热情地参加。我所生活的社区在性别平等上超越了西方几十年女权运动的成果，这一事实时时在我的脑中回荡。

尽管这些价值观不断遭到破坏和攻击，但阿迪瓦西人能保留他们的平等主义反正统文化无疑得益于国家官员没兴趣将他们纳入政府的公民归化项目，特别是他们仍然可以直接获得森林和土地的物质资源，这给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在不与外界产生过多交流或依赖的前提下，让自己的社群和价值观生生不息。

正是在这些相对平等的社群的土地上，纳萨尔派领导人找到了目标，希望引导他们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进行革命斗争。虽然包围这些社群的等级社会对它们结合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不同的平等主义理想和实践——纳萨尔派的和阿迪瓦西人的——还是在这里长期共存，互相交流。尽管这片土地过去曾令无数外来者折戟沉沙，但特别是从 1990 年代开始，这里的人民成为了纳萨尔派的主要支持来源。游击队也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壮大了力量，巩固了它们的军队。

多年来，各革命党派的地下领导人一直在进行团结各派系的讨论。在 2004 年，会谈取得了成果，建立了现在所称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和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将他们同印度政权的战争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从那时起，他们就被媒体和警方称为毛派。他们自己则自称纳萨尔派或毛派，在他们根据地的村庄中，他们也使用“党”，“丛林萨卡尔（意为“森林之国”，萨卡尔（Sarkar）是印度历史上的一种行政单位）”来称呼自己的组织。^[5]这些游击部队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变化，其

不断移动的特性更使外界时常高估其力量。在 2010 年，估计有一万名士兵在游击军服役，据说其人数还在不断上升。

他们在印度各邦的边界之外活动，并建立了拥有类似国家结构和地理划分的平行国家，这些分界线取代了各邦的边界，并且主要基于地理上的连续性和各个被压迫社群的分布来划分。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呈金字塔结构，政治局监督邦一级委员会执行运动中的政治组织工作。比哈尔-贾坎德-恰蒂斯加尔邦

(Bihar-Jharkhand-Chhattisgarh, 译注：贾坎德邦和恰蒂斯加尔邦均在 2000 年从原邦中分离建立) 是我曾经居住过的邦。丹达那拉尼亚 (Dandakaranya) 横跨南恰蒂斯加尔邦 (Chhattisgarh)，北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南奥里萨邦 (southern Odisha) 和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被认为是最坚固的游击堡垒。在这些毛主义地区之中都有二级区委会 (Regional Committee, RC) 以及下属的三级区委会 (Zonal Committee, ZC)，这两级区委会都在一级区委会 (Area Committee, AC) 之下，一级区委会监督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工作 (群众组织工作是非暴力且受非地下人员的领导)。那些被动员起来参加政治工作的人从底层开始干起，并缓慢提拔。尽管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和特定战术需要，但是目标都是跨地区实现战略统一。因此可以在全印各个地区找到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比如，在贾坎德邦常有来自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的人在一起工作。

这些政治结构由人民解放游击军 (People' s Liberation Guerrilla Army, PLGA) 支持。想加入游击队的村民首先被招募到当地的小队。如果他们坚持下去, 他们会被分配到排级单位 (大概 30 士兵组成), 然后是连级单位 (大概 80 到 90 名士兵组成) 以及最终的营级单位 (大概数百名士兵组成)。人民民兵由村民组成, 他们能在必要时刻聚集在一起, 使用剑, 棍和弓箭战斗。也有很多群众阵线, 如农民运动, 反迁移和反地雷阵线, 女性运动等等, 这些组织通常公开工作以便动员人民与每天影响他们的问题作斗争。但是这些群众阵线通常与游击队分开以便保护自己, 因为他们是公开活动而非地下, 所以面对印度当局的镇压会显得更加脆弱。

印度当局对这股日益增长的力量们的针对方案是使用枪杆子监督, 尽管政府之中有人反对这种以维稳为中心的方法^[6]。政府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对毛派发动的战争之间的联系是明确的。在 2009 年, 总理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 在国会说: “如果左翼激进主义继续在印度拥有大量矿产和其它珍贵自然资源的地区繁荣发展, 这必将影响投资环境。” 印度当局这次攻势的始作俑者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 (P. Chidambaram, 也曾是前财政部长) 曾是代表多家矿业公司的律师, 也曾是英国矿业公司瓦达塔 (Vedanta) 的非执行董事, 这家英国公司计划在印度各地开采铝土矿。一年后, 内政部的秘书称, 将会在 3 年内消灭阻止 800 亿投资的“叛乱分子”。但是, 在 2014 年, 毛主义者仍然坚持了下来, 新内政部长拉格纳斯·辛格 (Rajnath Singh) 保证在接

下来 3 年内将毛主义者全部消灭。2017 年，又一位继任者承诺将会以一场新的围剿来歼灭毛主义者。

双方曾经有过一些进行“和平谈判”的努力，最引人注目的是 2004 年，在安得拉邦，双方同意为一场促进会谈停火。毛主义高级领导人走出丛林并与印度当局展开会谈。首轮会谈讨论了纳萨尔派的许多要求，包括撤销对发动群众者的诉讼，释放政治犯以及撤销针对革命领导者的逮捕悬赏。同时也讨论了向农民分配土地的问题。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并且在首轮会谈之后，政府不愿为第二轮会谈停火。

会谈最终在 2005 年破裂。政府宣称纳萨尔派利用停火加强游击队，但是纳萨尔派声明政府利用会谈时间获取游击队最高领袖和游击队网络的信息。政府随后进行了激烈的镇压，摧毁了纳萨尔派在安得拉邦的组织。

在 2010 年，和平谈判被重新提起，但是因为负责谈判的毛主义中央委员会领导切鲁库里·拉吉库马尔（Cherukuri Rajkumar，大家叫他“阿扎德”，是“自由”的意思）被害而终止。毛主义者宣布政府再一次利用谈判来消灭毛派领导层。毛主义者声明阿扎德是在一次“假遭遇战”中被杀的——这实际上是一场自导自演的，表面上是对峙的法外处决——这种伎俩有着长期的历史。村民，士兵和领导人被警察抓走，在拘禁中被酷刑折磨并被杀害，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在遥远的森林里，以向世界表明这群纳萨尔派是在与警察的遭遇中，因警察自卫反击而死亡，尽管他们残缺的身体上到处都是酷刑的痕迹。我在拉尔冈（Lalgaon）的

日子里，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全国各地有 200 多起报告的假遭遇战案件，其中大部分是在纳萨尔派地区。^[7]

2004-2005 的“和平谈判”之后，印度政府实行了最残酷的反叛乱措施。在安得拉邦遭到镇压的纳萨尔派向位于南恰蒂斯加尔邦的丹达卡兰亚地区 (Dandakaranya) 撤退。2006 年，当地的年轻人被武装和动员起来清洗萨尔瓦·尤杜姆 (Salwa Judum) 的居民区，这意味在当地语言中的“纯洁狩猎 (Salwa Judum)”开始。在当地一位政治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他称这次动员为“和平游行”——狩猎活动从中产阶级和阿迪瓦西人中招募了受过教育的上流阶层青年，在警察和政府的资金和武器支持下，他们袭击了阿迪瓦西人村庄和被认为是纳萨尔派支持者的村民。据人权活动家称，整片村庄被劫掠并烧毁，孩子们被扔到火中烧死，孕妇被杀害，数百名女性被奸污，其他人被肢解或杀害，超过 35 万人被强迫离开家园。这使人想起了六十多年前英国反叛乱战略残忍地杀害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支持者的情形。在恰蒂斯加尔邦，许多人被杀害，其他人被强迫搬到像监狱一样的再安置集中营中。矿业公司等待进入这些地区，但是纳萨尔派声称，这些围剿计划只会让游击队获得更多战功。

随着村庄对游击队支持的增加，纳萨尔派干部也在不断增加，控制的领土也有所扩大——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安全部队将他们围困起来之前——他们可以依靠沿途的同情者的支持从印度的一个邦进入另一个邦。

-
- 翻译：镜鱼、卡米、酥酥狼
 - 校对：三角贸易

参考

- ^参考 Brian Morriss (2013) 'Anarchism, Individualism and South Indian Foragers: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Radical Anthropology*, November: 22–37.
- ^参考 Shah (2010) *In the Shadows of the State*.
- ^关于对穆赫亚人的精彩分析，见 Alfred Gell (1986) 'Newcomers to the World of Goods: Consumption among the Muria Gonds' in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0-38.
- ^参考 Nurit Bird David (1983) 'Wage-Gatherings: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the Case of the Naiken of South India' in P. Robb (ed.) *Rural South Asia*. Salem: Merrimack Publishing Circle, 57–86
- ^在本书中，作者将 "纳萨尔派" 和 "毛派" 互换使用。
- ^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2008 年）的一份报告认为，毛主义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必须被视为一场为社会正义、平等、保护、安全和地方发展而进行的斗争。Government of India (2008)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Extremist Affected Areas: Report of an Expert Group to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然而，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主张采取更有力的以安全为中心的方法，在向议会提交该报告时，该报告受到了青睐。见 K.S. Subramanian (2010) 'State Response to Maoist Violence in India: A Critical Assess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7 August: 23-26.
- ^参考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555-fake-encounter-cases-registered-across-india-in-last-four-years/article4916004.ece>. 作者上次能够访问是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

居于泥屋

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很难说我的旅程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许在我出生在内罗毕的印度裔聚居的郊区之前，就已经开始。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我的祖父母乘着季风从古吉拉特邦卡奇湾附近贫困、干燥、灰暗的村庄航行到非洲谋生。英国王室在 19 世纪末铺设了印度铁路后，

从印度招募合同工人去修建从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到维多利亚湖的铁路。我的祖父母们就这样踏上了这条 20 世纪初由英国王室推动的，有无数人走过的路。当抵达蒙巴萨的时候，我的祖父 16 岁，将前往内罗毕开始他的新生活。

我的祖母叫莫蒂，在她被她的叔叔婶婶嫁给我的祖父前从未见过他。在他们结婚一年后，祖母动身去找祖父。她乘坐一艘载有八十名乘客的小单桅帆船起航。在旅途开始数周后，季风停息了。在被印度洋的低气压困住三天后，他们的饮用水即将耗尽。15 岁的莫蒂待在拥挤船舱的热浪之中，处在前往未知大陆和未曾谋面的丈夫见面的路上，认为他们都将死去。当我在印度东部的旅途中最艰难的时刻，想起我祖母面对这些未知的毅力时，我的恐惧和苦难就变得微不足道起来。

尽管我祖父母都是文盲，但他们勤劳工作并为后代的教育倾其所有。他们把我的父亲送去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医学院读书。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祖父已经从一位别人商店的扫工，变成了自己商店的主人。我们的故事在这一代东非古吉拉特移民中非常普遍。其他人则更有野心，我父亲的一些朋友建立了非洲的第一家糖果厂，第一家纺织厂和第一家炼油厂，他们将产业扩展到全世界，比如西非和东南亚，并且在世界上最富有的非洲和亚裔英国人的榜单上名列前茅，身价至少有 20 亿美元。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教育我去质疑这种财富积累所带来的不平等，并让我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积累正是建立在当地基库尤人 (Kikuyu) 劳工，阿坎巴人 (Akamba) 劳工和洛人 (Luo) 劳工的苦难上。

多年以来，面对周围人所接受的价值观，我父亲用强烈的反物质主义去回应他们。当他的朋友们奢侈地坐在有空调的奔驰车上的时候，我父亲自豪地坚持要把他的十二座面包车塞进两倍于此的人并载着他们穿越全国，还硬说汽车只有一个用途：尽可能多地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同时在他的朋友们将新积累的财富挥霍在寻求精神导师、崇拜耆那教僧侣并用黄金修建新的大理石寺庙的地基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世俗。我从我的父亲那里学会了质疑周围世界的不公。但我也学会了去质疑他。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英国，在那时人们期望女孩去上大学并找到一份有偿工作，因为仅靠一个人的薪水是无法满足大多数古吉拉特中产阶级家庭的开支的。一份对女性合适的工作有着严格的界限，就像寻找一个合适的男孩结婚一样。当时在我父亲看来，我和我三个姐妹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找到体面的工作，例如——成为一名牙医，验光师或者药剂师。这些工作让我们有合理的工作时间并能让我们实现我们的主要使命——照顾我们的孩子，丈夫以及更广泛的家人。然而我有不同的期望，尽管我当时很幼稚。我想追求比家庭更崇高的东西，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在剑桥大学学习地理，之后在各种国际发展组织工作。从为一家小型慈善机构在德里的贫民窟里给流离失所的儿童上课开始，我发现自己正

经过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那闪闪发光的玻璃中庭，最终来到了它的“减贫与经济管理”部门实习。但我开始对一种似乎很普遍的做法感到失望，这种做法把贫穷变成了一种产业，从与贫穷有关的活动中获益，

却很少质疑产生贫困的根本性不平等。我越来越相信，旨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项目必须从那些边缘化、受压迫、被排斥的人们不同角度和经历出发——他们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经常被压制。带着这些想法，我回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正是在大学里，我发现了纳萨尔派，以及社会人类学家所说的“参与式观察法”——一种相当奇特的民族志研究实践，如今很少有人类学家有时间去研究。参与式观察法是在 20 世纪初，由出生于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他从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研究归来。这一方法被用以纠正那些坐在遥远的扶手椅上，通过传教士或旅游写作的二手资料，或一些访谈和短期调查访问而做成的研究。通过长期与当地人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并参与他们的日常、尽可能全方面地探索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文化环境中和他们积极互动——这种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能够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新的见解，并且揭示那些我们可能永远看不见的隐藏过程^[1]。被训练成为一名人类学家似乎很重要，因为这是一条途径，通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需要的答案。于是，23 岁的我，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出发前往印度。

我选择去这个国家的另一边，而不是去我祖辈的故乡；去一个远房亲戚不会出于保护意识和社交礼仪而阻止我行动的地方，去印度远东偏僻的森林和山区——在那里我不认识任何人。在贾坎德邦，在一个有一百间

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泥房子的村庄里，我和穆达人部落原住民一起生活了两年半。

这里是世界上最贫穷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从基层去了解那些旨在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各种尝试的优点和局限性——不管是来自国际发展机构还是基层社会运动。我想知道，世界上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印度的原住民，是如何经历和参与由国家或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在社会转型方面的不同尝试。

在贾坎德邦，我看到，发展基金是如何在得以惠及最贫穷的人之前，就被当地精英拿走；我看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开着他们的路虎车来到森林村庄，与当地精英交谈，完成他们的“参与式社区发展”任务，然后在白天的“安全时刻”之内赶回城市，而最贫穷的部落民则躲藏在森林里，直到外来者离开；我也看到，在选举日，最强大党派的暴徒是如何收买选票和偷走票盒，而最贫穷的部落民是如何想让国家远离他们的生活。我还看到为跨国公司探索该地区采矿潜力的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官员，他们在万寿菊花环的迎接下，降落在兰契机场，想办法解决从原住民那里获得土地的问题。

直到在贾坎德邦的这段时期结束时，我才第一次偶然发现纳萨尔派。他们的森林军队在该地区扩张，正在招募我村里的朋友们。

“他们只是罪犯，”我的研究助理说。她是一个来自兰契市的中产阶级、高等种姓女孩。

表面上，她似乎是对的。事实上，我在第一本书《在国家的阴影下》就是这样写的：纳萨尔派是保护性的敲诈者，接管了当地的寻租市场。作为介绍他们进入村庄的交换条件，他们为我的朋友提供枪支保护，以吸走进入该地区的一些资金，作为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资金，如修建道路、水坝或桥梁。这些资金原本该进入本地有权有势的人——政治家们、政府官员、承包商和乡贤们的口袋里。

但我博士期间的导师，世界上最好的人类学学者之一，来到贾坎德邦，我居住的村庄里拜访我，并以他特有的低调方式问道：“他们真的只是一群暴徒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当时我得回到伦敦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我仍在远方关注着纳萨尔派的新闻。尽管家乡的生活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成为了一名大学讲师，我有学生要教，我结婚了……但我越来越被纳萨尔派所要实现的目标所吸引。他们走到一起，或者说，他们要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而推翻世界上最不公正、最富权势的国家之一。他们似乎沉浸在我离开的，在印度中部和东部的社区的生活中，就像我曾经那样，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生活。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他们的地下武装据说也在不断增大。然而，国际社会对当时围绕着印度的内部战争似乎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沉默。与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主义者发起的运动不同，纳萨尔派很大程度上不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所知，但他们（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在自己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也崇尚其他类似的远方

土著的斗争。我知道我必须回到贾坎德邦的森林中，以了解印度原住民如何以及为何拿起武器为一个不同的世界而战。

这就是为什么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在我第一次去贾坎德邦的十年后，我发现自己曾在游击队称为“红色首都”——拉尔冈的一个村庄生活了一年半。我无法预料，当我重新踏上贾坎德邦时，印度政府会不会正好发动军事力量来剿灭游击队。

“绿色狩猎行动”始于 2008 年秋天。一车一车的部队从全国各地涌来，在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平原上，在学校、医院和任何其他他们能找到的公共建筑里扎下营寨。虽然他们包围了我居住的原住民丘陵，但没有个五百人左右的部队的话，他们是不敢进入这里的森林的。在他们的巡逻中，司机们被派到前面开着坦克和防弹车进行侦察，但部队都是步行过来的，因为毛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巡逻路线上埋设了用来炸毁车辆的地雷。通往拉尔冈——我住的地方——的那条路，被认为是全印度地雷最多的道路。

除非有安保部队的陪同，记者是不允许进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的。同情游击队的记者和捍卫印度低种姓人群权利的人权活动家都被关进了监狱^[2]。警察窃听了游击队据点以外仅有的几个电话网络。当我意识到，自己因为害怕被发现在用外语给国外打电话，好几周没给我英国的丈夫打电话时，我好奇自己在那段时间，在那片野地里都干了啥。我已经沉浸在试图了解我的新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侄子侄女的生活中。

后来，在这些清剿叛乱行动的高峰期，2010年2月，我收到了期待已久的邀请，去采访一位我还没有见过的毛派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我离开贾坎德邦的泥屋，前往邻近的比哈尔邦。那时，我还以为这只是一次持续两天的旅程。

参考

[^]注释 1: 关于在纳萨尔派中进行的参与式观察如何影响了我对人类学实践的理解，请参见 Alpa Shah (2017) *Ethnograph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Praxi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7 (1): 45-59.

[^]注释 2: 例如，见 Iliina Sen 的回忆录中，她与 Binayak Sen 的生活，后者于 2010 年被监禁。Iliina Sen (2014) *Inside Chhattisgarh*. 新德里：企鹅出版社。

第二部分：普拉桑特，羊群中的孩子

第一节：与游击队会面

安全部队的载具已经离开。但我们在尘土飞扬的路边上的五金店铺里等待时，我的胃仍然翻腾着。一位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从棚屋的侧面出现了，好像他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同我们一起等人一样。

那个有些斜视的男人（即前文与作者接头的男人，前文错误翻译成了“眯着眼睛的男人”）只被交代了足够将我们从大巴站带到这个店铺的信息。他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保密工作，即人们被给予只够完成特定任务的信息，在战争的背景下是十分关键的。这让被跟踪的难度更大。而且，如果我们其中之一被逮捕的话，就算在警察的折磨下能够

交代的信息也十分有限。我和那个有些斜视的男人没有交谈过，但仅仅是简单地跟随他就已经让他在这样的未知区域中变得熟悉而可靠。我看着他离开的时候很紧张。告别了有些斜视的男人，我开始跟随穿着牛仔裤的男人。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喧闹的集市。在前方，是一片开放的稻田。而远处，是标志着村庄的泥巴房子。

更远处则是连绵的丘陵——我猜测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在右侧，穿过平原，装甲输送车和坦克沿着道路正在移动到另一个村庄。我们吃力地爬下到一条两岸有干枯灌木丛的龟裂河床，沿着它远离集市村庄。穿着牛仔裤的男人说，这条路比沿着稻田走要远，但在河床里更不容易被看到，也更不容易遇见路人。

我们停下了两次。每次都是因为我需要呕吐。我很羞愧于拖了他后腿，但对于他没有对此发牢骚而感到松了一口气。穿牛仔裤的男人只是站在一旁，直到我可以继续赶路。但是他打开了手机。他想要通过打电话搞来一辆摩托车。我心中警铃大作，阻止了他。我担心由于寻找摩托车可能引起的不必要的关注和延误，我说我们应该像之前计划的那样继续前进。

黄昏，我们进入了位于村庄边缘一栋泥房的空前院。年轻男人告诉我在这里等着之后就消失了。我坐在台阶上，背靠在挂了锁的房门上小憩。台阶上盖了一层常见的泥土和牛粪的混合物，使它看起来像一块光滑闪亮的巧克力板。过了二十分钟，天色渐渐变暗，年轻男人还没有回来，

弯弯的新月使早晨醉汉蹒跚着印在泥台阶上的脚印诡谲地映入我的眼帘。我将自己沉浸在发甜的泥土和牛粪气味中，以求平静下来。

我看着手表上指针的跳动，变得十分焦急。但时间在印度的农村是以不同方式运转的。人们在站台上等六七个小时晚点的火车也不会焦虑沮丧。或者，如果一辆公交由于轮胎漏气停运几个小时，乘客也只会没有牢骚地等待着。年轻人们可以花几个小时仅仅为了观察时间的流逝。我试图提醒自己在一年半以来作为自己家园的“红色首都”贾坎德的森林中已经等待过的时间。我需要耐心一点。

年轻男人在半个小时后回来了。他说我们应该趁着“绿色狩猎”巡逻队返回基地的时候赶路到山丘前的下一个村庄。安全部队已经完成他们白天的耀武扬威，而夜晚，他说，永远是属于毛主义者们的。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多，走过了最后一间泥屋，冲着山谷的方向有着几个黑影，他们在深蓝的夜空下十分显眼。突然，在月光下，一个高大孔武，肩上背着 AK-47 步枪轮廓的黑影走向了我們。他身后的阴影中出现了至少十来个人。

“Lal salaam, didi (红色的敬意，姐妹)，”他说，伸出他的手握了握我的，然后将拳头挥向空中，行了个常见的纳萨尔派的礼。

“我是普拉桑特 (Prashant)，”他说。

他的声音意外地甜美而富有韵律。“普拉桑特”是个化名。游击队总会给大家起一个新的名字，通常是一位最近牺牲的游击队士兵的名字，这

样他们就能在游击队一次次的重命名中永志不忘。改名换姓对于保护游击队员的身份和他们那些不参加活动的家人的安全尤为重要。不过，大多数更年轻些的纳萨尔派不会把名字告诉对方，即使他们事先知道他们要见的人是谁。普拉桑特向我介绍自己的方式让我觉得他非常慷慨又友善。

作为报答，我本来也想介绍一下自己，但我想不起来自己是以哪个化名加入的这次旅途。它改了太多次。

当他走近时，我看到普拉桑特也就不到三十岁。他英姿飒爽地穿着游击队橄榄绿色的军服，一只手里拿着绿色的帽子。丝绸一般的深棕色头发耷拉在他的额头上，勾勒出他轮廓分明的脸。他的鼻子英俊，颧骨高挺，皮肤白皙无暇、泛着光泽。他大大的微笑立刻让我轻松了许多。

普拉桑特在一棵菩提树下铺开了一张垫子。他说“绿色狩猎”巡逻队造成了一些混乱。另一半的游击队员在另一个村子等着我们。他们很快就会来。

他打开了自己的帆布背包，拿出了一个不锈钢的大口杯。他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一个被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袋子，他打开它，露出里面的白色粉末。他将白色粉末和水倒进杯子，用一根小树枝将它们搅拌混合。那是盐和糖。他被告知我在旅途中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带来了补水的必需品。我喝下了那杯混合物，躺在了垫子上。

我知道，还有更多的事物在前方等着我，更多的组织，和更多的夜中行军。但我已经不用再时刻警戒了。我处于他们的保护中。我闭上了眼睛，在半梦半醒间漂浮。在那一刻，我也从“地表”漂流到了属于游击队的“地下”世界。

虽然天色仍然阴暗，但是柔和灰光已在天空中蔓延。我花了一分钟来确定我的方位。我处在一棵罗望子树下。小鸟在歌唱，人们在交谈。前一晚我又虚弱又难受，几乎没发现游击队的领导人们来了，士兵在我周围来来去去，在我们躺下休息之前决定好我们应该向目的地走多远。

一把看起来多年没有使用的旧步枪冰冷的枪管竖在我面前。它把我和棕色毯子下矮小，驼背的身体分隔开。唯一暴露在外的是安详睡着的小麦色脸。小麦色是因为长久暴露在阳光下的缘故。他就是吉安吉，我一年多前在贾坎德邦第一次见到的毛派高级领导人，这次比哈尔邦之行就是他安排的。

吉安吉睁开眼睛对我微笑，在他温暖而有趣的眼睛周围皱纹极深。他坐起来伸展胳膊，打了哈欠，并问我昨晚是否睡好。他说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他拉了一下作为枕头的橄榄绿毛衣，拿起放在他身边的一副细长黑色塑料边框眼镜放在鼻梁之上，并拿出一把粉红色的塑料齿小梳子整理头发。一片白发根从遮住他秃顶的黑发里探出。显然染料质量不好，

吉安吉没来得及重新染发。但是这向我表明，尽管吉安吉生活简朴，但是他关心自己的外表，这是一种人性化的品质。

他小心地叠好毯子和床单，拉开一个包装整齐的蓝色帆布包并将被褥放进去。毛派游击队在移动中总是和衣而睡，只是脱掉鞋子，所以他们能在几秒内起床准备好出发。我看着他，感觉自己非常狼狈，因为我知道他只有两套衣服并且可能多日未洗，但是他的衣服一尘不染，橄榄绿的制服上没有一点褶皱。

在吉安吉的左边，一块巨石的侧面，另一位高级领导人正在起床。看到他，我想起前一天晚上正是他考虑到太晚无法到达目的地才把我们带到这个休息点。巨石之间的土地非常平坦，枝繁叶茂的罗望子树吸引了他，因为它能在夜间提供温暖。其他游击队员散布在我们周围的山坡上，在岩石和灌木丛中。每个人都在准备行动。折叠被褥，整顿军装，穿上鞋子。我们总共有大约 20 人。

看见普拉桑特在附近的一棵番石榴树下揉眼睛，然后卷起他用来睡觉的蓝色塑料布。我告诉了吉安吉前一晚上普拉桑特是多么热情善良，他点了点头告诉我说，普拉桑特是年轻一代中最优秀的分子之一。他聪明而忠诚，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很尊重，同样也受到他们的爱戴。他是基层干部的优秀老师，也是他们之中最好的战士之一。吉安吉说，他们对他寄予厚望。

我和普拉桑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逐渐熟络。他告诉我，他出生在一个离环绕我们的比哈尔邦南部稻田不远的小农家庭。这片土地在 1980 年代变成了印度著名的“热战地带”，纳萨尔派正是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

普拉桑特记得，对贫困的农村孩子来说，那是一个狂欢和兴奋的时刻。游击队不仅从最低的种姓，也开始在中等种姓的小农里吸收支持者，比如普拉桑特所在社区的那些传统的牧民。他们带着枪从一个村子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号召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一起带来的文化队唱歌打鼓。他们晚上与村民召开秘密会议，计划武装起义。

那时候普拉桑特对学校感到厌倦，老师们很少出现，即使来了，也不过是照本宣科，无休无止地重复一些和年轻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数字和事实。普拉桑特经常逃课去森林帮家里放羊。在那里他遇到了游击队，好奇地观察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且渐渐被这些人迷住了，每天都去看他们。纳萨尔派因此认识了他，这个羊群中眼睛明亮的孩子。

游击队允许普拉桑特在清理和擦拭武器的时候呆在旁边，有时也让他来帮忙。他看着他们进行演习，读书，写传单，洗衣服，做饭，被那些革命歌曲迷住了，也想像游击队员们一样用枪。

在一个冬日，当他的兄弟们都出去放水牛、奶牛和山羊，而父母也在给芥菜地灌溉除草的时候，普拉桑特跑进了纳萨尔派营地所在的森林。他除了一条棕色的毛线披肩以外什么都没有带。他说他想留下来。

之后他才知道母亲在他离开以后的两周里几乎什么也没吃，从早到晚地哭，叔叔们找遍了森林。父亲请受过教育的邻居帮忙给纳萨尔派写信，希望他们把儿子送回来。

三周以后普拉桑特回到家里，他说他的母亲紧紧抱住他，亲吻他，抚摸他的头直到再也流不出眼泪。她拿出了咖喱鸡和牛奶。普拉桑特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沉默，但是饭吃完，母亲也平静下来以后，他摸她的脚表示尊重，并且告诉她，除了一件事以外，自己愿意为她做任何事。他说，他不会离开新的纳萨尔大家庭回到村里。而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

普拉桑特和其他加入纳萨尔派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文化部队的一员，这是他们的非武装部门。在那里他学会了创作歌曲，读书和写作。他从小只会讲本地的博杰普尔方言，在游击队里却学会了印地语和少量的英语。Kranti, Vidroh and Samyavad——革命，造*反和共产主义成了他的口头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就是他的神。

可想而知，这种新生活是激动人心的。普拉桑特见到了来自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同志，尼泊尔的活动家，菲律宾共产党的战士，了解到了遍及全球的革命斗争。他看着美国人们笨拙地用手吃饭，发现尼泊尔人用高压锅来做炸弹。令他感到有趣的是，菲律宾人早晨锻炼的时候以转头开始，而在印度，一般先活动脚。

但是在 1990 年代，当高种姓的地主对纳萨尔派以及它的支持者的报复升级之后，兰维尔军^[4]把普拉桑特的表弟的房子夷为了平地。不久他出

生的家也化为了灰烬。他的许多表兄弟以前只是同情者，也和他一同满腔怒火地加入了纳萨尔派的军队。普拉桑特此时已经十六岁了，正准备好成为一位正式的纳萨尔战士。

翻译：三角贸易、酥酥狼、卡米

校对：余烬、镜鱼

参考

[^]兰维尔军 (Ranvir Sena) 是一个主要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民兵组织，其作用是保护地主团体。该团体是由布米哈尔族的地主于 1994 年组成的，目的是抵抗各种左派武装分子，如纳萨尔派和印度共产党在比哈尔邦中部的影响。兰维尔军与许多屠杀有关。

第二节：林中之城

在普拉桑特带领下，我们进一步深入群山，排成一队进入森林，停在一条小溪旁。小溪水深不超过几厘米，只在石缝间有几滴水，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吉安吉给了我一个蓝黄相间的塑料包装袋，上面印着花花绿绿的薯片图画和“乐事，印度魔法咖喱味”的广告语。包装袋的一头被齐刷刷地剪断，这样装满水后就可以当花洒使用。每个人都拿出了类似的包装容器，

包装袋的来源五花八门，芥子油、葵花籽油、花生、薯片，装什么的都有。

这是前往“二号”点路程间的一次休息，这时候大家可以“响应大自然的召唤”，意思就是可以排空肠胃，然后用水清洁一下。

游击队员们在丛林和山岩间散开，普拉桑特在石头上放了一块肥皂，让大家轮着用，然后帮我往袋子里装满水。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拎走，捏住袋口不让水撒出来，然后找了一片竹子缩在中间解决生理问题。我发现把这袋子放石头上还挺稳的。

十五分钟后，我们又准备好出发了。同时进行“自然的召唤”对我来说还挺惊讶和有趣的。上厕所不是一种需要避讳的私人身体机能，而和吃喝一样被视作是一种日常公共需要。

我们排成一队继续前进，地形迅速从绿色的森林变成了多岩石的山丘。当我们在崎岖的地形中寻找道路时，吉安吉走在我们前面。这里就如同几个世纪前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山在此崩塌所留下的遗迹一样，金合欢树和带刺的灌木在岩缝中发芽生长。我们经过这里时当地还不是旱季，但到处看上去已经光秃秃的了。

走了一个半小时后，一个身穿橄榄绿制服的年轻人出现在灌木丛中，肩上挎着一把旧步枪。他身后有五个衣着相似的人，相距几米。我怀疑这里是到我们目的地前见到的第一个哨所。

“Lal salaam, lal salaam (革命万岁)”，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同我们握手，向空中高举握紧的拳头。最后一个士兵穿着一件印有“我不可靠，效率低下，不可预测，无组织，无纪律，不成熟，但我很有趣”字样的黑T恤，这样的文字和士兵们为迎接我们列出的整齐队列对比强烈，把我逗乐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又经过了两个岗哨，然后回到了森林地带。晨曦穿过树梢，照亮了一片林中空地。我一边眨眼，一边感到难以置信。我们面前环抱的三面花岗岩山峦中蛛网一般蔓延出许多小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五光十色，熠熠生辉。灌木丛中开辟出的这些小道排列着齐腰的花环和彩旗。剪成三角形的彩纸被几十只手整齐地粘在麻绳上。这些小路连接着各大帐篷。

我在贾坎德邦的森林中见过好几次毛派的营地，但我还是对这样的景象毫无准备。那是一座坐落在山林中的喜庆小城。我感觉好似穿越到托尔金《指环王》的世界中，偶然间发现了吉尔加拉德治下的林顿，精灵的天堂王国。同古尔冈、新德里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相去甚远，这座营地美丽却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地无常。这里的一切都可以在十二个小时内被拆得干干净净，之后则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能看出些许蛛丝马迹。

帐篷里容纳着游击队的各个职能部门。这里还有一个医疗帐篷，一个裁缝帐篷和一个“电脑机房”，里面有一台脏兮兮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和一台破旧的灰色打印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电线连接到一台拖拉机电池供

电的。另一端还有一系列帐篷隔间。厕所大部分是蹲坑，甚至还有一个白色陶瓷马桶。

在营地中心有一个红黄相间的大帐篷，帐篷顶是绿的。这里是中央会议室，至少能容纳一百人。七张装裱好的黑白照片挂在一面红布墙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字排开。在这些国际共运导师之下是查鲁·马宗达和坎哈伊·查特吉这两位 60 年代的纳萨尔派领导人，现在被毛派游击队作为印度革命的导师来纪念。所有的照片都装饰着金盏花。在这堵照片墙的一角挂着一幅简陋的手工画，画的是一个人拿枪指着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的头。旁边还有一幅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类似画像，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国大党主席嫁到了尼赫鲁-甘地家族，自印度脱离英国统治以来，除开少数几个特别的年头，尼赫鲁-甘地家族一直在印度政坛担任主要职位。

在营地的边缘，有一大块当操场用的开阔空地，在那里聚集着至少 200 名年轻男子。一组人正沿逆时针方向绕着操场跑步，互相之间保持十米间距。另一组人则往反方向跑。操场中间的人排成十条整齐的队伍，步调一致地跳起来做开合跳训练。这是人民解放游击军（People' s Liberation Guerrilla Army）在进行日常的晨练。

令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营地设计精妙的厨房。一袋袋大米和小扁豆堆成两堵高高的围墙，而一条小溪组成了第三堵。为了向营地提供干净的水源，溪流的一侧巧妙地挖了一口井，这口井用大石块加固，并使用滑轮系统进行操作。厨房中间挖了三条长短不一的沟。每条沟里都有熊熊燃

烧的火堆，上面放着大铝桶。我猜是在煮米饭和木豆或土豆咖喱。年轻人们盘腿坐在地上，给那些不吃米饭的人擀薄饼。

我们来到了毛派邦级委员会 (State-level Committee of the Maoists) 的会议现场，这一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召集了来自北方邦和比哈尔邦邻近地区的所有游击队员。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经过了长达 14 个日夜的跋涉才来到这里。很难得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总人数是多少，也许有 400 人左右。有人告诉我，类似的会议在贾坎德邦其他地区的农村，以及印度中部和东部的恰蒂斯加尔邦、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和安得拉邦的森林中同时进行着。

在每个会议上，都将对前几年的毛派活动进行分析和评估，制订未来计划，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将对关键决策进行集体讨论，并在激烈的辩论后通过表决给出结论，得到多数人支持的决议将对所有人生效。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这一被列宁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机制萌芽于巴黎公社，并被列宁用于组建布尔什维克党。

会议也是毛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地方，每个士兵在这里都会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详尽的坦白并接受公开批评，这是许多受到毛主义启发的政党，从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军 (Zimbabwe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到红色高棉 (Khmer Rouge)，都会进行的旨在加强团队凝聚力和纪律的尝试。会议也是决定晋升和干部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对于毛派领导人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建立团队归属感、重温革命初心、加强内部团结的绝佳机会。在理想情况下，将这些打散到全国各地、甚至偶尔是孤军奋战的战士们聚在一起呆上几周可以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初衷是希望能在这里创造一个他们为之奋斗的无种姓、无阶级的未来乌托邦社会的微观缩影。

与周围那些种姓隔离的印度村庄相反。在游击队社区里，种姓制度已经被消除，人人皆同志，互相之间的称呼也使用新的方式。当你想表达对于年长者的尊重时，可以称呼他们“达达”（dada）或者“迪迪”（didi）（哥哥或姐姐），或者在名字后面加上后缀“吉”（ji）。物质上的差异必须被消除。理想状况下，人们什么也不要带进游击队，而由游击队平等供应生活必需的一切，这包括一套制服、一套便服，一条毯子，一条床单，一条塑料布，一个背包和一块肥皂。在外界根据种姓，阶级，性别等级制度所造成的劳动分工也将被根除。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要参与到炊事轮班表里。同时，基层干部要学会如何阅读，领导人则要去挖厕所。

我意识到我会在这里待不止两天。普拉桑特把我带到一个相对较小，内部却十分宽敞的帐篷里，营地里的另外四位妇女睡在里面。其中两个女孩——她们的年龄还不满十八岁——立刻带我沿着一条小道来到了被一片芒果树遮蔽的树林。在那里等着我的是一桶水。

一个皮肤黝黑，身上满是泡沫的女孩在附近洗头并对我笑。胸前系着的黑色衬裙一直覆盖到她的膝盖。我也学着她，解开了我的莎丽（sari），

把我的蓝色莎笼 (sarong) 系在身上。幸运的是，在过去一年半里，我已经掌握了不脱衣服洗澡的技巧。女孩们聚集在我的身边，和我调笑：“我们能帮你搓背吗，迪迪？”她们问道，“卫宝 (Lifebuoy) 肥皂行吗？还是说你更喜欢多芬 (Dove)，迪迪？”

我对她们对我阶级背景所做的假设感到好奇。无论我在丛林里生活多长时间，我的阶级身份始终会刻在我的形象上——无论是身体特征，还是走路姿势或说话方式。她们应当不知道我的过去，所以我很难告诉她们我曾在阿迪瓦西人中生活过数年，而且事实上我喜欢用她们在河岸发现的黑色淤泥来洗头。

第三节：女扮男装

洗漱完毕，其中一个女孩主动带我去厨房吃早餐。我们走过一个帐篷，里边有几个男人正在休息和看书。我看见一本有关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的书籍，它被放在一堆背包的上边。然后我就看到了普拉桑特，他坐在地上，双腿向前伸直，深深地沉浸在一本泛黄的、被虫蛀过的平装书中。我本不愿意打扰他，但最终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普拉桑特微笑着加入了我们。我问他在看什么书。他手头有几本书，有一些泰戈尔的浪漫诗集，也有古尔扎的绿色诗歌。不过，他正在读的是一本有关基础医学的书。他说，“绿色狩猎行动”让同志们很难去医院

找医生，他想学点至少是治疗基本的疾病和伤口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依赖“外部”世界了。

在厨房里，我们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们都穿着制服，在做饭、吃饭和说笑。不难发现普拉桑特其实是那种永远开心、热情和迷人的人，他和所有人都聊得起来，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他端来一个盘子，装满了鹰嘴豆粉和洋葱的混合物，还拿了个生的青辣椒来调味。他还拿着一个小碗，里边装着黏糊糊的绿色酱。这个东西是用辣椒和大蒜在火上烤过，然后加入少许芥末油磨成糊状制成的。在没有其他东西下米饭的时候，它可以提供风味。他把它叫做“炸弹酸辣酱”，还问我要不要尝尝。

当我们吃完饭后，走到附近的森林空地上时，我的舌头都还是麻的。

“这是个什么名字？”一个骨瘦如柴，但是目光有神而自信满满的老人问道。他正盘腿坐在林间有阳光的地方，只有一条腰布缠在腰间。两个男孩站在他的两边，按摩他的背部和手臂。他躯干上闪闪发光的黑色皮肤褶皱显示，这人至少有七十岁了。

“这是个男人的名字，”他说，“不合适女人，换一个吧。”

我被介绍为“杜尔伽”，这是印度教中无畏的、不可战胜的、不可接近的权力女神，负责创造、保护和毁灭世界。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需要她的力量。

他上下打量了我。我换上的紧身牛仔裤和合身的无领长袖衬衫突然显得太过暴露。他叫普拉桑特给“客人”拿点新的衣服。

“是的，比马吉 (Bimalji) ¹⁰，” 普拉桑特回答。我当时意识到，这就是我前来采访的人，他是印度的这片土地上最年长的老游击战士。我坚持说我还有别的衣服在晾干，但普拉桑特已经穿过树林消失了。

我看着两个男孩各自把自己的肩膀顶到比马吉的腋下，帮助他站起来走路。作为印度的头号通缉犯之一，他是如何在一支不断行动的游击队中生存下来的？比马吉好像是读出了我的内心想法，他笑了笑，说：“革命是永不退休的。”

在这位男领导人的帐篷里，比马吉开始讲他的故事。那是 1969 年，最初的纳萨尔起义的两年后。他被派到离现在这里不远的的一个贫穷的乡村学校当老师，那时他遇到了一个正在为革命事业编辑杂志的同志。年轻的比马吉被这位领袖和他的信息所吸引，希望加入他们的斗争，一同反对比哈尔邦的封建高种姓地主对无地劳动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剥削。革命组织正需要像他这样热心的青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辞了他的教职，到比哈尔邦的农业平原开展他们的地下工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被派往被称为印度煤都的丹巴德市 (Dhanbad)，在那里，他与产业工人和工会一起工作了 20 年，并帮助编辑和出版一本叫做《红色火花 (Lal Chingari) 》的杂志。

听到这本杂志的名字后，我当时就意识到，他是少数几个创立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Maoist Communist Centre）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被认为是所有纳萨尔团体中最无情和最暴力的。多年来，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曾一直在与我认识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所属的组织进行斗争。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创始人坎哈伊·查特吉（Kanhai Chatterjee）和阿穆亚·森（Amulya Sen）一直与查鲁·马宗达保持距离。他们批评了马宗达的一些政策——比如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为“阶级敌人”的群体中的个人——并且从他们的早期开始，就试图优先建立国家无法介入的根据地。尽管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现在重新将查鲁·马宗达和坎哈伊·查特吉都视作其领导人，但多年来，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曾一直与那些声称继承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宗达政策遗产的组织处于对立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比哈尔邦进行地盘争夺战时，纳萨尔派各派别之间的战斗已经非常激烈，杀了很多人，以至于毛派现在称那段时间为“黑色篇章”。

我看了看帐篷里另外的四个男人——两名正在忙于电脑上的工作，一名正在阅读，而另一名正在睡觉，此君曾经属于敌对的派系。今晚，比马吉就要睡在他曾经被下令要杀死的人身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本想问问他关于这些党内分歧的事情。曾经试图杀死彼此的两人是怎么可能做到在一起合作的？不过，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问题有些令人不适，他改变了讲话的策略。

“不能如此讲述这四十二年来的历史。”他说，“我们需要从更早的时候讲起，事实上，得从1962年和中国打仗的时候讲起。”他的语气一变，我突然感觉自己在听一场由印共毛主义领袖讲述的一场十分博学的，关于纳萨尔派官方历史的大学讲座。也许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故事以一种过于个人的方式开场，以至于他已经说了太多，以至于让我问了过多困难的问题，不过，正在他继续着自己的独白的时候，我的疲倦接管了我，而且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我睡着了。

八个小时之后，我被艳粉与橙黄色光线所织成的条纹唤醒。比马吉很显然阻止了其他人叫醒我。冉冉升起的太阳正在照耀着这个帐篷。

普拉桑特一边伸展着胳膊一边等待，他拿着一个布袋子。“Didi(姐姐),”他一边说着，一边给了我那个袋子，“你喜欢红色，是不是？你之前穿的衣服就是红色的。”我打开了那个袋子，发现了一套绣有刺绣的纱丽。我走出去，在树后试了试这套衣服。深红的裙子从紧紧裹着我躯干的绿金色相间的上衣倾泄下来。传统衣物中的紧身裤比我的牛仔裤还要紧绷皮肤。比马吉会怎么说普拉桑特这次买的东西？我拿绿色薄绸制的杜帕塔围巾遮住了我的胸部以示稳重，然后便回到了帐篷。

虽然我是来见比马吉的，但我发现自己和他的正式会谈又长又无聊，而且内容很难超越我已经知道的惯常历史。他看起来总是戒备着，我永远没法插话问一句超过毛主义者所热衷于宣传的官方历史和表态的问题。但是，正如长期、开放式的民族志研究经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官方的

采访一般是最少有所揭露的，最有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你没办法预料的时候。

在我留在游击队营地的两夜间，我发现吉安吉会带着一队人从比哈尔回到贾坎德的拉尔冈地区，就是我自己，并且在到达这里之前度过了一年半时光的地方。在那里，在环绕的森林间，他们将要举行一次差不多是国家级的委员会议。穿越整个邦到达那里的唯一安全方式是在黑暗的掩护下步行，在排、连或营的保护下以军事队形行进。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更加宏大的运动，毛主义士兵们被指示不要乘坐公共或私人交通工具。游击队的军队会行进一段极长的距离，通常有几百公里，在几周内不间断地于夜间行军，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为了抵达“安全”区域，或是他们被指定的任何地方。

我问吉安吉自己是否能跟随他和他的一队人马回到拉尔冈。我想要体验不间断地“移动”是什么样的。除了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用他们的话来说，加入他们回到贾坎德的行军将代表我研究的最后一部分。

毛主义者经常带记者们花几天时间在他们的森林中参观，我也在他们的“红色首都”贾坎德的森林中和他们走了不少次。但是我在2010年1月某一天夜里所请求参加的旅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类型，那是一种他们一般永远不会接受外人参加的旅行。

正当我无意间听到营中的对话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对我参加夜行军的保留态度恰恰反映了我自己的忧虑。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根据路线的选

择,大概有 250 公里。从比哈尔到贾坎德的行军不仅要穿过四个行政区,我们还必须穿过两条主要河流和两个繁忙的高速公路。我们还得从能找到的任何水源中喝水,吃任何当地居民能提供给我们的食物。在大多数夜里,行军速度必须保持在三十千米以上。在政府的无情围剿下,我们只能在黑夜的安全下行进,我们将完全由夜晚掩护,并且为了避免被别人注意,我们也不能点燃火炬照明。我将会是队里唯一的外人,也是唯一的女性。

最重要的是,存在安全问题。我们将穿过不受毛派控制的地区。“敌占区”里遍布“绿色狩猎行动”的军营,充斥着频繁的巡逻。那里是由第三筹备委员会 (Tritiya Prastuti Committee, TPC) ^[2], 一个据说受到政府支持的雇佣兵团伙所控制的地区。毛派自己也常常犹豫是否要踏上这段征程,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放慢脚步、生病或犯错的余地。吉安吉花了三天时间,与其他领导人多次商议,才回应了我的请求。

一天早上,普拉桑特给了我一个灰色的纸板箱。我打开它,感受到一股热流涌过我的身体。那里面被白色包装纸裹着的,是绿色的跑鞋。我愚蠢地只带了一双凉鞋来,没有想到只住两个晚上的打算会变成三个星期的旅行。

我意识到我的提议被接受了。

出发那天,军营的裁缝为我缝了一套制服。是一套橄榄绿的衬衫和裤子,对我的腰而言太大了,便用腰带系着。比马吉会赞成这种淹没我女性气

质的服装吗？我把头发塞进一顶绿色的游击队帽子里。普拉桑特说，和一个全是男性的排一起行动时，如果能女扮男装，会少受关注，更加安全。

普拉桑特把我介绍给我的保镖，一个将会照顾我并一直守在我身边的人——即使在我不得不洗澡时。一个十六岁出头的年轻人走上前来，害羞地伸出手。他朝我笑了笑，他那亮白的牙齿在他那深色的、近乎黑色的、闪闪发光的皮肤中显得格外突出。

和其他一些将要加入我们排的人一样，我一眼就认出他来自我在贾坎德邦居住的村庄。他是阿迪瓦西人，来自奥朗部落。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已经很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村里唯一开茶馆的阿迪瓦西人，我在那里待过好几个小时。这个年轻人经常给我上茶。除了点单和结账，我没有和他说过话，但我注意到他总是沉默寡言、恭敬有礼。

普拉桑特叫他“科利”，虽然我知道他的名字不叫这个。奥朗人一般体格健壮，但即便如此，才16岁的科利还很瘦小。他背上的背包看起来比他还宽，挂在左肩上的英萨斯步枪（INSAS Rifles，全称 Indian Small Arms System Rifles，即印度轻武器系统步枪，20世纪90年代印度研制装备的一种自动步枪），枪托一直垂到他的小腿。这支步枪比吉安吉携带的那支更轻更好，但科利在战斗中能以多快的速度操作它呢？

不过，我记起来，他和我认识的其他阿迪瓦西小男孩，是如何精准得难以置信地使用自制的弓箭，和把粗橡皮筋绑在树枝上做成的弹弓。我看

过他们调皮地练习射击技巧，从很远的距离外把小石头击成碎块，甚至在森林里猎鸟和兔子来当晚饭

普拉桑特安慰我说，我会受到科利的悉心照料。他让我把我的海军蓝布包给科利背，但我拒绝了，因为我想自己承担重量。布袋里面只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一个麦克风和录音机，一瓶饮用水，一个用来解决内急的乐事塑料罐，一件换洗的内衣，一件兼作枕头的夹克，一个睡袋，一条可以躺在上面或用作毛巾的薄围巾，一双人字拖，和普拉桑特带给我的刺绣红色宽松裙——方便我从“地下”（指女扮男装）逃到“地上”。

告别持续了半个小时。太阳低挂在天空中。我们在营地边缘的田野上。一面有白色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从田野中央竖立的烈士纪念碑中升起，在天空中高高飘扬。一群人聚在一起告别。他们在田野上围成了一个圈，用印地语唱着革命歌曲。他们用最大的声音唱着社会主义的“国歌”——《国际歌》，歌声响彻森林。其他送别同志启程的歌曲也跟着唱了起来，在旋律中提醒我们要当心每一步路程。这些歌曲警告我们，敌人环绕在周围。我们排在圈内站成一排，面向其他人。我们有 30 个人。

“红色的敬意 (Lal Salaam) ，红色的敬意，红色的敬意。”我至少握了两百只手。我握的最后一只手是普拉桑特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生命会有多么地短暂。

第三部分：吉安吉，敏捷的心灵

第一节：第一夜

我必须快速学习行军的技巧：永远走成一列；尽量减少人与人的间距；听从排长的指挥；跟紧自己的班组长，即使是睡觉也要和班组呆在一起（每个排分成三个班组，各设一班组长）；时刻把武器放在自己身边，永远做好行动的准备。

除了我之外的每个人都有枪。一共有三把 AK-47、一些 INSAS（译注：Indian Small Arms System, 印度枪械）的步枪、一些.303 口径步枪（译注：可能是李恩菲尔德步枪，曾在英联邦军队广泛装备）、一些司登冲锋枪（Sten guns,译注：英国枪械），剩下的都是警用步枪。这些枪都是从警方手里偷来的——大部分纳萨尔派的武器都是这么来的。A 班组是前锋班组，拥有最好的武器和士兵，万一发生战斗就是他们去作战；B 班组是领袖所在的班组，万一发生战斗，他们就和 C 班组一起后撤。我当时在 B 班组，和吉安吉以及他的保镖科利呆在一起。

整个排的头尾之间的通讯靠的是专门的跑步传令员。班组长带着对讲机，但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通讯内容可能会被安保部队截获。在整个排的最前方，有一名认路的侦察兵负责带路。而在队尾，则有一个清扫员负责扫掉脚印、抹掉我们来过某条土路或泥路的痕迹。

我被告知了更多的规定：在行军的每个阶段始末要注意参与点名；万一走丢了，要记得下一段路程的集合点（rendezvous point, RV）；在黑夜里看见有人走来时，为了区分敌友，一定要互相对暗号——比方说，

在第一夜，暗号问答是：“你是谁？”“我是湿婆(Shankar)。你是谁？”
“我是克里希那(Krishna)^[1]。”

在走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个村庄边的小山处停了下来。我们的班组长正是在这个村里长大的。和普拉桑特一样，他也出身于小农家庭。他们家姓亚达夫(Yadav)，曾是放牛人。在1980年代，纳萨尔派从这个村子里驱逐了拥有大片土地的高种姓地主，并把他们的土地重新分给了亚达夫家这样的小农家庭。于是，这个小村子就全是值得信赖的纳萨尔派支持者了，因此游击队员们把这里当作“安全区”。

吉安吉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也比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更安全，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边界处。游击队经常利用行政边界来摆脱安全部队：如果他们被一个邦的警察追逐，他们就跨过边界进入另一个邦，以此免于警察的继续追击。各邦的警察几乎从不协调行动——比哈尔邦的警察不太可能跨过边界进入贾坎德邦警察的地盘，也不会及时给贾坎德邦警方传递信息以便后者在自己那边拦截逃跑的游击队。吉安吉说，游击队要利用好统治阶级精英们的这种效率低下、毫不协调的工作方式。

虽说这里是个“安全区”，但按照游击队的经验，最好还是等夜幕降临之后再进村吃晚饭。天上满是夜莺、椋鸟和乌鸫，它们在空中拍着翅膀绕圈飞舞，响亮地喳喳叫着飞回巢里过夜。接下来是蝙蝠，它们飞出栖息地，快速而敏捷地飞行，这与鸟类很不一样。烟雾从村庄里升了起来——大部分家庭都点起了火炉。我们于是爬下了山。

排里的两个“跑步传令兵”早些时候已经被派进村，向 30 个家庭各讨一盘食物。成为这种款待的接受者感觉很奇怪。此前的几年，我住在拉尔冈的女部落民索玛尔 (Somwari) 家里时，游击队员常常来村里歇脚而又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这种情况下，我们习惯于给游击队员们提供一盘粮食。索姆瓦里——我叫她“姐妹 (sister) ”——坚持要把盘子里的饭堆成小山，以至于饭粒都会掉下来。她说游击队的孩子们一定都累坏了，需要好好吃点东西。我们给游击队员的食物与我们自己烧来吃的完全一样——米饭，通常再加一道小菜。小菜可能是小扁豆、菠菜汤或者番茄酸辣酱，而家里有蔬菜的时候也可能做一点蔬菜咖喱。

整个排分散开来，每个人都到村里吃晚饭。我和我的保镖科利以及我的班组一道，跑到了一家人的门厅里。我们曾约定：我得尽量避免引人注目，因为我对外的身份是个男人。然而，虽然我自己严守规定呆在阴影里，科利和负责照顾我的那些年轻人们却经常忘记这一点。他们问我：

“姐妹 (Didi) ，你还好吗？”他们对我说：“姐妹，那里有个手压水泵，我来帮你灌满水杯好吗？”

我们得决定当晚到底要往前走多远。走太远意味着我们要离开两邦交界处的安全森林地区——我们得先穿过没有掩体的农业平原、车流熙攘的高速公路和更多的稻田之后，才能到达下一个安全区。我们这次行军还要六小时，也许要八小时。

我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仿佛在问我能不能坚持下来。我能坚持走完全程吗？吉安吉已经认真帮我计划好了撤离点——万一

我坚持不下去，我可以在撤离点用摩托车或者公交车离开，从“地下”重返“地上”。

我回想起，据我所知，吉安吉自己的身体也有小毛病：他是个心灵敏锐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身体并不适应这种横穿印度东部森林的长途跋涉。虽然他自己从不提起，但据我与他同行时的观察，他患有急性腹痛。我看见过他在游击队员们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痛得瘫倒在地上、大口喘气。科利说这是因为他并不能做到每天按时吃两顿饭。

多年以来，吉安吉在炎热的天气里穿着很久不洗的、用聚酯纤维制成的橄榄绿制服，身上出了会发痒的疹子。他承认有时候制服连续八天不洗。两天之前，我偶然听见比马吉劝吉安吉扔掉制服，待在排里的时候改穿纯棉宽松裤。但是吉安吉坚持认为，他不需要高于其他人的特权待遇。我同时还了解到他脚踝有伤。在连续几小时的步行以后他的脚踝就会发病并让吉安吉摔倒。

正因为了解到吉安吉不惧疾病的坚强毅力，我下定决心走完全程，争取一步也不后退，不拖大家的后腿。当我告诉吉安吉我已经准备好应对前路上的困难的时候，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用眼神温和地询问我是否真的确定。随后，他转过身告诉排长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

结果，排长维卡斯自己却没有准备好。在我见过的所有排长中，维卡斯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位。我把他看做“审讯者”。我们之间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在拉尔岗待了6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他当时和另外一个排一起经

过了我居住的村子。我从家中拿了一盘米饭和菠菜到他们休息的竹林里，好奇的想看看这些据说是从远方而来的人。

当他们吃完饭后，他派遣两个游击队员到我居住的索玛瓦里 (Somwari) 家中来回报我的拜访。他们带我回到村中附近的一个墙壁破损的废弃房子里，维卡斯在这个房子的阴暗角落里等我，他横躺在一个旧木板上。他傲慢对我抛出问题，他询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去拜访他们。他对我的回答似乎没有兴趣而是继续讲话，讲述那些进入森林，却再也没有出现的间谍的故事。“你知道我们对这些间谍干了什么？”，他问我，“我们肢解了他们，把他们扔在沟里，用枪把他们的尸体打成了筛子。”

当他让我离开时，我尽力掩藏我在发抖，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一种（针对间谍）的武力威胁。几天之后，当更多的高级领导人把我叫到他们所在森林中的游击营地，维卡斯低头看了看他的脚，脸红了。但是我心中留下了在拉尔岗初次见面的苦涩。

现在每个人都准备继续前进并穿过平坦的稻田，但是维卡斯认为我们一行人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完饭。他说晚上 10 点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如果我们一整晚一直不停，我们也只能在凌晨 4 点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维卡斯劝说吉安吉和队伍指挥官整晚都在行军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在离村子半小时步行路程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长满草且有几棵长叶紫荆树^[2]的休息处。虽然我知道长叶紫荆树的很多用途——在家可以用它的小黄花蒸馏制酒，种子可以榨出食用油——但我所不知道的是纳萨

尔派认为它是最适合睡觉的地方，这是因为它的长扁平叶子限制了空气流动，使得白天的热空气不会运动到上层空气中。

树下睡觉的位置已经被标记出来。安排好了哨兵执勤表。垫子和毯子正在铺开。当一些士兵把垫子飞速铺好时，吉安吉小心翼翼的清理了他睡觉的地方，铺上垫子并且将折起来的床单展开，完美的铺在上面。他开玩笑说，这是一张非常奢华的床，无论条件多么粗糙、简陋，舒适程度依然可以有不同。

他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领导者，吉安吉非常坚毅，但他平时说话轻声细语，没有其它有魅力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口才，身材也不高大，举止安静，几乎沉默寡言。尽管他认为反对印度当局和训练新士兵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对制造地雷、抢夺枪支一类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反而更愿意看棕鸟的舞蹈；他读马克思，同时也爱看 19 世纪末的欧洲和印地语-乌尔都语诗歌、短篇故事和小说。

很快我周围的人都开始打鼾。有些人抱怨他的邻位自私地只把自己裹在他们应当共享的毯子里，没有为他冻僵的朋友留下一点遮盖。

我有太多的想法以至于无法入睡。那一晚的月亮格外明亮。这让我陷入沉思。对于像吉安吉这样的领导者来说处于地下生活的感情成本是怎样的？科利和吉安吉的保卫员在我们中间睡着了。我告诉吉安吉，我永远不打算加入他们，不仅因为我无法理解他们身处的暴力的循环，也不只

是他们路线和方法是否正确的问题。首要的障碍是我不能忍受离开我心爱的家人们，无法再见到他们，我说，我永远不会伤他们的心。

我没有问吉安吉他的孩子是如何带着他们的父亲是谁这种疑问生活的。印度有许多家庭的男性会从迪拜，多哈寄钱回家，每年只探望一次亲人。然而与在国家心脏地带进行野外武装斗争的父亲相比，作为移民去打工的父亲对于孩子来说更容易理解。

我看到吉安吉正在盯着我看，但是在他开口之前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难道你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他问。他已经两年没有见到母亲，尽管他很想去。他说：“你知道有人告诉我，我的母亲非常担心，以至于每天晚上都是哭着入睡吗？”

他情绪有点激动，继续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妻子，她们之中的许多人活的像寡妇，你觉得我们没有伤透她们的心吗？”

我为自己之前身上近乎无情的态度感到惭愧。吉安吉继续说下去，他告诉我他最好的朋友帕雷什（Paresh）在 1992 的遭遇战中被杀；他去拜访帕雷什母亲的时候，痛苦地发现她把吉安吉完全当作了儿子的影子。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个密友尼米什（Nimesh）在 1999 年去寻找被绑架的未婚妻，结果落入了一个国家资助的武装团体的陷阱。他们让他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强奸，然后杀害了他们俩。吉安吉说，他去尼米什的母亲位于德里郊区富人区的豪宅看望她的时候发现，自从儿子被谋杀后，她再也听不见声音，也不能说话了。

在我见到他的时候，吉安吉已经潜伏地下生活了 20 多年。年轻的时候他或多或少地与父母和兄弟姐妹断绝了联系，与地下的反叛者形成了一个家庭。许多年轻的游击队员——男孩和女孩——都把他当作父亲来看待。大家赞誉他善良、温和，同时又很坚定，能够立刻得到与他接触的人的尊重。我已经习惯于将他视为地下党中父亲的形象，以至于很容易忘记他付出了与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的代价。

吉安吉很快加入了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可是我一直无法入眠，凝视着月亮上的阴影，思考他告诉我的事情。

电话铃声响了。我本来昏昏欲睡，现在被这个声音吵得彻底清醒了。它尖锐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我紧张起来。现在已经很晚了，可能都过了半夜，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呢？一般来说这里是没有信号的，打电话的人必须爬上山顶或者询问当地人来得知哪儿能连上信号基站。更重要的是，有严格的规定除非极为必要，在行军过程中禁止使用手机，因为手机可能被印度警察截获、窃听或定位；这是他们了解我们行踪的一个简单方法。

铃声戛然而止，然后我听到吉安吉低声说，他会再打回去。我看着他起身，紧接着消失在远处。是谁？谁需要他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我不愿意去问。

夜色如水，天空明亮，我可以看到吉安吉的身影在附近山岗的黑暗轮廓上来回踱步。显然是有什么事，他似乎走得越来越快。走五米换一个方向，来来回回，一次又一次。

似乎过了很久，他才回来。他肩膀耷拉着；此时那种挺拔的姿态和惯有的风度不见了。我在睡袋里低声问他是否还好。

那是他的妻子，他用英语讲话，显然不想让其他人听到。她在哭，因为他们的儿子在学校很难跟上课程。她希望他能出森林去见见他们。他不能这样做。因此发生了争执。

我很惊讶。我知道吉安吉已经结婚了，他曾告诉我，他的妻子也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但是“出去”意味着“露面”，离开森林和游击队的保护。这个要求太高了。

吉安吉是被高价悬赏的人。警察已经承诺给予任何抓住他的人报酬：十万卢比现金，还成立了专门的安全小组来追捕他。吉安吉告诉我，被抓住的同志们在酷刑之下说出了他的信息，还给放了有他声音的录音。尽管警察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录音，他们依然没有他的照片。

“我还以为她和你，和纳萨尔派在一起。”我说。

他忧郁地说，曾经是，但现在她已经走了。这与他的期待不同，但她决心支持他们的三个儿子，给他们一个更好、更稳定的成长环境，而不是游牧式的生活。现在，除了极少的机会，他很少看到儿子中的任何一个，

也许六个月一次，能够安排在小镇中的安全屋见面的时候，或者她能到他所在的丛林里去看他。然而，随着安全部队越来越强大，从“地下”到“地上”的通道变得越来越危险。

躺回了卫兵和科利中间的毯子，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被有严格的要求，不能冒险离开地下党所在的安全地带。我可以听出这些话中的痛苦。他陷入沉默，我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东西被触动了。我在想还能了解多少的时候，旁边传来了他轻轻的鼾声。

“喝茶吗？”

天色依然很黑，我抬起头来发现吉安吉正站在旁边，递过来一个不锈钢烧杯，里面装满了滚烫的糖浆甜茶。

“这是五星级待遇！”呻吟着，我从睡袋里爬出来然后卷起它。这牛奶闻起来就像蜂蜜一样。

“这是我唯一的弱点了。”吉安吉眼睛里带着顽皮的神情承认。

很明显，他心情不错，而且很好地睡了一觉。但是我还在想着他的妻子，以及与一个你极少能见到，也不能够和朋友熟人们提起的人结婚的感受，当需要他的时候，他不会在你孩子身边。吉安吉会打破常规离开森林去见她吗？爱喝茶是他唯一的弱点吗？

第二节：牺牲、放弃、解放与暴力

吉安吉是纳萨尔派口中那一整代“职业革命家”（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简称 PR）的代表。这些革命者们二十多年来始终潜伏于地下。平原上的无地“贱民”达利特们和山林里的年轻阿迪瓦西部落民们先后被吸引加入了纳萨尔派游击队，而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的背景却与他们很不相同：他们来自手握特权的阶层。

像吉安吉这样的中老年男性职业革命家们（女性很少）来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属于祖辈生活的村落里较高或最高的种姓。他们一般在大城市里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人（比如吉安吉）还获得了研究生文凭，并能够在地道的博杰普尔语（Bhojpuri, 译注：是比哈尔的一种地方语言）和流畅的英语之间无缝切换。

吉安吉的家族曾在比哈尔拥有过大片土地。他的父亲曾是个有政府编制的工程师——这份工作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是值得骄傲、令人羡慕的。吉安吉父亲资助并鼓励四个孩子取得大学学历、搬到城市、找到一份和自己一样好的工作。

吉安吉和前辈们一样，也是在大学里有了政治倾向。在 1970 和 80 年代，印度各大城市——加尔各答、德里、孟买、帕特那（Patna）、瓦朗加尔（Warangal）、海得拉巴（Hyderabad）——的一整代青年大学生们在激进政治斗争中觉醒了。和朋友们一样，吉安吉的政治理想最开始是来自一位充满活力的大学教师。

他融入了一群激进的学生——他们把以取得学位为目的的正规学业放在一边，建立了激进的读书小组。白天，他们学习那些最偏理工科的专业：吉安吉学的是数学，其他人学的是化学、工程、生物或者物理。但在晚上，他们把那些等式、代数符、公式、回归表和图例都扔在一边，摇身一变成为革命者，讨论如何建立“地上天国”、创造共产主义社会。他们阅读世界历史，对历史上的大事件展开辩论，并探讨如何再现这些进程。

他们一开始读的是最基础的书——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夏尔·贝特兰^[1]关于苏联历史的书，和韩丁^[2]关于中国的书。他们在阅读间隙进行诗歌朗诵。

学生们涉猎广泛：他们思考萨特^[3]的存在主义的优点和局限性，远观福柯^[4]，然后进一步接触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比如说保罗·斯威齐和莫里斯·多布^[5]之间的辩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的内部矛盾发展出来的，还是作为封建主义外部的力量推翻了封建主义？到底是什么是封建主义？印度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

吉安吉曾说过，光读书是不够的。他援引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世界学生运动史的一部分。他们与反越战示威、巴黎的起义和正在崛起的美国黑豹党站在一起。远方国度的人民早已起来占领了街道，与虐待、偏见、不平等作斗争，并挑战他们的政府。吉安

吉告诉我，受到这种激情的鼓舞，他们骑车前往城市边缘的贫民区。在那里，他们见识了贫困、剥削、迫害和镇压。他们对身边的不公感到愤慨，于是开始为基本人权与平等而斗争，也决定和那些对穷苦人冷漠、麻木、故意视而不见的一般中产阶级分清界限。

在完成大学学业后，吉安吉开始准备“印度行政服务”（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译注：即印度的公务员系统）的选拔考试。

“印度行政服务”是国家精英为印度政府效力的地方。他认为，在这里，他能够为被剥夺权利的穷人斗争。这段时间里，他晚上为考入印度国家编制做准备，而白天却像那些来加入纳萨尔派的人们一样，致力于人权运动。

随后的几年，他开展了一系列实情调查工作来曝光高种姓地主对低种姓劳工的暴行，它们揭露并宣传了成千上万的穷苦男女被老板们欺骗、鞭打、强奸的故事。他记录了那些为了老板赚得盆满钵满而累死累活的人们，而老板们却在无法继续使用、虐待他们的时候，把他们的尸体像动物一样随意丢弃。他发现了一连串警方和地主勾结的事，还发现在警察局和派出所里也存在着类似的罪行。

吉安吉越是参与地方民权运动，就越发不信任印度议会制度，也越发发觉“印度是个民主国家”只是个假象。他说，他逐渐认识到国家是从上而下腐烂的，虽然政府采取措施把边缘人口纳入国家体系中来，它仍然保护着印度精英们的利益。他得出结论：即便是最真心诚意的公务员也几乎不能对此做出什么改变——他不可能独立于整个系统单独行动。这

样的公务员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体制妥协；要么彻底被别人排挤出去。通过开展民权运动，呼吁政府承担责任、鼓动改革，在吉安吉看来，这种方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印度）需要的是一场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

吉安吉正是在这时放弃了为政府效力的志向，并对他的大学老师请求说：是时候把我介绍给那些已经开展武装起义的人们了！他决定和这些战士们一道前往乡村，和农村的穷人一起生活，并动员他们加入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来。他已经准备好宣誓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了。

在离吉安吉所在的巴特那不远的比哈尔邦各村，那些在镇压最初的纳萨尔巴里起义时被关押、现已出狱的革命者们正在重建他们的革命党。吉安吉被接纳进了其中一个组织——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统一中央组织委员会（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Party Unity) ^[6]。

跟其他和他同时加入纳萨尔派的人一样，由于这么多年来对革命党的全身心投入，吉安吉慢慢升到了较高的领导层，开始发展新一代的革命群体。正是这些老革命家——也就是 1970 和 80 年代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他们生长的世界决裂的学生们——领导了游击战争，并使这场斗争坚持到今天。

许多人（比如吉安吉）和党员结了婚；另外一些则离开自己原先的妻子或者丈夫，在地下组织中重新结婚；还有一些则保持单身。在游击战争

中，生孩子并不被鼓励，但他们会“收养”科利这样的新一代青年作为“革命的孩子”。他们斩断了自己根植于旧家庭的过去，在地下组织中创建了新的家庭、新的世界。

参考

- ^夏尔·贝特兰 (Charles Bettelheim) 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思想偏向毛主义。代表作《苏联的阶级斗争》
- ^韩丁原名威廉·辛顿 (William Hinton)，曾是美国在解放区的观察员，亲历重庆谈判、土改，参与了解放区建设。回国后在麦卡锡时期受迫害。1971年重返中国生活。代表作《翻身》《深翻》《大逆转》。其妹妹即赴华生活的共产主义者、核物理学家寒春 (Joan Hinton)。
-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左翼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
-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法国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左翼社会思想家，代表作《规训与惩戒》《疯癫与文明》《词与物》。
- ^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和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分别是美国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后者认为西欧资本主义来自于封建主义的内在矛盾，前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外部推翻封建主义的。
- ^关于该组织，参考第一部分第二节[二]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2214831>

第二节：牺牲、放弃、解放与暴力（中）

在我踏上行军之旅的六个月前，在拉尔冈的一个傍晚，我正从临近的村庄回家——此时我穿过了吉安吉的排的驻扎地。看见我经过，他派他的保镖来请我喝杯茶。他看起来相当忧郁，戳了戳树枝重新生火。当我在他身边坐下时，他说：“起初，我们都觉得革命即将来临。谁会想到数十年之后我们还在这里，与困难作斗争？”

时光流逝，他说，他们都已经意识到，在有生之年，他们是不会看见奋斗的果实了。世界在剧烈变化，一个全球尺度下的平等社会变成了一个永远遥远的愿景。但他接着说：“我们要让这个梦想保持活力——若不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便是为了更年轻的一辈。”

我问他，他是否有考虑过离开纳萨尔派。他使劲地看着我，但没有说话。

“有那么一次，”他终于回应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我等着，不去问比他想透露的更多的内容。但他没有继续说。直到后来，当我试图去拼凑吉安吉的身世时，我才从他人那里了解到，吉安吉曾经离开过，那时纳萨尔派之间关于印度经济的解释存在重大分歧——那是一场关于印度“半封建”或“资本主义”程度的争论。在纳萨尔派的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作“两条路线的斗争”。

尽管我就像人类学家应该做的那样，学习了我正在研究的群体的语言——那格普利（Nagpuri）和萨德里（Sadri）方言——但光凭这些学习在这个情况下是不够的。我没有系统学习过这些共产党员的词汇，以至于理解他们所谓的“生产方式”之类的政治经济词汇花了我几年时间。这些词汇对于纳萨尔派非常重要，而且对此他们似乎有很多分歧——据称，分裂和派别也在此之中形成。例如，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争论究竟是什么将一个经济体塑造为“半封建”或者是“资本主义”。封建经济是不是这样：土地被少数富人殖民，其余的人口为这些地主工作，部分地被他们束缚住，并积累起数代人对他们的债务？人们为了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这是否是一个经济已经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条件，还是说农民还需要积累、投资并再投资他们从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剩余，才配得上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称号？

经济如何分类对游击队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在战争中使用的策略的基础。它决定了相较于城市，他们在农村地区工作的程度。他们是要打一

场旷日持久的、毛主义、秘密的、以农村为基础战争，还是像列宁提议的那样，在城市里对人民进行非暴力的公开动员，为最后的起义做准备。这也决定了他们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印度议会进程中的正式选举程序，或者完全绕过它们。如果他们分析经济是半封建的，他们就会打一场地下农民战争。而如果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占上风的，他们会首先追求利用议会选举的非暴力动员。

我从数位离开革命者的人那里得知，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仅是关于如何分析印度经济存在内部分歧，而且党内讨论和辩论的民主准则也遭到了蔑视。某些有权势的领导人仍坚持认为这个国家是半封建的，尽管当时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关于形势的分析依旧一样，且因此没有任何改变。我想象到吉安吉——当时还是一个敏感且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辩论的处理方式感到非常的失望和寒心，以至于暂时打破了运动对他的魔力。

但许多年后，当我在拉尔冈和他坐在一起时，他更全面地反思说，在运动中确实有许多令人沮丧的问题。他们每天都在面临这些问题。到处都有一些人在寻求自己的名字和财富，他说。他们想要青史留名、自己的自尊心得到呵护、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被认为是英雄的成就、自己的生命被作为一个独特的故事而被记住。然而，他说，当他环顾四周时，他没有看到更好的选择。

在印度，没有其他的运动或者组织有更真诚、更诚实、更致力于为更好的世界寻求集体变革的男女——吉安吉说这话时带着看起来不容置疑

的信念。这些人，他说，对他们来说，保持对于一个不同的、更加平等的未来的梦想的希望就足够了。他们不追求个人回报或是个人认同，因为他们为这个目的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这些个人，正如其应该如此的那样，他说，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点。根据吉安吉的说法，这些人已经从历史中抹去了自己，他们因此牺牲了自己。

那天，吉安吉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一个一直让我疑惑的问题：是什么驱使像他这样的聪明人为了一个梦想，也许甚至是一个幻想，而冷酷地切断与他们过去的所有联系？是什么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并继续战斗，将他们的生命如此完全地投入到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不同的未来，而他们也永远不会得到个人的认可？

显然，对不平等力量、剥削的制度和围绕着他们的严重歧视的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中被怒火战胜的许多人，往往会感到绝望，而不是对能够承担和改变世界抱有希望。坚信他们的意识形态道路是正确的，也不是答案。从吉安吉自己的疑虑中可以看出，对于如何分析印度经济以及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内部有很多辩论。那么，在环境明显不利于他们的情况下，是什么迫使他们奉献自己的智慧为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类社会而努力，奉献他们的生命来共同奋斗？

正如吉安吉所暗示的那样，有一个概念对于建立理想社会之梦能够生生不息非常重要，那就是牺牲。人们曾将祭祀视为安抚和讨好众神的一种

方式，直到十九世纪末，一些学者认为祭祀远不止是向神灵奉献礼物。虽然这个词宗教意味很浓，但是，牺牲也被视为人们进入一个神圣的想象世界的重要手段，那里是“超凡脱俗的”，它也影响到生者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被认为是平凡，短暂和虚无的世界。

因为这种影响，牺牲的概念可以是非常创造性的力量。它使人能超越和克服他们所在的庸俗的世界，加入到一个构想了截然不同且非同凡俗的世界的力量中去，这些人将创造新的生活，并把它带给现存的社会。在自我牺牲人之间，根据对那个超凡世界的想象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反过来指导活着的人在这个世界建立他们想象中的乌托邦社会。

对于吉安吉这样出生在相当富裕的上层种姓的纳萨尔派领导人，他们的家庭与革命者所谴责的制度和思想总是并列在一起。这些家庭拥有大片土地，长期剥削和压迫为其工作的低种姓劳工。他们把教育看作是向上爬的手段，而年轻一代则在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有些人还把孩子送去美国或英国学习，主要是为了 MBA（工商管理）学位，然后在纽约或者伦敦工作。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捞钱的新手段回到印度，没有障碍地进入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的高层。

虽然有例外，但是这些家庭越来越呆在一个推崇个人主义和物质积累的环境，再生产了世界的的不平等。背负着特权出身的包袱，断绝和家人的关系，粉碎他们的个人历史，摧毁他们过去的人格，是纳萨尔派领导人加入一个新世界的重要历程。在世界各地，献祭行为都要采取象征性的暴力——例如，肢解身体、杀死动物或食用食物——而那些身体部位、

动物或食物是对进行献祭的人类参与者的一种代表。这种仪式代表着人们隐喻性地粉碎他们的日常世俗世界，象征性地杀死自己，以参与创造一个能够征服、改变和超越现存世界的不可朽道德世界。这种返回的暴力否定了日常世界，使其参与者能够触及超越它的东西，然后用另一个世界的观念对其进行同化。这种暴力并非人们生来就具有的东西，而是他们试图创造新世界，超越困住他们的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像吉安吉和他的其他领导人所追求的超人目标——就在我们的世界建立一个平等和民主的人类社会——与他们周围的日常世界的价值观是如此相悖，以至于他们要付出相当大的、生命的代价。实际上，就像很多我遇到的领导人，吉安吉已经准备好了面对一个残酷的结局。不是在战斗中——因为游击队很少真正面对战斗——而是在警察局里。他的许多同志在城市里被抓住，警察为了获得消息残酷地折磨他们，然后不经法律处决。他们会出现在印度臭名昭著的“假遭遇战”中。吉安吉说，在警察眼中，他这个领导太重要了，他们不可能让他活着，因为他们决心“砍掉运动的头”。无论游击队员们因何死去，对于革命而言，最大的献祭就是生命本身，就是人的牺牲。革命者的死也意味着他牺牲了自己所在的世界来创造他们所梦想的世界，他们的死亡和毁灭使生命再生为创造性的力量。

牺牲的直接反面，它的反义词，是自杀。谈到在一个在吊扇上上吊自杀的朋友的时候，吉安吉曾嘲笑说：“多么个人主义的自私行为！它不为了任何人，不贡献，创造或成为任何东西。反对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想

的斗争比敌斗争更难。”我认为吉安吉把自杀看作是个人离开道德世界但没有其他世界可以创造的结果，一个由永不满足的激情和无限的欲望造成的折磨之地，因为没有创造性的活动来激发和遏制它们。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每年十一月在根据地所在村庄举行的烈士周是纳萨尔派最重要的庆祝活动。烈士周标志着那些创造新的道德世界的殉道者的死，他们成为了引领前进道路的不朽星辰，传递着想象中的未来社会的梦想，托付生者去实现这些梦想。烈士将斗争中同志们的残酷死亡所激起的情感从感性的弱点转变为强大的创造性情感力量。

此外，尽管他们的生活可能经历了各种复杂的曲折，而且只在人死后才第一次把真实姓名公之于众。殉道的神话创造了传奇，死就是其终点。殉道者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为人民牺牲自己，朴素地生活在穷人中间，为他们斗争。每一位烈士都被认为代表了慷慨、善良和无私的美德，是一个从不考虑自我利益、没有种姓和阶级偏见的人。牺牲创造了完美的革命者，他们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战，代表着未来的乌托邦世界。他们是领导革命斗争的理想的抽象化。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吉安吉这样的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牺牲者的鲜血格外沉重。死去的同志不仅代表着离别，他们还变成了将未来的理想世界扎入一个人平常生活的锚。烈士们提供了超越生命的永恒，这对于以游击队员想创造的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来渗透现实非常重要。烈士的故事留下了遗产；它是运动中的人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手段；它是完美的人的本质。

“活生生的烈士”，这就是像吉安吉这样的人的标志，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打破了过去的束缚，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更加民主的世界。悬置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等待着自己的死亡。他们标志着新的平等未来，并努力表现它，像其中理想的人类主体那样生活。

我越是纠结于这些纳萨尔派领导人的独特性，就越是发现自己在回忆小时候的周日下午，我和祖父一起去我长大的内罗毕参观华丽的大理石膏那教寺庙，在僧侣们中间向神灵致敬。有几次，我们去了迪甘巴寺

(Digambar temple, 译注：位于德里)，在那里我总是盯着自己的脚，因为那里的耆那教僧侣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抛弃了一切——所有的所有。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他们是启蒙的象征，作为一个孩子，接触到他们的裸体总是相当令我震惊。就在与吉安吉一起开始这次徒步旅行的前几天，在前往比哈尔邦纳萨尔控制区的巴士上，我经过了一排在公路上行进的裸体僧侣。他们只吃别人提供给他们食物，而且完全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形象与印度长期以来为解放而放弃一切的历史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

事实证明，我对弃世者和革命者的比较并不是那么离谱。像我遇到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一样，吉安吉曾经走过印度教的道路，放弃这个等级森严

的世界，等待他的个人解放。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变成了素食主义者。除了最基本的衣服和食物外，他拒绝一切，对女孩不感兴趣，宣布独身。他说他花时间阅读吠陀经文，在恒河岸边凝视夕阳，希望有一天能得到神的启迪。他作为一个瑜伽士，等待着被指出逃离这个世界及其无尽的轮回之路，这种解脱将带他进入另一个平等的世界——涅槃。

瑜伽弃世者的形象在印度教宇宙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虽然他们的人数不多，而且通常是高种姓的男人选择弃世，但任何人（来自任何种姓或性别）都可以成为一个苦行者。在光谱的一端，有裸体或半裸体僧人，他们剃着光头或只留下几股未剪的头发，只靠施舍过活，并在完全孤独中连续数小时进行冥想；在另一端，有吃人肉、吃粪便、与妓女通奸的苦行者，如巴拿勒斯（Banaras）的阿戈里（Aghori），他们宣称要实现根本的平等，要使婆罗门和贱民没有区别。这些苦行者都在寻求获得超然的知识，使他们个人从时间和无尽的痛苦与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另一个平等的世界。

但吉安吉说他意识到了只为自己寻求解脱的自私性——如弃世者所希望的那样——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大学老师和他周围的政治动员的影响。弃世者在到另一个世界寻求平等的过程中，并没有撼动他所放弃的世界的等级制度。吉安吉从到另一个世界解放个人的弃世之路转向了在这个世界为了大众的利益的解放之路。他作为纳萨尔派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是分发一本关于“上帝之死”的小册子。

印度社会鲜明的社会等级制度与为政治目的而选择弃世的悠久传统相伴而生。身穿白色腰布的甘地也许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他们的政治目的不同，但像吉安吉一样，这些历史上的弃世者中，有些人已经放弃了通过出发到另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来寻求个人解放，而是寻求对当前的不平等现象提出质疑。他们颠覆了宗教僧侣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个人自由而消灭未来、离开世界，而是致力于为每个人创造一个解放的世界。

就吉安吉和他的同志们而言，这条解放之路意味着与他人合作，在此时此地创造一个彻底平等的世界，在现在展望一个新的未来，产生一个更平等的平行世界。它还意味着为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少数人）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

因此，也许印度的瑜伽大师、甘地等宣扬非暴力的弃世者与放弃自己的世界、在地下创建新的解放社会的高种姓纳萨尔领导人之间的所谓差异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大。他们被称为“持枪的甘地人”。革命的暴力是一种神圣的召唤。也许正是因为放弃印度社会等级制度的悠久历史，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当代印度既输出瑜伽大师，又继续产生武装的共产主义起义者。

一方面，印度教、佛教或耆那教的僧侣放弃了他们社会的等级制度，将他们个人从无尽的轮回中解放出来，以达到最终平等的未来世界。另一方面，印度的纳萨尔游击队与他们的过去决裂，致力于建立一个无种姓和无阶级的社区，寻求解放整个社会，以便在当前争取一个更平等的未

来。有些人在未来为个人寻求解放，另一些人则为大众的利益，在当下为解放理想而努力。

但两者都涉及到一种信念和承诺，一种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信仰，这就像遵循宗教教义一样，难以动摇。他们都愿意牺牲一切，包括自己，来实现他们的解放理想。那么，拿起武器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这些革命方法，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本身就产生了一些世界上最坚定的追求更平等社会的人。

我知道，吉安吉不会赞许我的想法。向他和他的领导同志提出暴力、牺牲、殉道、放弃和革命之间的同源关系，会被他们视为相当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这种比较也与纳萨尔派对他们所创造的完全世俗化的世界的理解完全对立——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宗教的位置；这个世界只能通过阶级分析的咒语进行分析。但是，正是这种弃世者和革命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把革命暴力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召唤，这意味着像吉安吉这样的人，即使曾经被他们的朋友责备为不能伤害一只蚂蚁——至少我听说是这样——也能够拿起武器。

对作者这一小节叙述的评论

本小节主要讲述的是作者在和吉安吉相处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印共毛革命者和印度教苦行“弃世者”的相似之处的比较。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该小节进行一些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一个并不是马列主义的类比比较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宗教，以此来增进读者对印共毛的了解：作者在文中将印共毛追求的共产主义目标和印度教的“平等世界”并列，尝试解释印共毛游击队成员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为了运动的进行，为了“平等世界”的到来——和印度教僧侣的苦行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平等世界”的手段。

这样的对比与并列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正如作者自述：自己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知识积累。这样粗浅的认知反应了目前西方学界的一般学者和民众对于毛主义和马列的认知并没有脱离宗派斗争的层次，尽管这样的类比只是为了增加一点点可读性。同样，这样的类比没有解释，在亚非拉的广袤的土地上，为什么在其他宗教盛行的地方，也出现了毛主义游击队，可见，这样的类比是有失偏颇的。

同样的，将印共毛游击队对于资产阶级及僧侣贵族们的现实斗争等同于虚幻宗教的意识形态斗争，这是荒谬而无法令人信服的，这样只是在解构无产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这只是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在人间建立天国是荒谬的”另一无聊变种，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尝试以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式，砸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以达到解放无产阶级的目的。这一斗争是在现实

发生的，根本不需要以其他的宗教或者理论作为一个坐标，来烘托这一行为的正义性，因为这一斗争天然具有广泛的正义性且必将取得成功。

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也会与当地的反抗运动（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产生融合。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作者的认识没有在纳萨尔派的革命群众中得到体现。

本文的游击队员和领导人们同印度教徒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确实地理解了“乌托邦”的实质，并探索着通向那里的现实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革命运动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的原因。

第二节：牺牲、放弃、解放与暴力（下）

从2008年12月，我第一次见到吉安吉起，我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对于革命暴力的立场。我到达的时候，他正在拉尔冈地区的一片森林空地上，那里的人用几个夜晚搭好了一个营地，参加被他们称作“烹饪课”的活动。十五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在地上坐成一圈，围着一个年长的男人——他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和一名被称作他们的“化学老师”的男人。年长男人面前有一台秤，他正在称量面粉，将面粉与黄油和糖搅拌在一起。“多少面粉？”他问，“250克。”有人回答。

一个神色慌乱的青年冲进来扰乱了课堂，他大汗淋漓，好像跑过了一次马拉松。他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刺耳的大笑。很显然，他一整天都在村落间跑来跑去，但并没有拿到他被派去收集的那味配方：10升牛尿。奶

牛自然是很多的，但年轻人太过害羞，耻于去问牛主人自己能不能将那些牛尿收集起来装罐。我很疑惑。当我们深入山间沟壑去测试这些配方时，我才明白课程的目的。有些成功了，其他的则表现平平。而其中表现最好的混合物被放在了巨石下，它足以将巨石炸上天，轰成碎片。

面粉，黄油，和糖都是不同化学物质的代号。比如氯酸钾，硝酸，甲醇和硫磺。而牛尿是制作硝酸铵的原料。所有这些原料被放到一个带着导火索的小塑料罐子里，并且通过一根长线连向相机的闪光灯。闪光灯将会触发引线，引爆塑料罐里的内容物。他们正在制作和测试纳萨尔派最恶名昭著的手工地雷，那是让警卫队远离游击队根据地最主要的威慑。

那天测试过的炸弹没有一个超过 250 克。但最终完成的炸弹会在 4 千克到 20 千克之间，取决于它将用于攻击哪种交通工具。它们会被埋在交通工具将要通过的土路下，有时被排列成三角形，有时则会为了最强力的效果排成“W”形。安置炸药的目标是杀死政府的士兵，却力求保存其中的武器完好无损。4 公斤的胶质硝甘炸药足以做到炸翻一辆吉普车的同时保证其中的武器可以被回收。而 8 公斤的炸药就会连带着武器一同炸毁。

“你对暴力持什么态度？”在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围着空地篝火坐在地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阿伦吉（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问我。我知道，这是测试我在哪种程度上是敌人或是朋友。我感到不知所措。真相是，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暴力，吉安吉接着说，仅仅是意味着一个结束。没有意义重大的革命不是伴随着暴力发生的，他还说。没有政权

的更迭，就没有国家权力的交替：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古巴革命，所有这些反殖民地的革命都是如此。他还可以继续举例。

“我们的暴力并不是无差别的，也不是安那其式的，我们不会宽恕恐怖主义，”他澄清道。他们的目标，他解释道，十分明确。在封建地区，他们的暴力是针对地主的。在氏族统治的山林间，他们主要针对的则是印度的警卫队。他说，就让政府教师、医务人员和基建工人继续他们的工作吧。他们只会攻击警卫队和森林的巡逻队。平民则绝不在考虑之列。他们的方式，他说，和那些 911 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完全不一样。他说，那些是恐怖主义的行径，因为他们屠杀了无辜的人民。

他说，印度政府和它的代言人将聚光灯仅仅是打在纳萨尔派的暴力武装上。“但是，”他说，“看看那些统治阶级精英日复一日强加给印度人民的暴力吧。他们所谓的殖民地独立已然经过了六十个年头，但他们所带来的只有贫困。他们搜刮了人民的土地与森林，却什么都没有回报给人民。没有基础卫生，没有电，没有流通的水。人们甚至还未成年就由于疾病垂垂死去，他们的生活质量被削减得如同牲口一样。实际上，比牲口还差。统治阶级将它们的贵宾狗喂得脑满肠肥，对他们的仆人却拳打脚踢。”

他的语言是情绪化的。但是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在印度，每半个小时就有一名农民由于负债累累而自杀，每十五秒就有一名孩子因饥饿和疾病去世。人们经常由于抗议他们过低的薪水或保护他们仅剩的那一点土地而被处决或入狱。与此同时，亿万富翁们账户上的美金数

字却不断增加。吉安吉说，人们很容易只关注游击队的枪杆子，却忘记了那更广泛存在的“社会结构性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社会与制度结构上内在且特有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人们甚至无法被满足最基础的需要。

被压迫者的暴力经常被视作对于压迫者暴力的回应。但是在我住在拉尔冈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于这种二元的态度愈发持保留意见。被压迫者从来不仅仅是一群性质完全相同的人。那些被同化的内部人员呢？或者是那些转向另一端的人们呢？或者是那些被纳萨尔派所射杀的告密者和叛徒呢？

我早已听说过拉尔冈地区那些被纳萨尔派所处决的告密者们——他们至少有一人。最备受讨论的是一名承包商，他传说垄断了当地政府的基建项目合同，但自己私吞了其中所有的钱。他有两个妻子，传闻说他还有个情妇；由于他只在乎个人利益，使得他实在是不受人待见。纳萨尔派怀疑他出卖革命活动的情报给警察，便组织了“人民法庭”来决定如何处置他。村民们决定让他挨两百下鞭子，但在刑罚执行时，他是那样强硬，他的身体甚至都从未瑟缩过一次。最终，游击队用五枚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并且将他的尸体当作潜在叛徒的实例留在了河岸边。

吉安吉说杀人只是一种极端的手段，仅仅是用于对付那些完全不能被接纳的人们。但，我想，谁又能决定他们的状况是否如此呢？以这种方式夺走任何人的生命能被正当化吗？这难道不会演化成一种主要受害人是“被压迫者”的暴力的死循环，从而开始在人群间的暴力统治吗？

此外，阿迪瓦西人是否正随着这场叛乱的蔓延，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在相互对抗呢？印度政府从世界上其它地区吸取了针对游击队的平叛行动的教训。来自游击队据点附近地区的可怜的爱迪瓦西青年们，被用来对抗反毛派的安全部队，去跟他们的阿迪瓦西兄弟姐妹们作战。

一天晚上，我意识到政府利用阿迪瓦西青年的重要性。当时，安全部队爬上了山，进行他们每三周一次的扫荡行动，他们占领了拉尔冈学校，并把它改成了军营。在这种时候，我通常离开村庄。因为我担心，如果政府部队知道我住在那里，他们会以保护我个人安全的名义，要求我离开。除非有他们陪同，否则不允许我再回去。但是那天，当他们的装甲车开到山顶时，已经是下午很晚了。回到兰契市要走八个小时的艰苦路程，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路程我得在晚上进行。而且，我在拉尔冈已经呆得足够久了。我想着，只要我不冒险走出家门，保持低调，就会很安全。我可以第二天一早再离开，不会被发现。事实上，我已经变得非常自满，以至于晚上七点后，当安全部队驻扎在学校里时，我正享受着从半开的前门吹来的晚风，坐在索玛尔家的地板上，在煤油灯下教她七岁的女儿读书。

一道影子落在我们的门口。看到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我惊呆了。“姐妹，您有吗？”他们问道，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我几乎无法呼吸，但我很快意识到他们是来找紫荆木酒的——阿迪瓦西人从长叶紫荆木花中蒸馏出来的酒。我走进泥屋里面的房间去找索玛尔，希望在她应付他们时，我能躲在厨房里。但他们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我听见他们讲的

是纳格普里亚语（Nagpuria，印度贾坎德邦及附近地区使用的语言）——这是我做博士研究的地方（即贾坎德邦）所说的语言，距离这里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在互相询问，我是否真的如我所说的那样，是索玛尔的妹妹。

我知道我必须鼓起勇气和他们说话。虽然我在里面瑟瑟发抖，但我还是自信地走了出去。索玛尔坚定地站在旁边，双臂交叉，好像她是我的保镖——后来我就是这样跟她开玩笑的。我用最清楚的纳格普里亚语，以权威的语气问年轻士兵们，他们从哪里来。我能用他们的方言跟他们说话，这让他们吃了一惊。碰巧他们是六个月前刚被招募的新兵，我不仅知道他们来自哪个村庄，还知道他们中的一个之前给一位医生当过司机。我以他们村里的姐姐的口吻，斥责他们违反规则，晚上从军营里出来找酒喝。我告诉他们——他们也很清楚这回事——如果警司发现他们的行为，他们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

于是，我们成为了彼此违法行为的同谋。我知道他们不会把我在村里这回事告诉警司。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情地把他们看作是阿迪瓦西的青年，就像是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一样。那些年轻人被招募进了贾坎德邦的“美洲虎”部队——一支专门用自己的战术与游击队作战的部队。他们将在（绿色狩猎）行动的前线，是最有可能在与游击队的战斗中死亡的人。

正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穷人现在正被用来与穷人作战。（政府）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招募阿迪瓦西男孩加入警察和安全部队了。在恰蒂

斯加尔等邻邦，警察把阿迪瓦西男孩们武装成特警，还武装起阿迪瓦西民团。他们从纳萨尔派居住的社区里招募成员，让穷人对抗穷人，互相残杀。

在我认识吉安吉的那一年里，我告诉了他我的担忧。我说，他们最终永远也无法摆脱那些与跨国公司合作、制定了产生不平等的政府经济政策的政客们；相反，纳萨尔派将会杀死数百名被政府军使用的年轻阿迪瓦西士兵。

吉安吉说，在安全部队前面的年轻人确实将会是纳萨尔派造成的第一批伤亡者。他试图辩解道，当这些人为政府工作时，他们就成了政府武装；但是，当同样的人休假回家探亲时，纳萨尔派决不会攻击他们。

虽然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信服，但我还有其他迫切的想法。“从你的枪管里流出的力量会使你试图摧毁的体系再次出现，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吗？”我问道。

吉安吉看向别处，他的思想似乎也在别处。最后他说：“这是一个秘密的地下运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他一时间把纳萨尔派叙述成一个抽象的整体。

他补充道，政府对他们进行的那种危险的镇压，使得他们的革命活动只能限于军事战略。面对这种绝望，这让人很难继续保持希望，这太容易使压迫者的暴力开始再次出现。

他继续说道，国家的镇压使他们几乎没有做群众工作的空间，不允许他们发展政治意识、开展政治教育或群众动员。他说，危险在于，人们加入毛派时，并没有分享他们对另一个世界的远见和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枪只是一种加速了他们在社会体系内向上流动的手段，而这种社会体系正是毛派试图摧毁的。

当他说完这些后，我发现我触及了他的痛处。于是我中止了对话。

第三部分：吉安吉，敏捷的心灵

第三节：晨间一幕

在吉安吉身后，科利把自己裹在披巾里，蹲坐在正在煮茶的铝壶前，用三块大石头临时垒成了三角形火炉，烧着一小团火。每当他为火炉添柴并不时蹲下鼓风时，他和善的黑脸便被温暖的橙色火焰照耀得愈发明亮。

我蹲在科利旁边，仿照着他的样子在炉火前温暖手掌，烤一会儿手背，再烤一会儿手心。早上还没出太阳的这个时候，空气中总是有些寒意，但火和茶的热量很快让我暖和起来。

吉安吉正在和附近的战士聊天。B 班组（包括科利和吉安吉的警卫）有他的老熟人，但排里的其他人（A 班组和 C 班组）则来自贾坎德邦的另

外一个地方，他从来没在那里工作过。他们之间的玩笑话被打断了，因为排长维卡斯（Vikas）正向他们走来。

我听到维卡斯说，“但我们时间还多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到傍晚才会出发，对于姐妹来说可是个好事。”

我听不清吉安吉在说什么，但他看起来很恼火。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科利发生了什么，我对我的名字可能成为一件我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的借口感到不安。

科利说问题出在维卡斯身上。他坚持要从村庄要一只鸡拿来当早餐，这正是吉安吉所厌恶的事情。科利说吉安吉厌恶这种行为，因为这意味着纳萨尔派在村民头上作威作福。一只鸡很贵，大多数村民只在特殊场合才会吃。而现在显然不是。科利解释道，如果村庄举办庆祝活动，庆典，纪念活动，那时候每个人都能吃到鸡肉。但为了像今天这样普通的早晨就去杀只鸡，科利这样解释，就让游击队员们沦为了像国家警察和森林警察那样在村民头上作威作福，肆意掠夺牲畜的反动派。

最终吉安吉向我们走来并在火边坐下。他对面露悲伤的科利说：“怎么了，干革命必须要带着笑容啊。”但他似乎既是对科利说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维卡斯和小队队长决定，我们将在树林里待上一段时间并在黄昏前出发。吉安吉告诉科利，现在正好把我的制服拿到附近村庄的裁缝那里去。尽管有腰带，我的裤子还是不停地向下滑；我每走五十码左右就得停下来

提一下裤腰带，这让我担心拖累大家。在一丛灌木的遮蔽下，我换上了红色的纱丽裙——就是普拉桑特为我带来的那件——并把制服交给了科利。

晨光沿着树林的缝隙照耀下来。那些用不着放哨的人从附近的一棵槐树上折下树枝作为牙刷，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卖力地刷牙。像所有的清洁活动一样，刷牙是一项集体任务。每隔一段时间，男人们就会停下来吐出纤维，聊几句天，然后再刷牙。形成了刷牙、吐纤维、聊天的循环。

这可是个技术活，我的祖母在我们住在内罗毕的时候教过我怎么用这些树枝来刷牙。尽管当时牙刷到处都有得卖，而这样的刺槐树枝却只能从东非大裂谷一路运到我们所住的城市，她还是更喜欢像以前生活在古古拉特邦村庄那样用树枝来刷牙。这套程序很花时间，而这件事需要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则让人陷入奇特的沉思。树枝的一端被咬住，使树枝变得湿润并使得纤维分开，形成一个像刷子一样的尖端。牙齿被反复，上下刷洗，最后，当树枝湿润到可以弯曲成两半时，就用这个弯的树枝来清洁舌头。用过的树枝可以丢弃在任何地方等待自然分解，不会污染环境。我看向我的现代塑料牙刷。它既没有完全相同的效果，自然也远非环保的。

刷完牙后就是维护枪支的时间了。每个人都接受了步枪的训练。但是否所有人都有实战经验？纳萨尔派回避和政府军进行面对面的交火，并且专注于游击战——有选择地伏击，抢夺武器，并通过埋设地雷将国家军队挡在据点之外。

游击队员们要么坐在岩石上，要么坐在树下，将他们的武器拆卸开。一些士兵把浸过油的布包在树枝上，巧妙地清洗枪管内部。其他人则用围巾或毛巾擦拭他们的枪身，并且不放过任何角落和缝隙，直到枪闪耀着金属的光泽。

这又是一项集体清洁活动，不过比之前那个更危险。我遇到过一个战士，他在清理的时候走火伤了手。他说他是幸运的；其他人会因为这样的事故丢了命。

我走向正在擦拭自己 AK47 的维卡斯。“每支步枪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他骄傲地宣称。

大多数革命者的步枪都是从警察和被得知持有枪支的富有乡绅那里抢来的。我十年前还在前往贾坎德邦另一个阿迪瓦西人聚落的旅途中，而那时纳萨尔派正试图向这一地区扩张。我了解到游击队进入一个地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当地地方武装。他们袭击偏远的农村警察局，偷他们的军火库，并迫使当地富有的乡绅交出枪支。这种策略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武器，而且还垄断了该地区的暴力，这对在那里形成一个平行政权至关重要。

我从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关于抢夺武器的第一手见闻，她是一位和她的丈夫——一位高种姓的古吉拉特邦退休教师——一起共同生活的奥地利老妇人，他们住在贾坎德邦附近的农庄，这里长期以来就是英裔印度人的聚居地。1992 年的一个晚上，纳萨尔派绑架了她，因为她的

丈夫在几天前一个小队上门时否认自己有两把枪。事实上，她的丈夫听说过纳萨尔派从其他富人邻居那里夺取枪支的事情，因此将他的两把武器存放在警察局“保管”。游击队带着我的奥地利朋友在森林里走了几个小时，给她提供了午餐和晚餐，晚上还在附近村庄的一个小屋里给她找了一张床睡觉。她说这件事情让他们搬离了那个环绕在鸟语、鹿群，森林中的美丽家园，来到位于城市安全地带别墅区的一个高层公寓。但她还是被纳萨尔派对她的尊重所震惊，他们叫她“阿姨”，坚持让她多吃一个煎饼，甚至为她找到牛奶（这在该地区是一种奢侈品）来喝，并解释他们如何需要枪来为穷人战斗。当她的丈夫从警察局取回他的步枪并把它们交给小队后，他们就把她送回了家。

维卡斯想告诉我他的枪的故事，所以我听他讲。他两年前在奥里萨邦得到了这把枪，他自夸那是一次毛派游击行动的一部分，而那次行动在游击队中拥有传奇般的地位，并被印度媒体广泛报道。2008年在纳亚加尔（Nayagarh），毛派游击队同时袭击了地方军械库、警察培训学校的军械库、警察局和一些警察哨所。

维卡斯说，为了那次任务，三个排从比哈尔邦出发，穿过贾坎德邦的树林，最终来到奥里萨邦。这花了他们两周时间，之后他们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样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这里的骨干们。在那里总共有 360 名游击战士。他们同时发起突袭，先中断所有通向纳亚加尔的通信线路，再切断电源，并封锁了所有通向镇子的出入口。他们坐着卡车，巴士，吉普车以及摩托车冲进镇子并夺走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十五名警

察和一位镇民死于这次行动，但他们收获巨大——1200 件武器和超过十万发弹药。得到的枪是如此的多，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枪，他们把其中一些藏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来找到它们。尽管每个人都带着两把或者三把步枪，他们也无法把所有枪都带回去。他得意地说，抚摸着他的那把在那次行动后带回游击队里的 400 条枪之一的 AK47。

与吉安吉的警用步枪相比，维卡斯的步枪很光滑。它的圆形弹夹和被抛过光的枪管在木质枪托和枪把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

尽管我在这些武器的包围中生活过了一年了，但在它们身边，我仍然很难不感到不安。当我看着维卡斯小心翼翼地擦拭枪托时，我想起了吉安吉前段时间对我说的那番令人不安的话，说这些秘密枪支的枪管如何能再现压迫者的暴力。在那一刻，革命道路的成败似乎取决于能否清除可能混进革命武装的污染。

这两节很清晰地描绘出了印共毛斗争的困境，但这种困境并不是如作者所言，因为暴力而带来的，实际上，它是由反革命的暴力带来的。不对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加以区分，不将暴力的积极意义进行理解，试图将所有的暴力归为一类并且归为最反动的那一类，是犯了杜林的错误。

而恩格斯对此的回应则是：

“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虽然他明明知道，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带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加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

（恩格斯《反杜林论》）

我们祝福印共毛的斗争，希望他们能找到破解危机的方法。

照片

这一小节主要向大家展示一些书中作者在印度田野调查期间拍的照片，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资料其实不多，希望能增进大家对印共毛游击队的了解。

我们会根据书中情节的推进慢慢放入这些照片。



和游击队一起从比哈尔邦向贾坎德邦行军，2010.



的印共毛邦级会议，2010



印共毛邦级会议举行期间，在一间帐篷的墙上找到的画有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国民大会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涂鸦，直升机代表的则是政府部队的围剿活动，2010.

第三张图在第二部分第二节：林中之城中描述过，大家可以去看看^[1]。



在毛主义营地中的游击队士兵队列，贾坎德邦，2010



到达“烹饪课”的临时教室，贾坎德邦，2008。许多阿迪瓦西人在游击队里学会了读书写字。一位游击队员正在一间阿迪瓦西人的房



子里读报纸，贾坎德邦，2009。
绘制毛主义共产党的旗帜，贾坎德邦，2009。

本章节照片均由本书作者阿尔帕·沙阿拍摄。

第四部分：科利的“家外之家”

第一节：第二夜

脚踩在树叶上发出的沙沙声打破了森林午后的宁静。我警觉起来，把笔记本合上塞进包里，套上鞋子就跳起来。我们在树下休息了一天，准备开始前往贾坎德邦的第一个徒步之夜。

游击队员一个接一个地从灌木丛里冒出来。我数了下差不多有 25 个年轻人。这是另一个排。他们的排长说村民告诉他我们就在附近。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从邦级委员会回家的路上，但他们的目的地是恰蒂斯加尔邦边界的游击区。吉安吉说我们在分开前可以同行几个小时。他们分成几个小组，一群人在我写作的树冠下集合，加入我们的队伍。剩下的人则散开到各个位置充当哨兵。

在日落前两个小时吹集合哨。我们排成六排进行点名，科利站在我的正前方。我还不太习惯军队中的日常生活，所以轮到我报数的时候犹豫了。我很感激科利报了 15，帮我解了围。士兵们一个接一个报数，直到最后一个报到 55 为止。

夜幕迅速降临，吞没了我们的行迹。考虑到步调一致会让走远路更轻松，我专心跟着科利的节奏走。

我们在高耸的山石中蜿蜒而下，爬下陡峭的花岗岩山坡，下到山谷中。我们下方是一大片盛开的金合欢树，树头挂满了深红色的花朵。长长的队伍好似一支蚂蚁大军，穿过鲜红的地毯，向着一望无际的稻田展开，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蓝色群山标志的贾坎德邦。察觉到自己身处这样一支队伍，不禁令我感到有些讶然。

那是阿迪瓦西人所称“丛林政权”的森林和田野。这一区域绵延数千平方公里，范围包括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和安得拉邦。这里的景观一年中变化很大。娑罗树的花期会持续一整个三月，届时空气中弥漫着小白花的甜香，令人格外迷醉。当地人认为这是一年中最浪漫的时节。不久之后，地面将变得干燥而遍布黑色斑块。这是因为当地人采收紫荆时会故意有节制地放火来清理灌木丛。到时紫荆落花会像黄色地毯一样铺满大地。

这些令人陶醉的风景之后又将被称为拉特（Lat）的热浪卷走。热浪会像忘关的电吹风一样日夜无情地吹过原野，把温度拉到 50 摄氏度乃至更高，并很难缓解。树木掉光了叶子，只剩下树枝高指天空。游击队借以藏身的森林变得难以隐藏。地下水位会下降得非常之低，以至于只有在干涸的河床上打深井才会有水。安全部队常利用这几个月的反常气候来扩大巡逻范围。感觉好似天地间一切皆已窒息在干涸之中，只等待季

风季的第一场雨才能缓过气来。一旦下了雨，河水将再次流动，安全部队便无法轻松进入游击区，丛林与田野也将重新变得郁郁葱葱。

还有多少个排前往森林各地？虽然纳萨尔派还没有在国内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但将兵力从一个游击区转移到另一个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小径在峡谷中央分出一条岔路，是时候和另一个排分开了。两个排面对面站着，先握一轮手，然后高举右拳喊出“红色的敬意！(al salaam)”，进行仪式性的告别。我看着另外一个排向西走去，消失在树林中，好奇他们又会在接下来的旅程中遇到何种困难。当他们全员离开后，我们便向南进入丛林。那是外来者眼中不宜生存的荒原，却是纳萨尔派游击队所珍视的家园。

绕过一块巨石，一阵刺耳的嗡嗡声传来，隐隐盖过了林中风声。是蜜蜂。岩石下满是华丽繁复的蜂巢结构。

吉安吉眼睛一亮，转头对我说：“你还记得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蜜蜂的那一段吗？”他问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吉安吉引用道^[1]。

确实，劳动的目的性使人区别于其他生物。马克思的话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2]拥有将物质世界塑造为目标形态的能力。这也是吉安吉过去 25

年中纳萨尔派信念的关键。它们使他在忍耐地下生活中无止境的苦难、失望与悲剧的同时，保持对创造新世界的乐观态度和希望，培养科利这样的新兵来达成最终目标。

“姐姐，现在我来帮你拿包吧。”科利转过身说。我已经记不清科利提出帮我拿包的次数了。我们才刚刚开始一段漫长的旅途，受到这样的特殊优待让我并不舒服，尤其是在一个主张打破劳动分工偏见，人人平等承担劳动义务的社会中。

在离赤道这么近的地方，夜幕像往常一样来得很快。要不了多长时间，落在树后的橙色火球就将完全消失十个小时。随着日光的消失，科利的黑发、黑色腰带和绿色制服之间的对比被抹去，好似一张木炭画的剪影。

夜色中，蟋蟀的唧唧声，蚊子的嗡嗡声以及青蛙与蟾蜍的呱呱声让这片土地变得生机勃勃。这些全新的生物群落让我不禁想到，这些夜行动物和游击队一样，在夜幕的掩护下创造着新的世界。

尽管科利恳切地建议我使用自己的手电筒，但因为排里的三十来号游击队员都没有手电，我也不愿意做这个特例，制造通过灯光定位到我们的风险。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除了行进中的游击队，没有多少其他情况会产生移动的灯光。但吉安吉说只是一盏灯的话其实还好，毕竟落单村民在附近走动也是有可能打手电的。

我把手伸进包里，搜索着我便宜可靠的黑色塑料手电。那是在贾坎德邦当地集市上买的。它取代了我在伦敦考文特花园（译注：伦敦著名商

业区)买的紫色奢华的美光牌(MAGLITE)手电。我买美光手电是冲着它宣传的精致、续航和耐用,但在贾坎德邦农村,不到一个月它就莫名坏了。我轻轻按动开关,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就一下子跪倒在地——灯光太亮,把我晃晕了。

科利抓住我的胳膊蹲下来,他告诉我要放松,不要马上站起来。他问我是否扭伤了脚,要我确认一下自己没事了再站起来。他温柔而关切的声音尤为令人宽慰。

我十分尴尬地站起来,为自己的笨拙感到羞耻。我就不能学着像排里的其他人一样敏捷地移动吗?吉安吉递给我掉下的帽子,我把头发塞回帽子里,发现全排人都在等着我。科利温和地坚持让我把包给他。我不太情愿,但吉安吉同意了。

我们继续前进。科利建议我要不就不用手电了。等眼睛调整好之后,低可视度的环境下走路也未必很难。他把我的手电筒收走,让我跟着他的鞋印走。最重要的一点,他说,是绕开视野里的黑斑。

当我的眼睛习惯黑暗后,一条白色的小径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这就是我需要走的道路。夜色下的黑斑一般是地面凹凸不平的表征,有可能是会扭到脚的洞。要是打开手电,这些细节反而不那么容易察觉。科利是对的,一旦你学会了如何看路,完全黑暗的环境下反而更好走。

我们继续前进，在峡谷边缘停下。从那里开始将是一段穿越开阔稻田的危险旅程。我们在那里等待两名派往前方观察地形的“侦察兵”带回印度安全部队动向的消息。

每个人轮流进入草丛，“ek number”代表第一个去小便，“do number”代表第二号或更后面去小便。这将会是我们接下来几小时里最后的休息。

（译者注：ek, do, teen 分别是印地语中的 1, 2, 3）

科利宣布：“所有男人都去右边，所有女人都去左边。”考虑到我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他所重复的规则十分巧妙地既照顾了我，又不让我感到被特殊对待，可以说周到极了。

随着夜幕降临，周围的温度开始急剧下降。科利在大家解散后生了堆火，很快，树枝就被烧得噼啪作响。科利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破旧的比斯莱里（Bisleri，译注：印度矿泉水品牌）矿泉水瓶，瓶内装了有半瓶掺了水的牛奶。科利总是知道吉安吉想要什么。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仍然喝上了茶。在科利弯身朝向火堆时，我盯着他杏仁状的眼睛上浓密的睫毛。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离开拉尔冈在这些战士之中生活？

两个侦察兵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他们报告，有一支 200 人的安全部队正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巡逻，这支安全部队花费了一天时间占领了距离我们仅仅半公里的一所学校。而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安全部队刚刚返回

了距我们 15 千米之外的南方主营地。因此我们可以安全的继续前进并穿过农田，到达下一个能给我们提供掩护的森林。

吉安吉转头对维卡斯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安全部队营地，并询问维卡斯是否知道穿越贝赫拉村（Behra）的路线。

维卡斯看上去在全神贯注地玩着手机。但在我们所处的位置，除非爬上高处，一点信号也不会有。所以他到底在干嘛？他的手机相当华丽，硕大的屏幕上闪烁着荧光绿的数字，显然与其他人携带的诺基亚基本款不同。

维卡斯漫不经心的向吉安吉保证他非常确定这一带的地形，我们在他的带领下选择的路线非常安全。吉安吉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可能他对维卡斯的轻率有点不满，但是他努力不表现出来。吉安吉让维卡斯先放下手机，天色已晚，我们该继续前进了。

我站在科利的后面，大家排成一队，继续前进。地形变化地很迅速，森林消失后，我们头上出现了闪烁着星星的午夜蓝天空，预示前面有大片的稻田。

马上出现了新的挑战，我不得不开始学习在田埂上走路还要保持平衡的技巧。窄窄的田埂划分田地归属，还能在雨季蓄水。和林中小路一样，黑暗中的田埂看上去仿若一抹白痕。我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在森林之外的感觉和森林里并不相同，我们完全暴露在平原之上了。

夜幕中回荡着昆虫的歌声，在此之外，刺耳的发动机声越来越大，变成了回荡的嗡嗡声。远处白光闪烁，它的体积越来越大，就像降落在田野中间的 UFO。

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吉安吉提高声音对维卡斯说：“我们为什么走这条路？”我意识到白光就是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营地，而发动机噪音是营地发电机的声音。尽管周围的村庄没有电力供应并笼罩在黑暗之中，这里的营房却可谓灯火通明。很快，营地探照灯的灯柱打在天空中。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到达了军营的铁丝网。大约 3000 名安全部队士兵在此扎营。我做了一个快速的计算：我们每个人要对付 100 名士兵。

吉安吉愤怒地指责维卡斯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走。维卡斯理应熟悉这地方的地形乃至每一棵树。“你一整天都在干什么？你只是和我们一起吃喝玩乐么？”吉安吉向维卡斯大吼。有人在我们背后喊道：“停下！”

有几个人蜷缩在我们身后 10 米的地上，科利和吉安吉向他们跑去，一个年轻人平躺在地上。

吉安吉告诉每个人保持静默并做好战斗准备。他要求各分队指挥官关闭他们的对讲机。由于离军营已经非常近了，安全部队可能有办法拦截我们的通讯。

吉安吉跪在瑟瑟发抖的年轻人身边，年轻人名叫比德奥（Bildeo）当我们在峡谷尽头驻足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呕吐的年轻人。几天以前，比德奥因为疟疾而发烧，吉安吉和其他一些领导者一直担心他能否继续

参加行军，但比德奥执意和大部队一同返回他在贾坎德邦的家。科利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了一个大的白色塑料包，拉开拉链，拿手电筒照着找东西。科利的包里装满了药品，注射器和绷带。

“别担心，你不会有事的”，科利柔和的对比德奥说：“我们都在这里照顾你”

吉安吉用手摸了比德奥的额头，脖子和手，量了体温，因为天色太暗自己看不清，他将温度计交给科利。科利说超过了 104 华氏度（译注：约为 40 摄氏度）。吉安吉问科利是否有葡萄糖和奎尼丁（译注：可治疗疟疾，发热和心律失常等），他打开自己的背包，将橙色花纹的床单拿给维卡斯，让他找两个人用床单做一个担架。

与此同时，科利将一个注射器注满药物，卷起比德奥的袖子，在他的手臂上进行注射。吉安吉后来告诉我，尽管科利非常年轻，但是他非常聪明。科利花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学习和阅读，掌握了基本的救护知识。

两个人拿着几根长而结实的树枝回到了我们身边，并将橙色床单固定在树枝中间。比德奥被抬到床单上，四个人分别将树枝的一端扛在肩上。吉安吉让维卡斯走在整个排的最后面，让当地一名年轻人代替维卡斯引导我们前往安布拉村（Ambla），这个地方在营地西面四公里处。我们带着担架上的比德奥，准备继续出发。我们绕过了安全部队营地。发电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这让我感觉我们在环绕一个随时可能吞没我们的捕蝇草，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它的毒光。

我们的行军步伐非常快。大概 45 分钟以后，我们抵达了村庄的第一座建筑。因为距离安全部队营地太近，我们不能停下，但我们知道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两小时的艰难行军以后，每半小时会快速更换负责扛比德奥的人。我们在完全沉默的情况下行军，直到我们和安全部队营地拉开 15 公里的距离，进入了一片安全的森林区域。

澄澈的星空渐不可见，树冠的阴影迅速吞没了我们，这令我迅速放松下来。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人可以如此迅速地用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森林在我想象中曾是危险而神秘的地方，但现在同一个森林却是我的安乐窝。

我们继续前进并最终抵达了村庄外围，在这里我们能够比德奥寻求医疗援助，他也能够被转移到一些同情印共毛村民的家中，由医生照顾。我们停下，分为三列。当点名结束后，吉安吉让我和排里其他人一起休息。他和维卡斯消失在夜幕中，安排比德奥接下来的去处。

我精疲力尽地靠坐在一棵娑罗树下，伸展酸痛的双腿。拥有休息时间无疑令我大为放松。休息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深埋在肩胛骨和脖子下的疲劳逐渐舒展，紧张感也慢慢消散。

“儿童兵”，看到一些站在周围的年轻战士的轮廓，我想到了这个词。这可能就是他们在媒体中被称呼的方式。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被强迫离开家园、乃至被绑架的儿童，最终被洗脑并加入“反叛”事业中。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印象，从塞拉利昂和尼泊尔到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办公室中。

我从印度警方那里听到印共毛强行征召儿童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印度聒噪的“中产阶级”中流通，被所谓的国际特赦组织采纳，并最终进入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之中。这帮人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儿童兵”这个概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些年轻战士的真实生活？又将如何描绘他们从“叛军”中的退役呢？

科利像以往一样细心，递给我一些水。我被他的关心所感动，问了他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科利，是什么使你加入了这个丛林政权 (Jungle Sarkar)？”

科利不再微笑并看着地面，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也能感受到阴影笼罩了他的面庞。我不由得一激灵，我可以如此大胆么？

翻译：三角贸易、食语虫

校对审核：镜鱼、余烬

参考

[^]引用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05.htm>

[^]这里原文为 imagination，考虑到资本论原义，这里翻译为劳动的目的性/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想象力

第二节：平等主义的理想、人文关怀和亲密关系

科利的父亲因为科利把牛奶洒在地板上而打了他。尽管只是洒掉了一小杯牛奶，但科利还是被扇了一耳光。作为回应，科利威胁说要离家出走。那是他第一次试图加入纳萨尔派的队伍。

我认识科利的父亲，曼格拉·奥昂（Mangra Oraon）。他是一个快乐，善良，慷慨的人。他的茶馆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里可以从许多歇脚的人们口中打听到村里的八卦。茶馆在两面砖墙和一块瓦楞铁皮下，有两个面是敞开的。曼格拉建了三个用柴火烧的泥炉，并在两边摆上了带长凳的木桌，以便让顾客舒服地喝着他的热腾腾的茶并吃着点心来打发时间。一个炉子专门用来不停地供应甜到腻的奶茶。在另外两个炉子上，曼格拉炸着塞满土豆、干果和花生的萨摩萨饼（samosas）-当地人称之为“辛格雷斯（Singaras）”-以及面糊洋葱煎饼（bhajias，一种南亚食品，将蔬菜放入面糊后油炸而成），所有这些都配有美味扑鼻的罗望子（别名酸豆、酸角）和酸辣酱。同时也总会有一两样甜食供应。在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每周的乡村集市，当人们从邻近的村庄来出售他们的产品并互相见面时，他就用大米和扁豆粉油炸成烤饼，并配上热的鹰嘴豆咖喱。

对于阿迪瓦西人来说，拥有一家茶馆很少见。大多数阿迪瓦西人依靠种地，放牧，和从森林中觅取果实，块茎，花以及树叶为生。如果这种生存策略不能满足生存需求，那么就得到附近村子当苦力，用头或者肩去扛重物，或者移居到印度其他邦去打工，每年大概要在外打工六个月。

小企业或商家一般来说是由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经营的。科利的父亲是这个地区唯一尝试做生意的阿迪瓦西人。

然而，茶馆勉强维持生计，并且严重依赖于科利和科利的兄弟姐妹的帮工。科利最小的弟弟，才六岁就已经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也非常富有进取心。他在他父亲的棚屋前摆了一个煎蛋摊。这个小男孩以做出完美的煎蛋为荣，用辣椒、洋葱、盐和胡椒粉来调味，并且不愿意为了去上学而离开摊子。

我向科利提出质疑说，父亲的短暂烦恼肯定不足以成为加入纳萨尔派游击队的理由。科利同意这一点，并补充道，那时他父亲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心力交瘁。当时是春天的开始，正是阿迪瓦西人为了庆祝新年的萨胡尔节（Sarhul）¹⁰。附近村庄的人都聚集在他们的村子里，所以茶馆的生意很火爆。在不同的村庄，萨胡尔节会在不同的日期举行，以便各个村子的人们参加彼此的仪式和庆祝活动。大家举行祭祀活动来安抚栖息在森林、岩石和树木中的阿迪瓦西人的祖先的灵魂，以确保未来一年的丰收，并且在阿迪瓦西萨纳（Adivasi sarna）——一片神圣的树林里，还有一个特殊的祭祀仪式。在这个宗教庆典里，曼格拉的摊位上挤满了蜂拥而至的顾客，他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

科利从来都不想在茶馆工作，在这个繁忙的日子里，他的反抗对他疲惫不堪的父亲而言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前一年，科利和他的哥哥一起离家出走，在西孟加拉邦的一个砖窑里工作了6个月。科利的焦虑源于他对父亲无休止的家长管束的不满。

“那去学校怎么样？”我问科利。他宣称，上学纯粹就是浪费时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在那里教过书，只要我有空，我就会每天教几个小时。我通常是学校里唯一的老师。尽管按名册记载，一共有四名老师和一个校长。学生是没有椅子可以坐的，而八个月前订购的课本则到现在都没有到货。校长明显是个恋童癖，据说已经强奸了四个女孩。这所学校其实是一个幌子，目的是将获得的工资资金和用于烹饪免费午餐的钱和材料，偷偷地变成建筑承包商的非法收入。午餐计划是政府通过向学龄儿童提供免费膳食来阻止童工和鼓励识字，从而提高入学率的一项举措，但事实上，这一计划在这些地区因为向黑市供应煤油、大米和豆类而变得臭名昭著。负责为学校分配补贴燃料和油的贸易商和承包商将这些供应品卖掉，以此牟利。

尽管自 2000 年以来，作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英国国际发展署的资助的中央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如今各地都在修建校舍。但为什么修建这些校舍就没人知道了。在拉尔冈高林中的一个只有不到一百户人家的村庄里，就因为它被分为两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小村，便有了两所独立的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没有任何教师，但没有承包商会拒绝修建学校，因为从修地基开始到完工为止，整个建造过程中都可以敛财。

尽管修建学校首先是不法分子的黑钱来源，但它们也逐渐成为安全部队驻军的便利场所。大多数学校里的营房都是临时的，但也有一些新建的校舍——在我住的地方九公里远处就有一所——实际上也是为了作为军事基地修建的。这些新学校往往是整个地区唯一的建筑，它们建在设

防的大院里，通常有两层楼高，屋顶上设有警察的岗哨。士兵们可以通过窗洞向任何感觉到的威胁目标开火。

科利继续解释说，在他父亲打他的那天晚上，在萨胡尔节的歌舞声中，他们地区的毛派分区指挥官、他父亲的密友帕拉斯吉（Parasji）拜访了他们家。科利恳求帕拉斯吉带他进军队，但这位纳萨尔派领导人拒绝了。科利说，他早该知道，帕拉斯吉永远不会违背他父亲的意愿。

然而，第二天一早，当科利走进森林进行晨洗时，他经过了妹妹安珠（Anju）加入的游击队，并决定和他们待在一起。当天晚上，安珠所在的班前往奥里萨邦（Odisha，旧名 Orrisa）给一个排提供支援。在比万迪森林扎营时，他再次见到了帕拉斯吉。安珠的班长坚持要把科利带到帕拉斯吉面前——他在森林里，正在那个排的会议上讲话。

科利害怕和帕拉斯吉面对面。他非常尴尬，只盯着帕拉斯吉的脚。他完全可以预料到，帕拉斯吉会送他回家。但令他惊讶的是，帕拉斯吉说：“我知道了，你还是来了。”帕拉斯吉一脸懊悔地告诉科利，他的父亲会很难过，但又拍了拍他的头。那时，科利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大约同一时间，还有五个男孩加入了游击队，我全都见过。其中一个14岁的可合瓦尔（Kherwar）男孩，是被他父母送来的。他的父亲曾几次逮住他独自在家喝酒，最终去问帕拉斯吉，能否带他进游击队里，试着给这个小伙子灌输一点纪律意识。第二个是16岁的比荷（Birhor）男孩，刚从奥里萨邦的砖厂回来——他和父母一起去了那里。他在奥里

萨邦病得很重，所以当他回到家后，他决定去和军队住在一起。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军队里待了六天，尽管他说他早就待了一个月之久。第三个男孩来到军队是因为，他的继母（他和继母住在一起）给她亲儿子的食物比给他的多，这让他很难过。还有我邻居的儿子，一个奥朗（Oraon）男孩，他也是其中一个。他的父亲是钦奈（Chennai）市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想和“丛林警察”待在一起。最后一个男孩来自高山上的一个村庄——那里建有两所完全无法进行教学的学校。他的父亲努力工作，攒钱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让他去我住所附近的学校上学。但这个男孩却骑车去集市，把时间花在看那里的人打牌上。当他的父母最终发现这回事后，深感失望，自然对他很生气。一气之下，这个小伙子搬出了父母的家，去和邻居们住在一起。他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回家。当他们说服邻居们不再通过给他提供伙食和住所来支持他的反抗时，这个少年决定加入游击队。

科利为了逃避父母的压力而跑到游击队的故事是很常见的，这类故事的各种版本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对于在印度这些地区加入游击队的阿迪瓦西青年和低种姓青年而言，进出军队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父母和祖父母会在必要时帮助游击队藏起来，并在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一盘食物，而这些游击队员们往往是他们的孩子，有时候是他们的孙子和孙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一个阿迪瓦西青年和低种姓青年在这些山林中加入游击队的故事，都和科利的故事有着类似的开端：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打斗，在村庄里被禁止但在纳萨尔派军队中被接受的恋爱，对离开家去另一个世界看看的渴望。尽管他们各自经历了曲折，

但所有这些故事的意义在于：对于那些讲述它们的人来说，纳萨尔派如何成为了（他们的）另一个家。

科利的妹妹安珠比他小一岁，在她 15 岁时，也离家出走，加入了游击队，和一个排里的男孩待在一起。这个男孩向她表白了爱意，但她的父母认为他跟她不相配。他来自另一个部落，是个蒙达人而不是奥朗人。无论如何，一个阿迪瓦西女孩都不应该选择自己的丈夫。她追随了她表姐塔拉（Tara）的脚步——塔拉早些时候加入了游击队，和游击队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

安珠 14 岁的表妹莉拉（Lila）也效仿了她。受到表姐的影响，莉拉着迷于漂泊生活的兴奋感，她想去许多其他年轻人去过的地方。凭借着夜莺般的歌喉，莉拉在纳萨尔派文工队内唱歌跳舞，很快就能鼓动起人们的活力。莉拉在游击队里兴盛一时，安珠的命运却不同。六个月后，她的父母说服她回到村里，嫁给他们为她选择的男人。曼格拉在告诉我这件事时笑了：“她已经完成了她的革命，现在该是时候开始生活了。”

阿迪瓦西人的婚礼通常是简单的事情，但曼格拉却在安珠的婚礼上花费了一大笔钱。索玛尔（我住在她家）批评了曼格拉，她说他太受印度教邻居的影响了。曼格拉在他的泥房子外面搭建了一个豪华的木质舞台，上面覆盖着红色和黄色的布料，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的灯，中间还有给新郎新娘坐的两个金色宝座。他租了一台发电机发电，搭了帐篷为所有客人提供住处，还做了一大桶咖喱。他甚至去兰契市为安珠买了化妆品。由于村里没有人用过这些产品，我便承担了为安珠梳妆打扮的

任务。解开化妆品袋，我感到好笑——我看到了给安珠几乎黑色的皮肤用的浅粉色粉底、鲜红色口红、几种色调的绿色眼影、散粉、吉祥痣^[2]、手镯和安全别针，甚至还给安珠买了男性用的淡香水。曼格拉只有基本的识字能力，显然，他看不懂标签。

我的艺术努力（为安珠化的妆）最终付之东流。安珠在婚礼上哭了一整夜，睫毛膏弄花了她的脸。曼格拉夫妇后悔迫使安珠嫁给了一个她不喜欢的男孩。很久以后，我在村里碰到了痛苦的曼格拉。他收到了安珠的一封信。她现在和公婆一起住在 30 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里。曼格拉向我吐露，安珠在新家很不开心，她想回到森林军队。

加入了纳萨尔派的青年男女们——比如科利和安珠——常常代表一种青少年的逆反。科利向我暗示：这种现象在当地有更长的历史。这种逆反很难抵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种离家出走的阿迪瓦西青年们——其中一些到印度正在发展的大城市边缘的砖窑里连续搬六个月的砖头，另一些则与游击队一起生活。

几年前，在 2002 年的春天，我跟随几个来自贾坎德邦另一个村庄（我之前在这里住过）的阿迪瓦西人朋友，我们乘坐过夜火车去往加尔各达外围的胡格利河（River Hooghly）河岸，来到那里几千座砖厂中的一座。就在无边无尽泥泞灰色所包裹的河岸上，阿迪瓦西人做着当地的孟加拉人认为下贱的一切工作。他们累死累活地把砖头搬进、搬出砖厂。男人们肩扛着被两侧沉重的砖块压弯的长木棍。女人们则把木板顶在头上维持平衡，在木板上放着两堆砖块，每堆八块。一列又一列的工人搬

着一块又一块砖头。他们没有注册，不受保护，也没有文件记录。崭新的印度正是在这群隐形的低种姓劳动者大军的脊背上建立的。

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和我的村民朋友们一道居住在惨淡的贫民区——砖厂老板管它叫“住所”。他们还得在这里住 24 天——这令我很是惊叹。相比于这里，村里的泥屋都像是皇宫。砖厂周围是彻夜通明的灯柱，就像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的军营探照灯一样，像是要吞噬村庄的黑暗。砖窑灯火通明，而边上的劳动者营地却毫无灯光。在贫民营里，我们在极小的房间里吃、喝、睡觉。屋顶是用贴了锌的锡做的，十分低矮，我们甚至不能在房间里直立。这种屋顶很吸热，所以在白天，房间里热得发闷，天花板非常烫手。六个人勉强能挤进一个房间，一个贴一个睡觉，夜里蚊子肆虐。500 个人靠 3 个水龙头喝水。这里毫无卫生设施，洗浴和排泄都在河岸边解决。

去砖厂工作的阿迪瓦西人几乎都总是被包工头和雇主欺骗，回家时只能挣到少得可怜的积蓄（如果他们至少还被发了薪水的话），这是他们辛勤工作的证明。虽然工作条件很可怕，这些青年们却认为自己到外边工作是一个可以暂时逃离村庄生活限制的空间。在这里，他们免于父母的管束，可以自由地按他们的幻想生活——可以有曾被禁止的恋爱关系，也可以有机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当然，外出当建筑工人和加入游击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正是这些区别让科利加入了纳萨尔派。虽然乍一看，和游击小队一起生活的愿景比在砖厂工作要危险得多，但是谁都知道建筑业是许多死亡和重伤的元凶。

情况确实是这样——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U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2005年的一份报告，印度工业部门每年有4万起死亡（据报道，这比每年因纳萨尔派的冲突而死的人数多60倍）。不仅如此，在游击队里人们有机会学习读书写字、习得医疗知识、使用新型技术——比如手机、电脑、枪械。而且虽说游击队没有工资，但也没有包工头忽悠他们。在安珠结婚那天，当她勒紧她的衬裙时，莉拉有感而发，简明地总结了呆在村里或出外打工与去游击队生活的区别：“姐姐，你难道没发现吗——那些呆在丛林政权里的人都长胖了！”

比起外出打工，也许在纳萨尔派军队中的生活确实对阿迪瓦西青年们来说更为舒适。然而触动了我的却是：加入纳萨尔派的机会——和每年外出到遥远的地方呆六个月的机会一样——已成了阿迪瓦西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跟许多游击队起义一样，纳萨尔派的目标是跟随被切·格瓦拉发扬光大的毛的理论：“游击队必须在人民中活动，就像鱼要在水里游一样”。但是，既然这一地区的阿迪瓦西人长久以来都与外人保持距离，纳萨尔派是如何和他们交上朋友的？为什么阿迪瓦西人开始把游击军对当作“家外之家”？

在我呆在拉尔冈的某一天，科利的父亲曼格拉找我聊了游击队即将到来的事。那是个十月的晚上，我走在树林边缘，离我在索玛尔家的住所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庭院熙熙攘攘。在主棚屋边上建了个房间，夕阳把新的泥墙照成了金棕色。房间前整齐地堆了一叠砖块。陶土是科利父母辛辛苦苦亲手塑出的，在被他们嵌进地里的烤箱里慢慢烘烤了三天，八个男人正在铺楼顶的砖头——楼顶是错综复杂的竹杆，砖块很容易就在竹杆上相互紧扣。这种自制砖块比任何工厂生产的都要好，在当地镇子里很受欢迎。和泥墙一样，自制的陶土砖块能让房子冬暖夏凉。而当雨落到砖块上时，它让房内到处响起舞蹈般的旋律。

索玛尔和她丈夫那天早晨起一直在那里帮忙造房间。每个人都是无偿劳动，因为他们知道科利父母同样也会为他们这样做的。这种阿迪瓦西家庭之间常见的劳动交换形式叫做“madaiti（帮助）”。阿迪瓦西人互相免费帮忙造房子、种地、收获庄稼，而这仅仅凭着需要之时同样互帮互助的善意。最终，被帮忙干活的那个人总是会开个派对表达他们对这种团结的感激。

在建筑作业行将结束时，我去帮索玛尔把娑罗树叶编织成派对用的盘子和杯子。我们用废弃树叶的叶脉当缝线。拉尔冈的阿迪瓦西人懂得利用周围大自然，他们造出了许多可生物降解的物品。他们的林中屋宅几乎没受消费主义世界的废品的影响。阿迪瓦西人的集市上几乎找不到聚乙烯袋子或者塑料瓶；他们的家里也几乎找不到塑料制成的的器皿或家具。

他们很关注他们的房子和周围环境。他们会用树叶、布篮和用自己的纱丽或腰布制成的小口袋裹好买来的东西。筛子、渔网、锅碗瓢盆、弓箭都是家里自制的，或是附近的工匠用当地材料制作的。人们也极难找到一个不是一尘不染的房子——不管主人多么贫穷。

科利的母亲给所有来帮忙造房子的人都备好了一顿简餐——米饭和菠菜汤。不过在辛勤劳动一天之后，所有人都更期待她前八天一直酿造的米酒，以及她前一晚蒸馏出的新酿紫荆酒。最后几块泥砖在屋顶上放好了，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笑声呼应着附近的手压水泵在水涌出时发出的铛铛的声音。人们洗去自己身上的泥土。很快，这愉快的人群围着院子坐下，一边放松一边喝酒。科利母亲端上了炸辣猪肉来搭配米酒和紫荆酒。有人开始敲“曼达尔”——一种当地的手鼓。很快，一些男男女女就手握着手开始围成圈跳舞。

派对在飞旋的歌声中渐入黑夜。曼格拉开始谈论游击队。他说，一开始的时候，身边我能看到的所有奥朗族的阿迪瓦西家庭都对游击队抱有对森林警卫和警察一样的怀疑，而对他们敬而远之。

虽然纳萨尔派所穿的制服与国家官员的略有不同，但他们的领导人也是高种姓、浅色皮肤和高个子。与其他外来者一样，纳萨尔派一开始似乎也在向阿迪瓦西人不信任的人示好：比方说村里市场上的中等种姓萨胡商人，阿迪瓦西人从他们那里购买煤油、油和香料。其中一些商人兼任承包商，控制着该地区的森林产品贸易。阿迪瓦西人为他们在森林中寻找用来制作印度比迪（bidi）香烟的黑木柿树（Kendu）叶子、制作叶

盘的莫哈兰 (mohallan) 叶子、制作油和肥皂的娑罗树 (sal) 种子，以及在市场上高价出售的松露和其他美味佳肴。这些商人给阿迪瓦西人的劳动提供了微薄的报酬，并在他们的塔塔 (Tata) 卡车上堆满了高价值的货物，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驶出森林，只留下一片尘埃。

然而，曼格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纳萨尔派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我问道：“怎么会呢？”曼格拉打开了他的手电筒，让我跟着他。

我们走过稻田，进入村子的中心。在离他的茶棚一箭之遥的地方，曼格拉指向一片废墟。一堆混凝土瓦砾在所有的泥土建筑中显得格外突出——我以前就注意过它。那是森林休息所——纳萨尔派炸毁了它，然后放火烧掉了停在外面的七辆卡车，这些卡车是承包商用来运走原木的。森林巡查员之前曾受到纳萨尔派的威胁，但在那次行动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曼格拉说，就在那时，他们第一次开始把纳萨尔派称为我们的丛林政权 (Jungle Sarkar) 。

曼格拉说，接下来的袭击是针对长期在森林地区游荡的犯罪分子。一名拦截卡车和公共吉普车，抢劫车上的人，然后消失在森林中的公路抢劫犯，在 40 公里外被抓获，但被带回拉尔冈接受死刑。三颗子弹射入他的头部，他的尸体被丢在过河处示众。

然后，曼格拉说，丛林政权处理掉了赢得国家招标、在该地区收集黑木柿树叶的承包商。采集黑木柿树叶是该地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在此之前，一直由来自农业平原的几个婆罗门家庭主导，他们控制着正规经济

和叶子的黑市。曼格拉说，丛林政权不仅用村里的人取代了这些骗子，而且还提高了采集树叶的工资。

乍一看，我认为这让纳萨尔派显得像是西西里黑手党。他们在当地显摆威力，铲除地头蛇并将其换成自己的人。

纳萨尔派似乎是一个收取保护费的组织，尽管他们以更令人满意的条件吸收了当地人——也许是用了比以前的地方组织更强的暴力威胁。

但曼格拉说，丛林政权还建立了学校和免费医疗营。他们在附近建造并资助了四所学校，尽管如果你去参观这些学校，你会认为它们是由一个私人团体，一个非政府组织管理的。他们还为加入游击队的年轻人提供学校。流动医疗营每年至少在当地村庄办三次——游击队从外边请来医生，免费提供药品。我后来在拉尔冈看到了其中一个正在运作的健康营。它吸引了来自附近所有村庄的数百人。这种地区没有医生或正常运作的医疗中心，而未注册的医生和巫医的费用可能使家庭陷入严重的债务。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对曼格拉这样的人来说，纳萨尔派比国家更努力地为他们服务。

然而，曼格拉还没给我解释完纳萨尔派的影响力。他说，最重要的是，那些你无法轻易衡量的不易察觉的小事——小事——才是关键。我问他是什么意思。

曼格拉首先讲述了他与帕拉斯吉的第一次见面。当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出现在他们的院子里时，曼格拉正在吃晚饭。每当大家认为有外人在村子里打探消息时，他通常会躲起来，让妻子说他不在家，他已经进了森林。但那天晚上，帕拉斯吉惊吓到了他们。他是在天黑后才来的——大多数外来者会确保在黄昏前离开森林地区——让他们措手不及。没有时间逃跑，所以曼格拉决定控制局势。

他让科利去借邻居的椅子，但帕拉斯吉坚持要坐在地板上的一个旧黄麻袋上，就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曼格拉说，他看起来很疲惫，好像一直在树林里打猎。帕拉斯吉非常尊敬地称呼科利的母亲为“恰奇”（chachi，阿姨），问她是否有剩余的食物。这个要求让她陷入了恐慌。那天晚上，由于家里完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她只做了一个可怜的玉米餐（ghatha）。他们从来不会把这给客人吃。

帕拉斯吉似乎感觉到了这个女人的慌张，并说只要一点点玉米餐就可以了。然而，他阻止她从村子里拿牛奶来就着玉米餐一起吃。当科利带着淡粉色的塑料椅子回来时，他们大吃一惊，帕拉斯吉温和地拒绝了，说他们不应该为他或任何其他纳萨尔派带椅子。

寒冬凛冽，而帕拉斯吉和他们一起在前厅睡觉过夜。他当时发了烧，于是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都给他盖上。黎明时分，曼格拉带来了当地的江湖郎中——这也是附近唯一一种医生——他快速查看了帕拉斯吉的情况，给他开了一些疟疾药，并建议他休息。几小时后，一支纳萨尔派小分队来到这里，将帕拉斯吉带走。

曼格拉说，几天后，帕拉斯吉回来了，感谢他们对他的照顾，并向他们报销了那个江湖郎中的费用。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在帕拉斯吉之后，这家人还遇到了吉安吉、阿肖克吉(Ashokji)、加内什吉(Ganeshji)、马德胡苏丹吉(Madhusudanji)和其他纳萨尔派。但曼格拉说，帕拉斯吉在他们家占有特殊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这些人理解为同胞，并开始对他们进行区分——有些纳萨尔派是“软”的，有些是“硬”的；有些容易失去耐心，有些则能调停矛盾；有些是散漫的，有些是完美主义者；有些精力充沛，有些是懒惰的懒汉。他们就各种决定向吉安吉寻求建议——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哪所学校，把女儿嫁给哪个家庭。他们嘲笑苏雷什吉乏味的演讲，说：“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但苏雷什吉的演讲是免费的”。尽管如此，无论是帕拉斯吉、苏雷什吉、吉安吉还是其他纳萨尔派领导人，“吉”都是当地人的尊称（令人惊奇的是，甚至当地警察也对叛军领导人使用这种尊称）——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对待纳萨尔派游击队的方式和对待其他高种姓外来者的方式有了很大不同。

安保和冲突专家对于人们究竟是因为被强迫、还是因为贪欲或者不满才加入如纳萨尔派的反抗行动上已经辩论了很久。在缺乏报道和研究的情况下，危地马拉之前的情况被恶毒地描述为“人民被夹在两支军队之间”。而在印度，这被称为“三明治理论”——人民在政府和毛派的激战间被夹成三明治。这些地区的一手资料渐渐涌现出来，得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人们参与到游击队中的过程。

正如关于越战的辩论让人们开始注意那些“理性”、计较代价和成本、只为了提高自己日后地位而参加革命的经济小农一样，其他人在他们近年的经济学层面的分析中也强调了贪欲在世界各场内战中的作用。印度的一些分析专家强调加入反抗军的功利好处：纳萨尔派是掠夺者，他们在经济上的掠夺和无差别的搜刮吸引了被焦虑驱使的年轻人和深陷贫困的部族。最鲜明地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地图上标出，毛派散布在矿产区，以证明这些松散的民兵联盟把那些矿藏都当成了摇钱树，而民兵中的当地指挥官加入组织仅仅是为了钱；反抗军出现在印度矿业发达的地方不是一个巧合，从这种财富中大捞一笔的可能性解释了他们的扩张。

另一些人则反对贪欲有这么大的作用，他们强调积怨和道德经济在促成人们参与起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着重关注普遍的贫穷、低识字率、有限的工作机遇、社会压迫和对人权的侵犯——这些才是导致人们反叛的原因。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们加入了游击队，因为起义解决了他们的不满。“不满论”中的一种极端论调把革命动员讲成了一种身份政治，这种观念在近几年聚焦于阿迪瓦西人，因为矿业发展，他们从自己的土地和森林中被驱逐。印度最后的原住民的自发起义便是这场大驱逐的结果。阿迪瓦西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只能举起武器，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和避免消亡而战斗。共产主义的政治就这样被“土著的”政治所取代。

很明显，纳萨尔派建立医疗营地和学校的努力，和动员人们争取土地权和森林权的尝试是让他们赢得人心的关键。但是在我住在拉尔冈的那段

时间里，我意识到不管他们的纲领和运动成功与否，纳萨尔派更深刻的吸引力源于将阿迪瓦西人当做同等的人类对待，给予他们尊重和尊严。

纳萨尔派赢得阿迪瓦西人的人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平等主义思想，它引导着纳萨尔派的人文关怀和与人交往时的微妙互动。纳萨尔派很注意话语传达给听众的方式，他们说话的语调和他们称呼别人时所用的敬语。他们重视如何进屋、是否把鞋子留在门外、到底是坐在地板上还是坐在高于其他人的椅子上。他们努力做到和村民一起吃饭，一起喝水，甚至从一个盘子里吃东西。他们和村民们以一种亲密的轻松态度互相开玩笑。就是这些“小事”，如曼格拉所说，得以让游击队赢得当地人的心灵和思想。

纳萨尔人发展亲密情感关系的能力基于他们平等主义的理想，这也是像科利这样的男孩对于加入游击队这一点毫无不适，而且信任像帕拉斯吉和吉安吉这样的领袖的原因。在军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入的这些人开始对纳萨尔派争取加薪、争取森林权、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的斗争燃起热情。有些人开始想要保存他们的部族语言，创造一种书面文字，正如纳萨尔派在查蒂斯加尔邦的贡德部落地区所鼓励的那样。一些阿迪瓦西人甚至开始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和思想开始感兴趣，开始讨论反对印度政府的革命战争必要性，也开始放眼到全球层面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军。在吸引阿迪瓦西加入军队这点上，反抗军的人文关怀也许比他们解决的积怨还要吸引人心。

平等主义的价值观让他们把别人也当做平等的人对待，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纳萨尔派被看作社会中“格格不入的人们”的避难所。有一个例子：苏雷什吉，一个纳萨尔派的地区书记。他是一位达利特母亲之子，而他父亲是一个来自更高种姓的、不明身份的男人。在他出生的平原村庄中，苏列什吉作为一名达利特、一个“杂种”，不仅被排挤，还患了麻风病——这个疾病在印度被高度污名化。他有着历史学的大学本科学位，并且为非政府组织工作，但直到他加入纳萨尔派之后，才感觉到自己被有尊严地对待着。

吉特什 (Jitesh) 是另一例“格格不入者”：他是一名奥朗人，从十二岁起就作为仆人为一名“印度行政服务”的官员工作。一名学校教师给他这份工作：他要给那名官员做饭，而这官员则给他提供教育。他在德里和罗塔斯加尔邦已经伺候了这名官员六年。同时，他家里的兄弟在拉尔冈地区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邻居，而吉特什被认为是案件的同谋。他的兄弟加入了纳萨尔派的一个排来避免牢狱之灾。吉特什从罗特斯加尔回来后住进了他母亲所出生的村庄。在那里，他和另一个部落的女孩相爱了，在他们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他们就在结婚前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吉特什还需要养活一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他没有选择，只能带着他的新家庭回到拉尔冈地区。但无论到哪里，他都因为谋杀的控诉被追捕，他不堪其扰，也加入了纳萨尔派的一个排。他的父母非常忧虑：一个儿子加入纳萨尔派还好，但两个就太过了。如果他们同时失去了两个儿子该怎么办？虽然吉特什最终听了父母的话去了古吉拉特

邦做一名手工业者，但如果他担心监禁会让他无法回到普通的乡村生活的话，纳萨尔派仍然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随着更多的阿迪瓦西人和纳萨尔派共度时光，男男女女也在他们的军队中喜结连理，游击队俨然成为了当地亲族网络的一部分。对于吉安吉这样的高种姓的领导者来说，加入这场运动意味着和自己的过去和家庭决裂，而对于这场运动中作为普通士兵的阿迪瓦西年轻人来说，纳萨尔派代表着一种延续，而不是与他们之前生活的决裂，这是“家外之家”。印度政府努力描述称游击队恐吓与逼迫阿迪瓦西人加入他们，而阿迪瓦西人却能自由地出入游击队，就好像去叔叔阿姨家串门一样。

意识形态与政治经常被当做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或者是被当做仅仅与身居高位者有关，但它实际上被刻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对待彼此的行为方式和形成的人际关系中。这就是纳萨尔派的理念——他们优先发展的是平等主义的价值观——这促使他们每天致力于取代代表着印度社会的种姓和阶级，从而创造一个类似于他们所参与的爱迪瓦西社会。

他们想象着，并且致力于创造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他们成功建成了亲密的情感关系纽带，和维系着村庄和游击队的家庭一般的网络，这样，阿迪瓦西的年轻人就得以在纳萨尔派中间自由地进出，就好像另一个家一样。虽然这种纽带最终也会削弱反抗军的群众支持，但也正是这种军民一家式的纽带，使得游击队能像鱼在海中一般在人群中活动。

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阿迪瓦西小孩去和纳萨尔派一同生活，游击队的存在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曼格拉说，毕竟，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丛林政权”。

在赶走林业官员、警察、盗贼和承包商们，并且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学校和流动营地之后，纳萨尔派实行了再分配的政策。他们在池塘里放入鱼苗以发展本地渔业。人们一起用蚊帐捕鱼，村里制作了渔篮，大家一同分享收获。

尽管纳萨尔派并没有没收任何人的土地来“再分配”——他们说，在森林里大家都只是勉强糊口——但他们重新分配了 40 英亩的土地，这些地曾被国家征用为合作农场。国家农场——和其他的国家计划一样——从未起过作用，纳萨尔派把这些土地分成两份。一半的土地被均分成 50 份，分给了五十户附近的可合瓦尔（Kherwar）阿迪瓦西人，他们原来只有一小块地。另一半土地则被用来给游击队种大米。纳萨尔派也把国家建筑——比如那些曾属于林业官员的办公楼——当成住所分给房屋倒塌的贫穷家庭。

纳萨尔派还重新分配了从林中采摘紫荆花的权利。虽然有些居民在他们的土地上种了紫荆树，但这些树是属于印度国家林业局的，尽管这个部门赋予了该地区居民们使用紫荆树产品的权利。在四月，村民们会在树下睡觉，等着在黎明时开放的一小朵黄花。这些小花会被收集起来，干

燥之后蒸馏来做紫荆酒。在这些产品有需要的时候，许多家庭靠卖干花或者紫荆酒赚来的钱生活。一瓶紫荆酒售价为 12 卢比。我的阿迪瓦西姐妹，索玛尔，一周能做五瓶紫荆酒，赚来的钱够她买酱料、肥皂、煤油等物资，刚好够她一周的生活用度。紫荆树很珍贵，因为它不只可以用来酿酒，它的种子还可以用来榨油。然而，尽管村子里的人口在增加，但紫荆树的数量却没有。没有足够的树来满足村民们所需，于是纳萨尔派对森林中的紫荆树进行了一次统计，然后在和村民们的多次会晤中，重新划分了这些树的所属，以确保每家人都能平等地利用它们。

除了再分配以外，村里的任何重大争端，尤其是高种姓人和阿迪瓦西人之间的冲突，会很快在纳萨尔派设立的“人民法庭”里得到解决。邦法院，因为常要花费数年时间来解决争端、让家庭陷入债务泥潭并最终以受贿最多的人为受益人而臭名远扬，不管发生什么，村民们都不会考虑让它介入。纳萨尔派的人民法庭因快速伸张正义并且免费，在村民们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拉尔冈，我看到人民法庭解决了两兄弟之间因为在八棵紫荆树上采花的权利而爆发的冲突、决定是否谴责不同种性男女间的私奔，甚至还对是否分配土地让某人建房子而做出裁决。

曼格拉说，纳萨尔派还组织了其他的活动。在雨季，各个村庄会派出队伍参加足球锦标赛。在 2009 年，我亲眼见过一次。32 个队伍，各自代表各自的村庄参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住的房子后边的氛围和节日一样。竹子被竖起来做成球门，还从附近城里拉来了麦克风和发电机，在球场周围还有卖茶、煎蛋、鹰嘴豆和烟草的摊位。年轻人邀请我分发

奖品，我将一只 10 公斤重的山羊和一个 7000 卢比的银质盾牌交给了冠军队伍；第二名的队伍得到了一只 7 公斤重的山羊和一块 5000 卢比的铜牌；第三名的队伍得到了一只 5 公斤重的山羊和一块 3000 卢比的铜牌。五盏煤气灯被授予最佳选手。我被告知这场足球赛总共花费了 150 万卢比。随后这一切都在运动场上的舞会上结束了。

在冬天，纳萨尔派组织了一个纪念阿迪瓦西反殖民主义反抗英雄的节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拉尔冈，直到深夜。2003 年第一次举行时，有 2 万人在拉尔冈聚集了 10 多天。来自兰契市和远在德里的客人被邀请——包括记者、人权活动家和一些政治家。发电机被运来了。舞蹈团、乐队和街头戏剧表演者从远方赶来，庆祝革命精神。一位著名的雕塑家从比哈尔邦的罗塔斯加尔被请来，为部落反抗者制作了一座 20 英尺高的纪念碑。村民们批评丛林政权从平原地区找来了一位艺术家，他为叛军领袖的腿做的雕塑就像平原地区的人一样。他们抱怨说，这些腿太胖了，看起来像得了象皮病。他们说，如果是阿迪瓦西艺术家，就会创造出更多像阿迪瓦西部落的反抗者。然而，尽管有这些小问题，节日的精神还是被人们深深地记住了，并且每年都会再举办，尽管规模较小，纪念馆还是在拉尔冈的风景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游击队在抗议和集会上花费了最多的精力。曼格拉说，白天的游行、火炬游行和路障；村民们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他们打着抗议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旗号，示威反对通货膨胀，鼓动根据《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提供就业，并纠集起来反对为穷人提供食品的公共分配系统中的腐

败。他们焚烧了总理曼莫汉·辛格、负责印度经济许多贸易和自由化改革的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蒙泰·辛格·阿鲁瓦利亚 (Montek Singh Ahluwalia) 以及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 (P. Chidambaram) 的肖像。曼格拉笑着回忆说，村民们为反映政客们对穷人的食物和资源贪得无厌而给这些肖像制作了夸张的大肚子。

在当地抗议之后，还举行了其他几次集会，将他们的不满升级到地区首府兰契市，甚至德里，作为纳萨尔派更广泛的公开群众组织的一部分，以抗议以国家发展的名义使阿迪瓦西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家园被水坝、钢铁厂和发电厂取代。

曼格拉说，“在纳萨尔派到来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部长’。我们不知道《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权领到低保卡，以获得补贴口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区，甚至没有冒险去兰契市，更不用说德里了。纳萨尔派教育我们国家应该给我们什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应该是什么”。

但纳萨尔派越是介入他们的生活，出现的问题就越多，曼格拉说。一些人感到被排除在节日和锦标赛的组织之外。有些人指责其他人没有参加集会。父母并不总是喜欢他们的孩子在加入游击队后变成的样子，他们担心会完全失去他们。一些人对人民法庭的判决感到不满。一些人因为

被指控是警察的告密者而在人民法庭受审，那些被判定有罪的人被枪杀，在人群中造成了恐慌。然后，国家安全部队和它们的暴力来到了山区。

国家安全部队开始以 500 人以上的兵力爬上山头，把当地的学校和废弃的初级保健中心作为军营。据称，他们毫无顾忌地对村民进行残酷的压迫，或强行带他们进入森林，把他们当作盾牌来保护他们免受纳萨尔派的攻击，同时也被强迫用来追踪游击队。

有一次，在我在拉尔冈逗留期间，游击队炸毁了保健中心，试图阻止安全部队占领该建筑。双方随后进行了公开交火。第二天早上，村民们付出了代价。妇女们讲述了安全部队如何拆掉她们的门，揪着她们的头发，并指控她们窝藏“恐怖分子”，一位妇女被吓得晕倒了。另一位妇女看着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被无情地殴打，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2009 年 4 月，在邻近的一个村庄，在人民院（Lok Sabha，印度的议会）选举时，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任意杀害了 5 名村民，声称他们是毛派。游击队炸死了两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他们是前往选举投票站的投票小组的成员，安全部队也进行了报复。拉尔冈的人们乘着卡车离开，举行集会抗议对村民的杀戮。

现在，每当安全部队爬上山头时，每个人都很害怕，害怕陷入与毛派的交火中。此外，他们说，游击队可以逃到树林里，但留在村里的人不得不面对警察的暴行。当国家军队来到村庄时，那些能逃的人就逃到其他

村庄的亲戚家中。其他人则考虑加入游击队。还有一些人想完全放弃这个地区。

参考

[^]萨胡尔节是印度东部贾坎德邦的一个地区性节日，在印度教柴德拉月的上弦月第三天，这通常意味着它在公历的3月或4月。在这个节日里，活动主要围绕着萨尔树展开，这种树是重要的木材来源并且树叶可以用来制作碗

[^]最初是印度教的已婚妇女用朱砂和玫瑰花瓣点在前额眉心的红色圆点，现在已成为印度民俗装饰品，大多购买现成的眉心贴

第三节：第三夜

虽然我们之中的一个战士已经病倒（译注：即第二夜发烧的比德奥），我倒觉得步子变得更轻快了。我明白我只能完全信任游击队。我的安危掌握在他们手中，我必须抛弃一切恐惧，专心掌握夜晚走路的技艺。

清亮的水声在黑暗中回响。很快，我们发现前面有一条小溪，看起来像个黑乎乎的沟。A 班组的一名士兵被派去站在溪流的一端，拿手电筒平稳地扫过整个溪流。我们一个接一个涉过了小溪。我曾了解到，单独的一道手电筒光亮在黑暗中并不会惹人注意，但二十九个开了又关的手电筒可能会让人引起警觉。

我们刚刚全部到达对岸，维卡斯就把我们聚在一起。他说前面有条高速公路。在如此夜深人静的时候，高速路不太可能有什么车通过，不过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按班组分开，以小组为单位穿过高速。我们需要注意在灌木后面躲好，也要避免被车前灯的光照到。

我们又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听到了像是浪花拍岸的声音。这声音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猛犸卡车”沿着高速飞驰的声音。我们躲在茂密的竹子后边看着它们驶过。它们以车队队形前进，相互间隔二十米，速度大概是每小时五十英里。在这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这么快有点危险。车的前灯打出的光束像是天线一般，照亮了前一辆车的尾部。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按喇叭。在印度，路上的车都按喇叭，即使前方没车可供他们按——这是人们对印度车辆的首要印象。

这些车在敞开的后车厢里装载煤炭。吉安吉小声地表示疑惑——他们正常来说应该会从高速主干路走，为什么现在跑到这条岔路上来？这些车就像无声执行任务的野兽，在夜幕中穿透这个国家。

就跟几小时前经过的安全部队营地一样，这些与世隔绝的载煤卡车就像在狩猎外星人。这些卡车就是几百年来劫掠阿迪瓦西人的森林、土地、水资源的“发展计划”的最新面目。那些鼓吹经济增长的讲师们曾保证：只要加速全国矿业发展，就能创造出600万工作岗位。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要和当地人分享利润，也从来不说要让当地人得到这些新岗位中最好的部分。

历史上，涌入的外来者拿走了贾坎德邦采矿业的利润。这包括比哈尔、孟加拉的高种姓中产阶级男男女女——他们近百年来在兰契、丹巴德、贾姆谢特普尔（Jamshedpur）等城市定居下来，占据了新住房、新学校，并在新建的精美的公园里散步。他们现在则属于“塔塔煤矿”或“中央煤矿”。比方说，阿迪瓦西人的萨奇（Sakchi）镇在贾姆谢特·塔塔

(Jamshed Tata, 译注：印度塔塔集团的创始人) 在此建立钢铁厂后，就改成了现在的贾姆谢特普尔——人们喜欢叫它“塔塔讷格尔”（译注：讷格尔 nagar 和普尔 pur 都是“城镇”之意）。塔塔集团之后成为了印度最大的跨国集团，现在也在英国经营钢铁厂。与此同时，住在原钢铁厂址上的阿迪瓦西人则在垃圾堆中搜寻熔铁时丢弃的废铁，以此勉强度日。

近来的矿业发展滋生出了铁丝网栅、安全警卫、矿业匪帮，以方便新移民赶走当地人。可能有那么一些当地人作为新移民所需的“合作者”可以跨越这条新的内部边界，但大部分阿迪瓦西人只能住在矿区、村镇和城市的边缘，在新建筑边上靠捡垃圾为生，陷入绝对贫困。既然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管理能力已经被剥夺，他们也只能（运气好的话）找到一份搬运煤炭或铁矿石的日结工作——正像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Sebastião Salgado) 的照片中那些银色嘴唇、灰黑脸庞的人们一样。然而，他们也很可能将被从这个区域彻底迁走、用暴力赶跑，这样采矿公司就能欢呼雀跃。他们在国内其他地区（比如奥里萨）已经欢呼过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削减了穷人的数量。



译注：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是巴西摄影师，擅长拍摄社会边缘人群的黑白人像和风景。如上是一张代表作《挖煤工》，摄制于印度丹巴德。本书第一章开头也曾提及此人。

然而，在那段时间，也有些限制条件阻碍了采矿公司的扩张。他们不容易获得土地。1800年代末阿迪瓦西人反对殖民政府夺走土地的起义，加上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干涉，最终导致颁布了对阿迪瓦西人的土地的特别保护。只有阿迪瓦西人可以购买阿迪瓦西人的土地。这种保护措施写入了宪法从而变得更加有力，而且又出台了其他法律——比如至少需要80%当地人的一致同意才能买到他们的土地。虽然各大跨国集团和政府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他们还是不容易获取土地。

人权活动家声称，这才是“绿色狩猎行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政府以“打击游击队”的名义，在富矿区到处建造军营，故意让当地人的生活变得残酷、难受，指控不愿遵从政府的当地人为毛主义者，这样政府就可以

迫使当地人迁走，或者直接逮捕或杀害他们。这是在慢性地清扫土地、慢性地清洗人民。

最后几辆卡车也疾驰而去。我们数了数，一共大概有五十辆。现在，一条光秃秃的沥青碎石路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往前就又是稻田。现在没有危险了。我们一个接一个跑了过去。我感到脚下的马路又冷又硬。

过了十点，我们终于到达可以吃晚饭的村庄的边缘。我们至少已经走了五小时。两个“跑步传令兵”被派到排前头，确保三十家人各留出一碟食物，这样所有战士都能吃上饭。我们又一次在村旁边的森林里集结、等待，同时也将决定出谁在哪家吃饭。

“现在你已经成了真正的游击队员了！战士的标志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睡着。”吉安吉的轻笑声让我醒了过来。看来，我确实已经掌握了“小睡”的技艺。我能抓住任何机会闭上眼睛、自然而然地进入深睡眠状态。

食物准备好了。我跟着吉安吉进了主村落中心的一间屋子。我对叫醒这所房子里已经睡下的居民感到很抱歉。

“红色的敬礼，”一个老妇打开了泥屋沉重的木门，并跟我们打招呼。她手里高举着一盏煤油灯。

她在地上摆了几个黄麻袋子，让我们坐在上面。她拿出了给我们留的装在铁盘里的食物。吉安吉对我们深夜来访非常抱歉，不过老妇说这并不

麻烦。她又拿来了一些装在不锈钢杯子里的水。我和吉安吉在屋子前厅坐着，而科利和吉安吉的保镖呆在外面望风。

我想知道吉安吉是否清楚科利为何加入纳萨尔派。我知道纳萨尔派喜欢讲的那个故事——他们在新德里的支持者也喜欢听这个故事（听众们对这个国家遥远的腹地中仍有左派在开展计划赞叹不已）。这个故事就是：阿迪瓦西人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武器保护自己，抵御跨国公司与印度政府勾结进行的采矿作业和开发项目对土地的掠夺。

“是的。”吉安吉叹了口气。他说，像科利这样的男孩很好。问题是，他们是如此可爱，如此天真。他说，阿迪瓦西人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只是随心所欲地来去，在他们的村庄和游击队之间来回穿梭。”吉安吉说，当他们离开的时间很短时，这并不值得担心，因为尽管纳萨尔派不允许，但这些男孩需要“解渴”。

我咬了咬牙。我不喜欢他的高种姓偏见——阿迪瓦西人的野性、荒蛮和原始的形象的另一面是他们的纯真、脆弱和轻信。尽管游击队的平等主义理想似乎在吸引阿迪瓦西人加入他们的运动方面赢得了一些成功，但即使是最敏感的领导人似乎也很难克服这些对印度部落根深蒂固的高种姓偏见。

我们对酒精的看法也不一致。纳萨尔派禁止在他们的游击队中饮用任何形式的酒。他们甚至反对在村庄里酿酒。这是我和吉安吉之间的一个痛点，我们曾经为这个问题争论过。我的观点是，阿迪瓦西人在拉尔冈等

村庄的酿酒和饮酒是他们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游击队不应该干涉。米酒(hadia)和紫荆酒(mahua wine)是神圣的，男人和女人一起平等地饮用。人们通常用米酒或紫荆酒欢迎客人。甚至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只有敌人才会只收到一杯酒，而朋友总是得到两杯或更多。

阿迪瓦西人的饮酒文化与大多数印度家庭的饮酒文化截然不同——在这些家庭中，男人很少公开承认他们饮酒，但事实上，他们花大价钱购买昂贵的印度产烈酒，如“皇家挑战”威士忌或“老和尚”朗姆酒。这些酒是在封闭的窗帘后面喝的，没有女人在场，而且往往喝得很快，饮酒者会感到内疚。我曾告诉吉安吉，他自己对饮酒的偏见是基于这种高种姓的男性饮酒文化，而这种阿迪瓦西人的习俗非常不同，应该得到重视。

我情不自禁说了以下的话：“我明白，在战争时期，当敌人在你跟前时，你不能有喝醉的士兵，但也许每隔一段时间，你应该在军队中酿酒——阿迪瓦西式的——用于特殊场合，让每个人都有一点乐趣。”我建议。

“你不能僵化阿迪瓦西人的思想。”吉安吉反驳道。他说，珍惜和保护他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改变。“无论你喜欢与否，他们的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被发展所湮没。”

我们的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对于一个如此热衷于建立一个平等主义世界的运动来说，他们道路的基础最终却似乎忽视了阿迪瓦西社区现存的丰富的平等主义文化。这是一个曾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问题。人们

还在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乡村公社(mir)——一种早期的土地公有制形式——的真正看法,以及是否可以从这种小农形式直接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还是说俄国必须经历与英国一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资本主义的传播。然而,此时此地,把革命的当前阶段和革命的乌托邦思想放在一起讨论不太合适。所以我并没有反驳。

他说,问题是年轻的阿迪瓦西人经常离开小队,不再回来。正是在那时,纳萨尔派认为他们在提供政治教育方面是失败的。他说,人们出身背景不同,但他们需要接受教育,认识到他们周围的暴力和不平等现象,并产生改变世界的愿望。他说,他们需要做好准备,不仅要应对他们周围的世界,还要应对他们看不到的体制和不公正现象。他们需要理解纳萨尔派为夺取权力所做的长期准备,并致力于此。但这正是我们经常失败的地方,吉安吉说。这也是他认为他们需要再次从大学和学院开始招募的原因之一。

吉安吉说:“如果只有延续性,而没有想象变革并为之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还不如都成蜜蜂算了。”

我们在外面冲洗了我们的盘子,回到房子前面休息,等待其他人吃完。从壶中为对方倒水的无声行为似乎稍稍冲淡了我们之间的紧张感。但我有满脑子的问题,我知道吉安吉不会喜欢听。也许,纳萨尔派为阿迪瓦西青年提供家外之家的能力不仅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弱点,也许这是游击队的“阿喀琉斯之踵”?

正在玩手机的吉安吉仿佛读懂了我的想法，感叹道：“我就知道！”。他给我看了手机，展示了一些照片。一个皮肤苍白的女人，留着长长的黑发，撅着嘴，穿着勉强遮住胸部的紧身黑色上衣，正盯着我们。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半裸的女人。然后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接吻。我无法弄清他们是否穿了衣服。这是软色情。

那是维卡斯(Vikas)的手机。“我从他那里拿的。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吉安吉说。就在这时，维卡斯走进门来，说大家都吃过了，我们应该离开。当他看到吉安吉拿着手机给他看时，他退了一步。“这都是什么？”吉安吉暴跳如雷。维卡斯怯生生地看着地面。他说，一个当地承包商给了他手机，存储卡已经在里面了。

纳萨尔派认为色情制品是封建帝国主义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以性为武器，转移年轻人对社会问题和斗争的注意力。吉安吉在意的似乎不是软色情本身，而是这意味着维卡斯一定受到了游击队外“那种人”的圈子的影响。

但在吉安吉进一步质问维卡斯之前，吉安吉的保镖带着科利走了进来。我看了看他们所有人。如果科利在游击队呆得够久，他会怎么样呢？维卡斯曾经也像科利一样吗？还是科利会变成另一个吉安吉？

第五部分：维卡斯：缝合的人生

第一节：第四夜

“他妈的，把那些恐怖分子交出来！”北印男人刺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们正在敲打着我们居所的厚重柚木门。“交出那些极端分子！不然就烧了你的房子！”直升机桨叶划破空气的声音越发震耳，盖过了喊声。

我猛然惊醒，看到银灰色的夜空布满星辰，仿佛触手可及，一片平静，审视着我。我缓了好一会才想起来我在哪，我又做噩梦了。我需要索玛尔。在拉尔冈的家里时，她会帮我平静下来，帮我摆脱那些干扰我睡眠的幻觉。她会调制一剂丛林中的药物来帮我入睡，并在我枕头下放一根铅条、一块姜黄和一段粘土屋瓦，向我保证它们能驱除嘲弄我的恶灵。我尝试继续入睡。

尖利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令人恼火。是一只蚊子在扇动它的翅膀，他们说蚊子一秒能扇动 800 次翅膀。携带疟原虫的雌性按蚊在印度造成的伤亡也许要比纳萨尔派和安全部队交火造成的伤亡还要多。每年疟疾都会造成一千例死亡，还有两百万例感染。作为地球上最致命的生物，蚊子实际上才是印度内部最大的威胁，但我从未见过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消除疟疾计划的迹象。

在拉尔冈我睡在蚊帐里，我鼓励索玛尔也这么做。她觉得我的睡前仪式非常有趣，这种仪式包括用手电筒的光线穿过网子，深入到每个角落，试图找到那只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打算让我彻夜难眠的蚊子。我在发现那只虫子时的深深满足感很快就会被试图杀死它的狂热所取代。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掌拍打和夹住它，但也可以尝试在它停在网子上时捏住

或挤压它。我那张白色的网很快就出现了红色和黑色的斑点，我成功地瞄准并压死了几只。

不间断的嗡嗡声在我的脑海里钻来钻去。这甚至不是季风、也不是繁殖季节，当这些寄生虫试图寻找它们的灵魂伴侣时，它们协奏的嗡嗡声会充满整个夜晚。事实上，我不确定附近是否真的有一只蚊子，或者是我越来越多的偏执让我想象出这恶毒的嗡嗡声。我想起我忘了吃每周一次的甲氟喹药片，于是把手伸进我的包里。

我为了在伦敦北部的旅行诊所开出这种药费了很大劲。在他们的免疫地图上，印度是间日疟的发源地，虽然它导致疟疾复发，但其毒性和致命性不如恶性疟，可以用氯喹和帕鲁德林的混合物来治疗。然而，1999年至2002年期间，我曾在这些地区生活过，我知道我需要甲氟喹；它对预防恶性疟至关重要。2001年的一个雨夜，我在被子里醒来，无法控制地发抖。我起身去拿一些暖和的衣服，但是我的头在旋转，我的腿在发抖，一片闪亮的星海迅速吞没了我。我沿着地板爬到电话旁，绝望地打电话给一个当医生的朋友，他直接把我送到医院。当地人称它为“脑热”。这是恶性疟原虫病，如果不立即治疗，它可以在杀死你之前将你的大脑变成果冻。因此，在我返回贾坎德邦之前，我坚持要求在伊斯灵顿为我看病的护士为我开甲氟喹^[1]。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美国陆军在1970年代开发了甲氟喹，以保护他们在遥远地方的部队，但它因诱发精神病而臭名昭著：抑郁症、偏执和幻觉。它被称为“药片中的恐怖电影”，据称对国防部队中大量的自杀事

件负有责任。它甚至一度被怀疑是一些士兵杀死他们的妻子，然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军队设施中自杀的原因。也许更多的美国和英国士兵成为这种药物的副作用的受害者，而不是他们正在与之战斗的部队的受害者。

但是我还是拒绝相信我经常做噩梦，我拒绝认为梦到自己跑过贾坎德邦的村庄时被印度空军的直升机追赶就是服用甲氟喹一年多的后果。我一直都有异常生动的梦。

一想到它的苦味，我就不寒而栗，我把白色的大药丸从包装里推了出来，用水壶武装自己。这个诀窍是喝一大口水，让药片整个浮在喉咙里，不要让它碰到口腔的任何部分。但药丸是巨大的。被安全部队杀死，被脑热杀死，被甲氟喹杀死？这些选择似乎都很暗淡。

我感觉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一下。是科利试图叫醒我。他说现在是凌晨 3 点，我们需要赶快行动起来。这次休息几乎没有超过四个小时。当我揉着眼睛坐起来时，可以看到其他人卷起垫子和叠好毯子的身影。几分钟之内就排起了三条平行的游击队队伍。我收拾好睡袋，加入了 B 班组，准备点名。很快，我们又开始行军了。

由于缺乏睡眠，我感到很累。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很快就有结束的一天，但对像科利这样的年轻人而言，不断迁移的无情军旅生涯也许在等着他。我在拉尔冈遇到的几位年长的阿迪瓦西人（三十多岁）告诉我，他们年

轻时曾参加过游击队，但从林政权游牧式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最终放弃了，在村子里安顿下来，过着平淡的日子。

我遇到的所有高级领导人都有一些长期的健康或别的什么问题。吉安吉患有严重的胃炎，脚踝很不好。帕拉斯吉有脊椎炎。另一位被试验爆炸击中额头的人，双眼逐渐失去视力。其他人则患有慢性背痛、膝关节病和糖尿病。

因为行军生活这样艰苦，就不奇怪为什么阿迪瓦西青年难以一直参加斗争。即便是已经在地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帕拉斯吉——他通常看起来很有毅力，对事业也很执着——有时都会想，是否在监狱里呆上一段时间会给他急需的离开革命的——他是这么说的——“假期”。

天空在黎明时分变成紫色，看起来好像我们又行进了一整天。但是现在是在“安全”地区，在纳萨尔派同情者的村庄中，所以很快就可以休息，恢复体力，在经过四天四夜的奔波后，我们可以进行第一次洗漱。

在一个山顶的树荫下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士兵向他的同伴保证，他很快就会像宝莱坞演员沙鲁克-汗那样给他理发的时候忍不住笑了。

科利把我护送进一个有生锈的手摇泵的院子里，鲜红的塑料桶边挂着一个蓝色的杯子，里面溢满了干净的水，放在那里显得很诱人。两个年轻的女孩在一扇漆成蓝色的木门后带着羞涩的好奇心看着我，窃窃私语，咯咯笑着。唯一的声音是在粘土屋檐下筑巢的鸽子的咕咕声。科利在院

子外面耐心地等待着，我把一壶又一壶的水倒在自己身上，蓝色的纱笼（一种围裙）横在胸前。

在闷热的天气里，我享受着水的清凉。它使人皮肤发痒，让疲惫的身体感觉到了活力。这种快乐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里得到。一桶水是不够的。手摇泵呻吟着，发出叮当声。我洗了游击队服，那是用完了第四桶水以后。终于得到了放松，神清气爽，我重新精神起来，和科里一起走向其他人那里，他们沐浴着阳光。

“油，姐妹？”维卡斯拿出了一个沉重的方形玻璃瓶。它看起来像一种昂贵的香水。标签上写着“巴贾（Bajaj）”——印度摩托车和自动车的制造商，现在正在生产下层社会眼中的“香奈尔”发油。“由真正的杏仁制成，厚实而芬芳，”他念叨着，用他扁平的鼻子去嗅，吸着香味。

“闻一闻，姐姐。这比你手上那瓶刺鼻的发动机芥末油要好得多。”

他显然为自己肌肉明显的手臂自豪，故意握紧拳头，弯曲他的二头肌。当它们从塑料纤维制成的闪亮的淡粉色无袖毛衣中露出来时，它们在闪着油光。当他的橄榄绿衬衫在太阳下晒干时，他穿上了这件被当地镇上的年轻人视为高级时装的花哨背心。静电使毛衣的纤维从衣服上炸开，就像一只通电的迷幻动物，使他看起来相当像一只展示彩虹色的羽毛的孔雀。

这种姿态让我想起了印度中下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大男子倾向。在认识他的几个月里，我既注意到维卡斯对他的后辈说话的粗暴方式，这

经常被看做教年轻男子做人，但也发现到他试图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柔和姿态，特别是对女性，他可能会对她们相当客气。

事实上，维卡斯在我们第一次在拉尔冈见面后就表现出了这种大男子主义，他曾粗暴地“审问”过我。几天后，我在纳萨尔派制造炸弹的奇怪“烹饪”课上再次见到他，看着他点燃导火索，然后跑到安全距离等待爆炸。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把围巾留在了爆炸点旁边，并沮丧地想，那时它可能已经是灰烬了。然而，维卡斯悄悄把它拿回来了，他在我面前为它的生还又唱又跳，伸出双臂刻意地鞠了一躬，然后捧出了那件折叠得完美无缺的白色衣物。这也许是想弥补“审讯”的伤害，但当时那给我的印象就是对前来救援的宝莱坞英雄的可怜模仿。

维卡斯拿出来杏仁油罐子，我眼前出现了那种非常有男人味的超级英雄形象。我有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提供的杏仁油，我明白，干部的日用品仅仅会被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卫宝牌 (Lifebuoy) 肥皂，高露洁牌 (Colgate) 牙膏，引擎牌 (Engine) 芥子油。就像他手机里的软色情片，和到达行军第一站的时候试图给我点咖喱鸡肉作为奖励那样，那只是一种被夸大的言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他的姿态和风度仍然彰显着他和附近地区那些高种姓的年轻人们的相似性，因此，他和纳萨尔派试图创造的理想中的革命家形象不一样，不过他或许也的确和他来自的阿迪瓦西社群中的人们不一样。

我走向草垫，吉安吉正在那里缝补他套头衫上的洞。他用着一台又小又破的黑色晶体管收音机非常热心地听着 BBC 环球广播——他走到哪里

都带着那个收音机，吉安吉把它看得比自己的步枪还重要。他把扬声器贴在耳朵上，头歪向一边。吉安吉能够通过这些破裂的白噪音破译在纽约和伦敦发生的时事。这小小的机器不仅能将全世界的新闻带到游击队的根据地，更能比内部消息还快地将关于印度地区纳萨尔分子的重要信息提供给游击队，比如已经发生的对纳萨尔派的逮捕，伏击或攻击。游击队里总是有人会留心听新闻，并且上报值得注意的事件。从山上的有利位置往下看，我们能看到村民们正在安静地进行着日常劳作。有些男男女女正在田间干活，其他人在收集柴火，或者正在放牧母牛、水牛和山羊。在远处，至少有十几个人正在挖路，他们搬运着大石头，往地上铺着砂砾。一辆摩托车从建筑工地上疾驰而过，它的刺耳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份平静。它打着弯向我们开来，随后停在了山脚下。一个穿着黑牛仔裤黑皮衣，戴着红帽子的男人下了车，沿着小路走着。

他的城市现代感在他自信的步态中显露无疑，在这里的乡村背景下，他显得格格不入。他拿着一个白色的包裹，维卡斯被派去迎接他。我能看到他们两人走上半山腰，好像在互相开着玩笑，两人开怀大笑。吉安吉说他是负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条路的承包商。他从长裤口袋里拿出来一本看着像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并且让科利把它带给维卡斯，因为他没有小票了。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位承包商提供给毛主义者经费，而作为回报，维卡斯会给他一张小票证明他交了“税”。

当维卡斯回来的时候，他的上衣口袋已经被钱撑满了，手里拿着我之前看到的在承包商手里的那个小白盒子。金色的糖浆从那个白色包裹里漏

了出来。维卡斯解开了盒子上红色的线，打开了它——里面是至少三十个玫瑰奶球——一种用炸奶粉球做成的甜点，上裹着小豆蔻，玫瑰水和藏红花味道的糖浆。

维卡斯说他已经“测验过了”这些甜点。他说他让承包商自己吃了第一个奶球来保证它们没被下毒。不过，我注意到吉安吉没有碰这些甜点。当这个盒子传到我这里的时候，我也忍住了没有拿。

吉安吉把维卡斯叫到一旁，他们似乎有一段激烈的谈话。吉安吉看起来很生气。我没办法听到太多他讲的话，但是我能听出来这场争执是关于承包商和钱的。

在和维卡斯谈话之后，吉安吉看起来很沮丧，他走向自己的那张草垫上，拿起了针和线。维卡斯加入游击队的时候——大约是十年前——吉安吉说他就像科利。他很可爱，天真，又彬彬有礼。他来自像科利一样的阿迪瓦西家庭。他的家人是铁匠——洛赫拉斯人而不是奥朗人——他们的家也位于科利家人生活过的高原上。在小小的泥房子旁边，他的父亲有着一座用于冶炼的熔炉，来自森林的木材是它的燃料。

如果有人需要弯个锄头，或做个犁，或者需要任何工具都会找他。维卡斯的母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她采集水果、花朵和树叶到市场卖。他们全家一起酿长叶紫荆酒卖给路人维持生计。和科利一样，维卡斯也是由于和家人的争吵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的。他刚到游击队的时候很明显表现得前途无量。作为最优秀的战士之一，他很快在部队中晋升为一个排的

指挥官，而且加入了纳萨尔派运动的区级委员会。但是现在，吉安吉明显对他很失望。

吉安吉说，他几天前听说维卡斯拥有一辆博莱罗 (bolero) 吉普，并且最近举办了一场奢华的二婚婚礼，娶了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奥朗女性。维卡斯把波莱罗吉普和奥朗女人藏在兰契市，还为自己盖了一座双层的小楼，还不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知道，吉安吉说。“现在维卡斯能留在军队里的唯一原因，”吉安吉冷嘲热讽地说，“就是因为他会挣钱。”

那些加入游击队的人并不是为了薪水。“挣钱”意味着维卡斯通过纳萨尔派的活动而以某种方式中饱私囊。他暗中把共同斗争所需要的资源转移出来，将财富积累起来供私人使用。

参考

[^]甲氟喹对各类疟原虫包括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原虫均有效，可杀灭红细胞内期滋养体，控制症状发作，但生效较慢。--引自百度百科

第二节：加速与国家和资本的接触

游击队的赚钱生意经——从普遍的需求中寻找财源投入到个人需求——产生于运动产生资金的过程。除了战士们的日常饮食，军服和医疗需求，纳萨尔派还需要资金用于为被囚禁的同志进行法律斗争，政治集会，医疗帐篷，乡村农业活动，以及购买和制造武器。游击队既没有毒

品贸易，也没有富裕的海外支持者，而且所有活动都被官方冠上“恐怖分子”的名头而遭到禁止，因此，游击队需要依赖他们根据地已经存在的黑市获得资金。

特别是，游击队主要有三大资金来源：大型企业（比如矿业活动）；森林资源的非法经济活动（尤其是黑木柿叶的采集）；以及围绕国家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黑色经济（比如修路）。

我把纳萨尔派获取资金的方式称为“保护性勒索（译注：指从印度政府的国资项目中获得资金，并非是真的勒索）”。 “税收”是吉安吉的首选，他强调，这笔钱无论如何都是非法的，因为这是已经通过腐败性勒索而流通的，或是剥削穷人劳动而积累起来的。他们为他们的行动辩解道，他们将这笔钱从富裕的资本家口袋里转移到为穷人而战的斗争中，从而通过将其用于公共利益来净化这笔钱。他补充道，尽管纳萨尔派将这笔来自富裕精英的钱作为“税”，但是纳萨尔派不会支持他们“反人民”的行为。

利用他们秘密游击队的武力威胁，纳萨尔派在他们想要控制的地区的黑市里，取代了先前的国家-承包商关系^[1]。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纳萨尔派解除了这一地区的武装，还因为这样一种印象被迅速传播开来：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拥有的隐藏资源和人员远远超过

这一地区。这种关于他们传奇力量的神话是基于他们的秘密性和偶尔的泄密，这造成了对他们的规模和范围的不确定：纳萨尔派可能无处不在。

在新扩张的地区内，有的人可能怀疑其他人参与其中，这就会给人留下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印象。后来，被怀疑的人也参与其中，这又会引起更进一步的怀疑，引起连锁反应，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因此，当地的精英们害怕不与纳萨尔派合作。这种害怕成为纳萨尔派为精英们提供保护以进入当地黑市资源的非正规经济的基础，这包括了保护他们免受纳萨尔派自己作为当地最强大力量的反叛活动的影响。

随着干部在地下党内的级别不断升高，他们就会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去从承包商那里收集资金，记账，和重新分配资金。中层领导——例如维卡斯这样的排长，以及在地区委员会和邦级委员会的人——都对财政负责。他们必须与村里的精英们协调，来决定哪个村民成为某一特定计划的承包商，约定所选承包商实施项目的级别；确保承包商仅从建造过程之中取得与纳萨尔派商量的金额；他们还必须从建造过程中为游击队取得预先确定的资金。

收“税”过程中的复杂计算以及谈判意味着部分资金会在这一过程中“丢失”而不是在运动中重新分配。承包商们总有借口说，成本高于预期，因为有的邦级官员要求的贿赂金额多于“平均”的份额，或者为了得到重要信息需要向某人给予一份“礼物”

对于矿产而言，绝大多数矿井都在游击队的根据地之外，纳萨尔派领导人无法触及，因此负责筹集资金的下级指挥官完全可能索取比他和领导人约定的更多的资金并把盈余据为己有。由于面对印度政府追捕行动的保密需要，在各种情况下，上级领导人很难核实其下属的所得。这些情形的结果意味着，总存在着把筹集来的资金供个人使用的危险和诱惑——就像吉安吉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挣钱”。

从这些“收入”中获得资金的方式取决于它们的来源。对于大公司而言，例如采矿，纳萨尔派要求管理者缴纳“税收”以换取纳萨尔派不干涉他们。因此一方面纳萨尔派举行集会反对进行采矿的跨国公司，组建范围广泛的非暴力的群众组织，示威反对这种商业活动造成的流离失所，动员工人在矿山和工厂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有时甚至还烧毁从矿井运出矿的卡车；另一方面，纳萨尔派并没有完全破坏采矿活动。

例如，最容易的爆破目标——一条 267 公里长的运输铁矿石泥浆的埃萨（Essar）管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这条管道直直穿过恰蒂斯加尔邦巴士塔（Bastar）森林中的游击队核心根据地。它从每年加工 800 万吨铁矿石的巴拉迪拉（Bailadila）山出发，将矿浆运到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维萨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港口，在那里做成钢锭，然后运到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埃萨钢厂。

2010年，维基解密发布了一份由美国驻孟买领事馆发送的外交电报^[2]，这封电报引述了埃萨钢厂的一名代表的话，他声称公司向恰蒂斯加尔邦的地下游击队支付了大笔资金，以保护埃萨工厂。这使得毛派和矿业公司的默契共存成为全球头条。尽管埃萨集团（印度综合企业集团，总部位于孟买，在全球投资能源、金属与采矿等业务）和该地区的毛派发言人都对这些指控提出质疑，但警方逮捕了一名信印度教的承包商和一名阿迪瓦西自由记者并指控他们充当埃萨公司和游击队之间的信使。

据称，该承包商被发现携带了1500万卢比，他将通过阿迪瓦西记者将这些资金从埃萨公司运送到纳萨尔派。此外，还有两名高种姓男子在管理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在该地区开展埃萨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活动。这些CSR代表据称是埃萨公司和毛派之间的调解人^[3]。

在未来发展的大局中，吉安吉曾表示，他们并不反对采矿本身，因为这对任何社会的进步都至关重要。

他们反对的是私营公司剥削劳动力，无情地攫取所有利润的方式。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在矿山工作的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劳动成果。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将是对采矿活动生态可持续的投入。

要进入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黑色经济，纳萨尔派必须通过谈判建立一个由政府官员、政客和承包商组成的复杂网络。无论是由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或英国国际开发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资助或设计——由印度政府修建的学校，医院，警察局，道路，桥梁，水坝和社区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一套“抽成（Percentage Cuts）”制度的制约，这些“佣金”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及其政商关系挂钩^[4]。

这些“抽成”是只要在印度做事，就会被索取的贿赂的一部分——比如“速度钱”，“柴盘（chai-pani, [字面意思是“茶水钱”]）”。但它们也包括从用于建设的资金中扣除的一定比例的资金——当地称之为“pc”或“抽成”。这是由一套当地商定的不成文的规则预先确定的，这些规则规定在建设过程的每个阶段谁可以获得多少份额的“抽成”。

不仅实施建筑工程的政府官员希望获得一定比例的资金，承包商也将在施工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视为自己的权利——事实上，这是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承包商通常还需要为使他中标的当地政客提供一份“抽成”。因此，一旦承包商获得了这项工程，就企图通过使用劣质材料、只挖到规定的地基深度的一半、支付少于正式记录的劳动工资，来抽走至少 10%的建筑工程款^[5]。

当纳萨尔派进入一个地区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谈判进入这些由承包商和政客们组成的网络，并要求自己也参与分享非法资金。像维卡斯这样的游击队战士会在半夜被派到承包商和政客的家中，用枪来威胁当地的大人物，把他们参与黑色经济捞到的一部分利润给纳萨尔派。由于手无寸铁，又害怕他们地区的新秘密军队，这些大亨们很难拒绝前来拜访他们的纳萨尔派的行动条款和条件。

通过以这种方式闯入当地黑市，纳萨尔派不仅获得了资金，还改变了行动条款。纳萨尔派介绍了他们自己的规则，关于如何提取资金，提取多少资金以及谁应该对此负责。他们还制定了关于如何分配战利品的规定——多少比例的钱应该花在乡村诊所、军队教育、援救政治犯的法律费用和武器上。

在拉尔冈，每个人都知道规则，那些被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项目不应该被触碰；分配给建筑设施的预算将全部用于建筑设施。这包括建造学校，医疗中心和所有小型项目，包括建造学校，医疗中心和诸如水井和手动泵等所有小型项目。但是其他的项目——如修建道路或桥梁——是游击队的主要资金来源。

对于纳萨尔派来说重要的是，为了限制印度安全部队进入游击队根据地，道路和桥梁的建设项目从未完成。地形上点缀着不完整的桥梁，在季风期间，这些地区与平原之间将被巨大、快速移动的河流完全隔绝，令安

全部队不敢穿越。年复一年，尽管道路上会被铺上一层新的泥土和石屑，但纳萨尔派会阻止铺上柏油马路，以便于埋下地雷，在安全部队的车辆经过时，能够在安全距离外手动引爆。事实上，村民说，当柏油路走到了尽头，进入泥路时，你就知道自己在丛林政权的领土上了。

在森林产品的黑市——纳萨尔派的第三个资金来源——收集黑木柿树叶（kendu，一种经济作物，树叶可用于制作印度比迪香烟）是最有利可图的。黑木柿生长在政府“占有”的森林里，树皮上有黑色的褶皱，用作引火物时会像烟花一样发出噼啪声，有深绿色的宽叶子。在4月和5月期间，人们会采集这种大且柔软的叶子。政府对树叶收集进行招标，在这种官方经济活动中可以赚钱。然而，在老虎保护区的黑色经济活动中还能赚到更多。在这里，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规定禁止开采任何种类的森林资源。

在官方允许收集树叶的地区，一个地区的拍卖价格是根据前一年申报收集的树叶数量计算的。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承包商——多家企业，磨坊和工厂的老板，甚至是记者——都住在该地区的城市里，他们互相竞购采集树叶的指标。地区的官方拍卖总价高达一年40万卢比。但是，要收集的树叶总是远远超过政府拍卖限额的估计数量，因此承包商在每个地区的收入都会大大增加（因为采集树叶获得的利润高于政府收取的采集授权价格）。不仅总承包商获得了利润，他雇佣的一系列中介也得到

了利润——包括从采叶者那里购得树叶，烘干并装进麻袋的人，到将树叶运到最近城市的收集站的全地区收集者。

当毛派渗透到这个经济体时，他们又在几个环节上制定了自己的规则。一方面，他们将从森林中采集树叶的阿迪瓦西人和低种姓工人的工资翻倍，并要求承包商在工人寻找树叶的工作日里为他们提供爆米花和棕榈糖；另一方面，纳萨尔派由于通过承包商控制了树叶贸易，实际上也控制了价格和利润，这使得他们能获得一部分资金。

有一天，我陪着索玛尔来到拉尔冈的森林里采集树叶，我们大清早就出发了，登上高山，深入丛林，寻找还没被人采过的树，在天黑后很久才回家。

我们只采摘了最大最好的叶子，仔细地把它们整理成捆，一捆有 25 片朝向一边，另外 25 片朝向另一边。索玛尔和她的邻居用沙丽（译注：印度妇女的传统服饰）将成捆的树叶包裹起来，顶在头上；她们抬的货比她们自己都大。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她们说，由于纳萨尔派将树叶的价格提高了一倍，所以报酬相对较高。（每捆 50 片叶子卖 70 派士（0.007 英镑）。纳萨尔派将价格翻倍后，一对夫妻采摘树叶一天可以挣 1500 卢比——考虑到政府规定的体力劳动的日工资是 100 卢比（但很少达到），这是一笔不错的工资。）

在提高阿迪瓦西工人工资的同时，纳萨尔派对黑木柿经济的干预也使他们开发了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根据地的政府收购点，承包商每包叶子 70% 的利润会上缴给纳萨尔派。

在老虎保护区——一个官方禁止采摘树叶的辽阔保护区——收集树叶的风险要更高。需要很大的毅力才能了解到非法收集是如何运作的。2009 年 5 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夕阳下坐在一辆卡车的前排，驶入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去采集树叶。和在拉尔冈认识的一个叫拉菲克 (Rafiq) 的承包商的两个弟弟一起。

纳萨尔派领导人让拉菲克负责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收集黑木柿叶。他的 19 岁和 16 岁出头的弟弟们，经常帮助他和纳萨尔派领导人完成各种奇怪的任务，比如传递信息、开车载人、分配食物和补给。这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到处为毛派秘密跑腿，这让他们兴奋不已，也让他们在同龄人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现在他们正在帮拉菲克收集黑木柿叶。

在狭窄的林间小路上开车无疑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被刺破了一个轮胎、还从路上拖走了一颗拦路的大树，最后终于抵达了收集树叶的村庄。拉菲克的弟弟（19 岁）让阿迪瓦西工人把袋子装上卡车，并开始在每个袋子上用绿色油漆写下这个收集树叶的村庄的名字。帮他拿着油漆罐的我意识到，这不是我们所在的村庄，而是一个离老虎保护区很远的官方收购区村庄的名字。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些在老虎保护区非法收集的树

叶是“合法”的，因为一旦它们离开保护区，没有人会知道这些树叶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比起在官方区域收集的树叶，它们将获得更高的利润，因为收集它们不需要支付手续费。

每个人都默默地工作着，但越来越大的摩托轰鸣声打破了森林的宁静——是拉菲克。他来检查装货是否顺利进行。很快，他开始向工人们和他的弟弟们大声发出指示。拉菲克惊讶地发现我在那里，停止了喊叫。在开往下一个村庄——另一辆卡车正在那里装货——之前，他走过来递给我一片薄荷，以表示接受（我的加入）。

工人们工作得很快，但到最后一个麻袋从最后一个村庄的仓库被装上卡车时，已经天黑很久了。拉菲克的弟弟们和工人们深吸一口气，同时拉紧绳子，把袋子绑在车的两侧，汗水从他们的背上流淌下来。工人们怀着友爱的精神，重复唱着一首关于装货和系绳的歌。卡车堆得很高，但有些倾斜。我以为货会倒下来，但司机向我保证说，我们至少还可以多装 15 袋。我们开车回到我住的村庄。当我跳下卡车时，我表达了我的担心：时间很晚了，太阳已经落山了，他却还得蜿蜒曲折地驶出山丘，去到城里的仓库。他只是愉悦地笑了笑，说这些非法树叶的运输总在黑夜里进行。政府官员收了钱，允许他们深夜悄悄溜走。

在跟踪老虎保护区的这种非法树叶经济时，我意识到，收集树叶的一部分利润被分配给了像拉菲克兄弟这样管理树叶打包和收集的村民，其余的利润将汇总到游击队的金库。

在开发这些非法财源的过程中，纳萨尔派不仅不可避免地让维卡斯这样的干部参与到围绕矿山、开发项目和森林产品合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还让以前无法进入这些经济活动的村民们也参与了进来。因为，随着纳萨尔派改变了当地的勒索规则，他们也用自己挑选的村民取代了历史悠久的老牌承包商。

老牌承包商是现在住在城市里的印度教中等种姓和穆斯林男子。他们的祖先从 19 世纪起就被殖民地官员带到这些阿迪瓦西统治的地区。这些官员认为该地区的土著太“野蛮”了，除了砍树和搬运木材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因此需要这些更“优越”的种姓和阶级来安排木材和其他森林产品的开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保护政策禁止出于商业目的伐木时，这些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承包商有的继续靠伐木的非法经济谋生，有的从事非木材森林产品的小额贸易，有的以杂货商或放债人的身份开店。那些在当地经济中发展不错的人从森林中迁出，搬到了附近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更大的企业，但依然借助承包商的身份保持着对村庄内最有利可图的森林和开发资源的控制。

纳萨尔派到达后，用仍旧生活在村庄里更贫困的中等种姓和穆斯林，取代了这些住在城镇里的富有印度教和穆斯林精英承包商。通过这种将承包合同民主化（大众化）的方式，纳萨尔派还培植了很多村民——相比于老精英，他们更顺从也更支持纳萨尔派，毕竟他们是依靠游击队的照顾才获得了这些崭新的致富机会。

比如拉菲克，他 30 岁出头，和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和两个弟弟一起住在附近的小村庄里。作为该地区地位最高的穆斯林——普什图人（Pashtuns）（又称帕坦人，Pathans），他的家族自豪地将他们的历史追溯到 16 世纪舍尔沙·苏尔（Sher Shah Suri，阿富汗普什图族领袖、印度穆斯林复兴运动领袖，印度北部伊斯兰苏尔王朝的创建者，首都位于现在的比哈尔邦）统治下的帝王时代，那时他们的家族统治着比哈尔邦。拉菲克的曾祖父在森林贸易繁荣的英国时代来到拉尔冈的森林。他擅长制作和保存野生动物的兽皮，以处理虎皮、狮皮和豹皮的能力闻名于整个地区。然而，当拉菲克的父亲接手生意时，这片森林已经成为印度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而且无论如何，野生猫科动物已经变得很罕见了。这个家庭陷入了贫困。拉菲克的父亲只拥有他们房子所在的土地和一小块花园的地皮。他鼓励拉菲克和他的兄弟们各自学习不同的行业。拉菲克的大哥做家畜买卖生意——奶牛、水牛、阉牛和山羊——他在村庄里买，在城市里出售。二哥一年有九个月到奥里萨邦的建筑工地上做电工。拉菲克自己白天待在拉尔冈的茶馆里打牌赌博，输掉他仅有的

一点钱，晚上去当地的外国酒馆找两个单身女人，据说她们靠向闲汉出售性服务谋生。

作为将历史悠久的老牌承包商—政治家关系驱逐出该地区的过程的一部分，纳萨尔派领导人慢慢地和像拉菲克这样贫穷而被剥夺选举权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交上了朋友。起初，纳萨尔派让他们成为村干部，最终允许他们承包部分业务。尽管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成员以村干部身份毫不犹豫地支持纳萨尔派——为他们的事业提供必要的商品、传递信息、充当线人——但这些年轻人认为使用武器进行的劳动是低等的，只有可怜阿迪瓦西人和低种姓人才配当兵。他们从未考虑过加入游击队，尽管毛派领导人主要来自最高种姓。当我问拉菲克原因时，他回答说：“这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游击队的生活很艰苦。背上你所有的东西走几英里路，不知道你的下一顿饭会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你会睡在哪里——是在岩石上，在森林里，还是在蛇旁边。低种姓——哈里扬（Harijans，意为“上帝的孩子”，圣雄甘地用这个词称呼达利特人，意在强调其人性，但后来被认为带有贬损和冒犯的含义，现在其他种姓常用来称呼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游击队的生活是低种姓的生活。”

偶尔，当纳萨尔派找到一个受过适当教育、可以与城里的官员和商人联系并完成交易的阿迪瓦西青年时，他们会把承包合同的机会给这些阿迪瓦西人。举个例子，比尔萨（Birsa），一个来自拉尔冈的年轻奥朗（Oraon，

印度少数民族)人,身高5英尺8英寸(约1.72米),远高于他的亲属。他是拉尔冈为数不多受过教育的阿迪瓦西人之一,被送到兰契市上学。他通过了预科考试和中级考试,然后进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但没有完成学业。在兰契,他住在卡提克·奥朗·阿迪瓦西旅馆,那是阿迪瓦西青年政治的温床。在那里,他受各类团体的影响而变得激进——他们反对政府在离拉尔冈不远的地方修建大型水坝和陆军野战射击场,导致阿迪瓦西人流离失所的计划。其中一些团体与教会有关,另一些团体与贾坎德解放前线(Jharkhand Mukti Morcha/Jharkhand Liberation Front,简称JMM)有关,他们为贾坎德从比哈尔邦独立出来而斗争(贾坎德已于2000年从比哈尔邦分离出来独立建邦)。当他从城市旅馆回到拉尔冈的家中时,他被纳萨尔派领导人迷住了。他们用更激进的话语谈论着同样的斗争,并拿起武器,为这些事业献出了生命。所以,他去看了看他们的军队生活是怎样的。

比尔萨和纳萨尔派游击队一起生活了几天。他们遇到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因为距离太近,无法回避,班长帕拉斯吉要求手下向巡逻队开枪。在接下来的交火中,一名队员被打死。这一死亡深刻地影响了比尔萨,以至于他没有勇气继续留在游击队。于是他回家了。

比尔萨回到拉尔冈后,富有魅力的邦级领导人马德胡苏丹吉

(Madhusudanji)意识到他是少数受过教育的阿迪瓦西青年之一,请他帮助组织纳萨尔派集会,并动员村民前来参加。比尔萨便成为了纳萨

尔派运动的一名兼职村干部。作为担任这一角色为数不多的阿迪瓦西青年之一，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拉菲克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他学会了如何使用纳萨尔派在森林中安装的印刷机为他们的节日和集会制作小册子和传单。白天，他在树下画海报和横幅，耐心地帮助完美主义的分区秘书苏雷什吉——他对设计一丝不苟，和他一起完成的每项任务都变得冗长乏味。晚上，他在房子的墙上粉刷口号：“毛主义者万岁！”、“《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规定，提供 365 天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 100 天。”比尔萨和其他村干部们争相接近他们敬佩的马德胡苏丹吉。比尔萨还鼓励年轻男孩去做他曾经为纳萨尔派做过的事情——为游击队跑腿、传递叠紧的手写信息、搜寻补给，并充当观察警察巡逻队的瞭望员。

这些青年的工作没有报酬，但在需要的时候——比如家人出了健康问题——他们知道纳萨尔派会支付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就像他们为穷人所做的那样。最终，他们希望纳萨尔派能够回报他们的努力，允许他们分管一些业务，负责该地区的一些发展计划或项目——修建一条道路、一个无用的社区中心或收集黑木柿树叶——这将使他们能够赚到一笔可观的钱。

作为一名村干部，比尔萨的热情和辛勤工作得到了认可，并且——和拉菲克一样——纳萨尔派让他与另一名年轻人签订了收集黑木柿叶的承

包合同。后来，他们还给了他一份在拉尔冈建造初级医疗中心的承包合同。当我到达那里时，这座大楼已经空置不用了。

在获得第一份承包合同后不久，这些年轻人就换了服装。拉菲克把他的橡胶凉鞋换成了亮丽的白色耐克运动鞋，灰色羊毛披肩换成了仿黑色皮夹克。他在拉尔冈附近全是男性的酒馆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多。比尔萨买了一辆豹皮座椅的 TVS（印度第三大摩托车制造公司品牌）摩托车。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以至于他的纱笼（印度传统服饰）经常往上缩，最终换成了裤子和白色 T 恤。

纳萨尔派似乎对村干部的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看起来越来越像他们所取代的精英。纳萨尔派需要这些人现在提供的基层治理能力。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这些人可能成为村庄里最薄弱的一环——那些最有可能作为警方线人出卖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功利的，是基于他们通过参与纳萨尔派致富这一事实。

比尔萨的邻居抱怨比尔萨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假借丛林政权的名义敛财。她对我说：“这帮当上村干部的男孩子个个都从党和党的名头里挣了大钱。看看比尔萨吧，他在这里有辆摩托车，在兰契（Ranchi）市还有一辆车和路虎”。在她的评价中，比尔萨在他负责建设初级医疗中心

的任务后变了许多。他的职责要求他不滥用一分钱，而他实际上却只想把钱尽可能多地捞进自己的腰包。

“再瞧瞧拉菲克”，她接着说，“他从马德胡苏丹吉建立的合作社的长叶紫荆木生意账目上拿走了 25 万卢比”。拉菲克负责在三四月落花季节从村庄里以市场价（9 卢比一公斤）采购紫荆木的花，将其干燥并储存，然后在冬季以合理的价格卖给村民，平抑此时商贩们开出的 15-16 卢比每公斤的高价。据邻居们反映，因为男孩们根本不懂雨季干燥紫荆花的技术，这项计划遭遇了惨败。收购的花烂在了仓库里，而由于账目不完善，也没人知晓准确的收购量。这位经理是否真的在采购时贪污了纳萨尔派的经费也就随之成了一桩无头公案。虽然之后拉菲克被纳萨尔派的村委会停了职，但他仍设法保留了绝大部分的赃款，她这样质疑。

同时，在拉菲克和比尔萨为纳萨尔派工作几年后，警方进山搜查出了纳萨尔派村委会会议的报到册，并对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发起诉讼。而比尔萨、拉菲克和其他十六位的名姓赫然在列。警察那里关于他们的案件指控越积越多。只要这个区域发生任何爆炸和袭击，警察文件上就会立即记他们一笔。比尔萨身上也就这么堆了三起不利指控。

比尔萨说，他曾希望离开这一带，去古吉拉特当个工匠。但马德胡苏丹吉说服他完全转入地下工作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比尔萨加入了其中一个连队，但不久后便在临近地区的副警司爆炸案中被捕。他们在拘留所里

关了他九天，用酷刑折磨他，强迫他透露有关“恐怖分子”的消息。他们将他的大拇指反绑背后，在天花板上挂了整整半个小时。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他最终答应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然而，审问者的反应却是直接松开绳子，让他摔到桌子上，把鼻子和嘴唇磕得鲜血直流。他很庆幸警察没有使用更恶劣的刑讯手段。在他的一位同事的汇报中，警察在囚犯的底脚用刀开了个口子，然后使劲往里面攥。不过，他们也确实对他下了狠手。警察把他的腿掰开往两边拉，做出劈叉的姿势，直到拉伤他腹股沟的肌肉。

最后，他们把他扔进监狱。马德胡苏丹吉在他服刑期间支付了他的全部法律费用和家庭开销，最终他在第二年被释放。

在我抵达拉尔冈之前，23 位这样的年轻人被警察起诉，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不断逃亡以免被捕。而另一些人，如拉菲克，则在考虑“投降”，在监狱里呆一段时间然后保释出来。一些人则已经完成了他们戏称的“监狱朝圣之旅”。

只有那些足够富有的人才雇得起律师为他们辩护，“找”到证人并贿赂法官以快速保释出狱。我所知道的就有一位 11 岁女孩和纳萨尔派女指挥官一起被捕，但在监狱里关了三年才出来。没人知道她父母在哪里，而唯一——一个去给她探监，送去肥皂和衣服，并和她的律师会面的是纳萨

尔派领袖帕拉斯吉委任的代理人。如果没有帕拉斯吉对她的持续跟进支持，很有可能她就不得在监狱里度过她的整个青年时代了。

出狱后，比尔萨对纳萨尔派的怨气愈发严重，不想归队。他和纳萨尔派靠得越近，就会吃越多的苦头。他抱怨运动中平等信念背后的等级制度。他说，公开在城市群众组织里工作、组织集会的领袖从未站在一线演讲；而冲在一线被警察盯上的全是年轻人。他抱怨这些公开群众组织的许多领导都是老婆罗门，他们连自己家里的种姓制度都消灭不了；他们不允许比尔萨进入他们家房子的客厅，只因为他们遵行不可接触原则，觉得他有“污染”。可就算出于种姓角度，他也是阿迪瓦西，不是达利特呀。他们的女儿出嫁时，他们会举行传统的印度教婚礼仪式，甚至会支付嫁妆。一位这样的群众组织领袖甚至厚颜无耻到在组织反对采矿的游行同时靠中央煤田基金牟利过活。

他同时抱怨集会过于频繁，以至于人们很难抽时间保证生计。“纳萨尔派就好像一位强迫学生一天学完字母表的严师。”第一次参加集会时充满激情的新人很快失去了动力。而最终，他说，虽然会有一些吉安吉、帕拉斯吉、马德胡苏丹吉这样的佼佼者，但另一些纳萨尔派甚至不下命令就连自己的吃饭的盘子都不会自己洗。

虽然纳萨尔派保释了比尔萨，但比尔萨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受信任，并越来越被怀疑是警察的密探。就连他的家庭也抱怨他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所作所为实在是栽了个大跟头。比尔萨说他现在只能天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killing flies and watching the dance of death）”，“上不着天，下不着地（neither of the hills, nor of the houses）”，这些俚语我也从其他被靠边站的年轻人那里听到过，他们现在感觉自己既不属于纳萨尔派，又和普通村民有距离感。

比尔萨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逃亡中度过，他的妻子在每次警察进山时都得藏起来，所以他直接把她安置到了兰契城。他送女儿去了另一个镇的寄宿学校。他说纳萨尔派五个月给的2000卢比生计应急金根本不够用。他的两个孩子每月至少需要1200卢比才能接受教育。他的弟弟去了兰契打工以逃离警察的扫荡。比尔萨说，如果自己继续和纳萨尔派呆在一起，那么他能做的就只有造炸弹了。但他并不想做手工活，这有损斯文，而他已经为阿迪瓦西战斗了太久，对纳萨尔派也见识得够多了。为了谋生、也为了获取权力，比尔萨开始考虑和他的哥哥一起为某位议员做事，企盼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从中谋得一席之地。

为了获取资金支撑纳萨尔派的活动而进入黑市意味着需要同官商联盟既得利益者中的精英——层层关系网支撑下的富裕阶级和种姓进行密切的联系。这也意味着同他们界限分明的祖先相反，像比尔萨和维卡斯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学习如何在外来者的文化背景下同他们谈判。为了让

他们成功融入上流社会，他们必须进行各项活动以进入进行商业和政治交易的社交圈子。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理想信念的支撑，他们实在太容易内化接纳这些精英的资本主义和种姓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念，尝试将自己同普罗大众区别开，重现产生这些价值观的不平等社会和制度。这包括对个人财富积累的渴望，用财富多少评价人以及炫耀性消费的习惯，还有对妇女越来越家长式的态度。骑自行车、乘公共交通或走路都不愿意了，一出门就要摩托和马恒达越野车；纱笼和橡胶凉鞋换成了长裤衬衫运动鞋；渴望参与政党政治牟取财富和权力，背着妻儿老小偷偷喝外国好酒；贬低家庭里的女性成员，认为她们是活该呆在家里的第二性别——这清单可长着呢。

他们身上产生出来的这些价值观念与不平等与纳萨尔派试图从科利、维卡斯乃至比尔萨这些人身上培育的理想共产主义者人格完全相反。阿迪瓦西人习惯了艰苦的流浪生活。在历史上，他们的私有财产、财富积累和社会流动性的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平等主义观念比种姓制度割裂的平原要强得多。而加入一场为了更伟大革命事业牺牲所有个人利益的运动对他们而言只需要一些“政治教育”——也就是吉安吉所做的一——即可让他们决定将革命斗争置于其他事务之上。

但同这些上流种姓精英网络的接触——毕竟这是纳萨尔派给他们指派的工作——有可能改变维卡斯和比尔萨这样的阿迪瓦西青年，使他们疏远自己的草根出身，过分接近外来者和国家政权，成为大男子主义者和挺着大肚子颐指气使的家长。现在看起来，虽然纳萨尔派将承包商和代理人从老牌精英替换为不那么具有特权的村民，但这一进步变化产生了巨大的成本，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在战争的大环境下让新人打入黑市以为自己提供资金。纳萨尔派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从黑市经济中获利，却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些精英的价值观传播到了村民和他们的阶层中。

其他进行中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可能也对维卡斯、比尔萨乃至科利产生了相同的影响——比如获得了印度宪法为全国阿迪瓦西人保留的那8%的公务员职位，或者借机成为政治选举出的议员。同样、这一情况将使阿迪瓦西人的生活更易受国家政权影响，随之而来的将是财富积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种姓等级制度观念的影响和作为以上结果的阿迪瓦西社群内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现象。

事实上，在喀拉拉邦、古吉拉特邦、贾坎德乃至基督徒比例较高和更发达的地区，这一社会分层进程似乎正在顺利进行。贾坎德的阿迪瓦西政客中出现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腐败案。其中涉及阿迪瓦西出身的前首席部长马杜·科达（Madhu Koda）的案件尤为引人注目，他因参与煤炭骗局于2007年被判入狱三年。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将向资本主义过渡作为自身的必要条件上，存在无休止的争论。但纳萨尔派将自己视为一个群众意见第一的革命团体，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与资本主义鞭长莫及的相对平等的社群合作。所以，这一争取共产主义的运动也无意中十分讽刺地让国家更接近阿迪瓦西的生活，加速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种姓等级制度在他们中间的传播，从而破坏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纳萨尔派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无种姓、无阶级的社会，但它也加速了阶级分化，同时在阿迪瓦西人中培育了种姓的等级观念。

要培养一个出淤泥而不染、一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普拉桑特或吉安吉是个挑战。也许确实只有吉安吉这样的苦行僧才能抵抗社会流动、财富积累、权位和精英认同的诱惑。也许科利确实有这个潜力。

盛产放弃阿迪瓦西社会性的某些方面（如喝酒吃肉），与政治经济大潮背道而驰的圣人，长期以来一直是阿迪瓦西社会的一个特征，在历史上他们有时也聚拢了大批追随者。许多广为人知的反殖民运动，如 1914 年的塔纳·巴加特（Tana Bhagat）运动，20 世纪的比尔萨（Birsa）运动，1855-1856 年的桑塔尔·胡尔（Santhal Hul）运动都是由这样的阿迪瓦西人领导的。所有这些领袖，无论是比尔萨还是西杜（Sidhu）、

坎胡 (Kanhu) 都存在某种天启味道 (或者被描述为某种千禧年主义), 往往还是素食主义者和禁酒者, 并被认为获得了治疗绝症和施展奇迹的神力。他们是神圣的。但毛主义者能在科利这样的男孩中发掘出这样的人物吗?

如吉安吉所述, 当下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能力被战争的军事需要大大削弱了”。为了应对激烈的国家镇压,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军事打击和反击上, 放松了对士兵政治教育、干部道德品性和支持者政治立场的要求。他说, 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制定攻击计划, 军事训练和武器制造上, 而花在阅读、辩论和建立无暴力无阶级社会上的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

历史确实向我们表明, 在极端暴力和压迫的环境下, 以暴制暴可能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事实上, 当一个人在印度农村旅行, 目睹印度低种姓和部落遭受系统性歧视和暴力压迫时, 很难不认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是拿起武器来实现他们的诉求。然而在我看来, 危险在于这种反制暴力的暴力手段反过来成为终结一切的目的, 而社会集体化变革和其他更远的目标反过来退居次席, 靠边站了。

第三节：第五夜

“我们必须仔细看着维卡斯(Vikas)。”吉安吉(Gyanji)说。我问他有什么能做的。他说第一阶段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是降职。最后, 当然是将其开除出运动。

我还记得上一次这样的开除事件，以及我在引得吉安吉注意到此事时所扮演的小角色，尽管我是无意的。

一天晚上，我从附近的村庄回家时，发现吉安吉坐在一棵芒果树下，满树的鹁鸟（八哥）叽叽喳喳地叫着。我问他是否可以同他聊聊。我急切地想问问他关于邦级领导人马杜苏丹吉(Madhusudanji)的情况——他当时正在当地的一个镇子里坐牢。吉安吉和他关系很好，我想知道他对我刚刚听到的惊人消息的看法：马杜苏丹吉看起来正在监狱里准备作为候选人参加贾坎德邦的立法议会选举。

吉安吉沉默了一会，然后问我是在哪里听到的这样的瞎话。当我告诉他时，他指责我散布谣言。后来我意识到，他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我自辩道，我看到至少有 20 名村民在哈特(haat)登上一辆当地的吉普车，去监狱探望马杜苏丹吉，因为他曾要求他们协助自己进行选举工作。

马杜苏丹吉在离我们行军的地方不远处长大。他是一个在反封建斗争中被动员起来的达利特人，也是为数不多的能进入纳萨尔派高级领导层的达利特人之一。我没有见过他——他在我到达前一年被捕——但在拉尔冈，许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领导人。他被认为是一位公平公正的出色演说家。

那些去监狱探望马杜苏丹吉的人说，他们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他们相信，作为报答，他也会关照他们。他们在探访他之后，带着一份拉票任务的

清单回来，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纳萨尔派已经决定提名他作为他们的选举候选人的假设。

吉安吉和其他领导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核实发生了什么——马杜苏丹吉是否真的打算背叛这场运动的抵制选举政策。

马杜苏丹吉最终被开除出运动，游击队在当地报纸《印度新闻(Prabhat Khabar)》刊载了开除他的通知。当地村庄的房屋墙壁上都贴上了海报，告诉人们要抵制选举。当安全部队在选举期间占据保健中心和学校时，纳萨尔派炸毁了这些建筑物，以提醒他们运动对主流议会选举的反对立场。

马杜苏丹吉的叛逃对吉安吉来说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纳萨尔派干部在参加运动一段时间后，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在作为承包商积累了足够的金钱之后，这实际上是许多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社会向上流动的道路上迈出的下一步。成为一名政治家，就有可能积累更多的钱，特别是获得印度社会高层认可的权力和地位。吉安吉沮丧地说，马杜苏丹吉"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纯真，丧失了对革命的热情"。

在从最初的打击缓过劲儿来后，吉安吉进一步分析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说，马杜苏丹吉为纳萨尔派付出了很多，他非常坚定和热情。警察杀害了他的岳父，他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加入了纳萨尔派，被安全部队杀害。但是，吉安吉认为，在纳萨尔派队伍中升迁的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他

不包括在历史上生活更为自主的阿迪瓦西人) 往往有一种自卑感, 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在种姓等级制度中高人一等者的羞辱, 这种自卑情结很危险。吉安吉解释道, 他们想挽回他们所遭受的错误对待和所看到的不公正现象, 但结果是他们可能变得极端宗派主义。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社区争取正义, 但当斗争变得更加抽象时, 他们就更难做出这样的承诺即为每个人争取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吉安吉认为, 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常都未能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培养出领导人。领导权仍然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特权。

吉安吉说, 他曾经告诉马杜苏丹吉要读书——学习共产主义文学——这样他就能够超越为达利特人争取权利的斗争, 从而更广泛地思考我们的全球社会。但他没有读书, 吉安吉悲伤地说。吉安吉说, 这是他巨大的弱点, 也是他无法将自己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与他人一起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原因之一。吉安吉认为, 马杜苏丹吉本可以默默离开游击队, 但他的自尊心阻碍了他, 现在他准备摧毁纳萨尔派。

马杜苏丹吉曾是一位如此值得信任和尊敬的纳萨尔派高级领导人, 以至于他的行为给这场运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我记得吉安吉为此极度沮丧了几个月。派来消灭游击队的印度安全部队的渗透性增加是一回事, 但这种内部的背叛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在背后捅了游击队一刀。

维卡斯现在正躺在黄麻床上, 戴着深色太阳镜, 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了。吉安吉盯着他, 小声嘀咕道: “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

我不太明白。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在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 1818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杀死了他的亲友，他自己也为报仇付出了生命，常用来比喻“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 吉安吉重复道。他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创造的东西，”。他说，从一个美好的梦想和一群美好的人出发，他们正在生产出将要摧毁这场运动以及摧毁这群对共产主义社会怀有美好愿景的人。

脑海中萦绕着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形象，我很快就不得不回到思考行军的生存策略上来。考虑到下一餐的不确定性，要尽量多吃食物；要把运动鞋带系得足够松，以便在一次快速运动中穿上和脱下，但又要系得足够紧，以便在持续数小时的步行中支撑脚踝。又一个步行的夜晚；我们又要走 35 公里吗？

我们现在需要在我们排行军队列的后面的清扫兵来清除之前留下的足迹，因为这个地区还有一个自称为第三筹备委员会（Tritiya Prastuti Committee, TPC）的雇佣军团伙在活动。纳萨尔派最近在与第三筹备委员会的冲突中遭受了伤亡——他们说第三筹备委员会得到了警方的支持——游击队从比哈尔邦穿越到贾坎德邦变得越来越危险。

第三筹备委员会穿着类似印度军队的制服，建立了类似纳萨尔派的军事结构，并与纳萨尔派竞争，通过对该地区的煤矿开采和开发项目征税来获得自身资金。他们唯一宣称的目标是消灭毛派。

他们是巴拉特 (Bharat) 在八年前组建的。巴拉特曾因贪污和性骚扰妇女的指控而在纳萨尔派中被降职。纳萨尔派声称，由于无法面对降职带来的耻辱，他的反应是带着他的排里的一批最好的武器和几个年轻的纳萨尔派新兵（都是来自他所在村庄地区的亲属）离开了。这名男子声称，毛派由来自比哈尔邦的中间种姓亚达夫人 (Yadavs) 支配，达利特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空间。

在我进行博士田野研究的地区，再往南几百公里，另一个自称为印度人民解放阵线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of India, 缩写 PLFI) 的团伙也有所发展。在贾坎德邦至少有六个这样的团伙。MMMC、JPC、JLT——一连串首字母缩写词——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被开除出斗争的纳萨尔派，他们随后动员自己种姓的人民来反对游击队。他们也利用武力威胁，通过对其活动区域内的开发、森林产品和采矿活动征税来积累财富。其中一些团伙，如 TPC 和 PLFI，持续了几年，并一度成功增长到了数百名成员。但许多团伙在几个月内就失败了，或者他们的成员都被杀死了。

纳萨尔派声称这些团伙是受政府支持的。他们说，警方很少杀死或监禁这些团伙的成员。一些高级警官也承认，这些团伙不同于纳萨尔派——他们的斗争没有意识形态动机；他们纯粹是敲诈勒索，或者是“造币机”

^[1]。无论他们与政府有何确切联系，对纳萨尔派而言，在许多方面，像 TPC 这样的团伙比印度安全部队更危险。他们在其所经过的村庄中也有亲属关系，能够像游击队一样敏捷地穿越森林和山丘。

我们曾享受的沐浴、放松和休养的日子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回想起吉安吉关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以及维卡斯叛逃游击队的潜在可能的评论，我意识到像纳萨尔派这样的武装革命运动是多么容易产生这样的叛徒团伙。我对我们的排长也越发警惕了。

第三节：第五夜

“我们必须仔细看着维卡斯(Vikas)。”吉安吉(Gyanji)说。我问他有什么能做的。他说第一阶段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是降职。最后，当然是将其开除出运动。

我还记得上一次这样的开除事件，以及我在引得吉安吉注意到此事时所扮演的小角色，尽管我是无意的。

一天晚上，我从附近的村庄回家时，发现吉安吉坐在一棵芒果树下，满树的鹁鸟（八哥）叽叽喳喳地叫着。我问他是否可以同他聊聊。我急切地想问问他关于邦级领导人马杜苏丹吉(Madhusudanji)的情况——他当时正在当地的一个镇子里坐牢。吉安吉和他关系很好，我想知道他对我刚刚听到的惊人消息的看法：马杜苏丹吉看起来正在监狱里准备作为候选人参加贾坎德邦的立法议会选举。

吉安吉沉默了一会，然后问我是在哪里听到的这样的瞎话。当我告诉他时，他指责我散布谣言。后来我意识到，他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我自辩道，我看到至少有 20 名村民在哈特(haat)登上一辆当地的吉普车，去监狱探望马杜苏丹吉，因为他曾要求他们协助自己进行选举工作。

马杜苏丹吉在离我们行军的地方不远处长大。他是一个在反封建斗争中被动员起来的达利特人，也是为数不多的能进入纳萨尔派高级领导层的达利特人之一。我没有见过他——他在我到达前一年被捕——但在拉尔冈，许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领导人。他被认为是一位公平公正的出色演说家。

那些去监狱探望马杜苏丹吉的人说，他们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他们相信，作为报答，他也会关照他们。他们在探访他之后，带着一份拉票任务的清单回来，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纳萨尔派已经决定提名他作为他们的选举候选人的假设。

吉安吉和其他领导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核实发生了什么——马杜苏丹吉是否真的打算背叛这场运动的抵制选举政策。

马杜苏丹吉最终被开除出运动，游击队在当地报纸《印度新闻(Prabhat Khabar)》刊载了开除他的通知。当地村庄的房屋墙壁上都贴上了海报，告诉人们要抵制选举。当安全部队在选举期间占据保健中心和学校时，纳萨尔派炸毁了这些建筑物，以提醒他们运动对主流议会选举的反对立场。

马杜苏丹吉的叛逃对吉安吉来说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纳萨尔派干部在参加运动一段时间后，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在作为承包商积累了足够的金钱之后，这实际上是许多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社会向上流动的道路上迈出的下一步。成为一名政治家，就有可能积累更多的钱，特别是获得印度社会高层认可的权力和地位。吉安吉沮丧地说，马杜苏丹吉“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纯真，丧失了对革命的热情”。

在从最初的打击缓过劲儿来后，吉安吉进一步分析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说，马杜苏丹吉为纳萨尔派付出了很多，他非常坚定和热情。警察杀害了他的岳父，他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加入了纳萨尔派，被安全部队杀害。但是，吉安吉认为，在纳萨尔派队伍中升迁的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他不包括在历史上生活更为自主的阿迪瓦西人）往往有一种自卑感，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在种姓等级制度中高人一等者的羞辱，这种自卑情结很危险。吉安吉解释道，他们想挽回他们所遭受的错误对待和所看到的不公正现象，但结果是他们可能变得极端宗派主义。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社区争取正义，但当斗争变得更加抽象时，他们就更难做出这样的承诺即为每个人争取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吉安吉认为，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常都未能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培养出领导人。领导权仍然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特权。

吉安吉说，他曾经告诉马杜苏丹吉要读书——学习共产主义文学——这样他就能超越为达利特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从而更广泛地思考我们

的全球社会。但他没有读书，吉安吉悲伤地说。吉安吉说，这是他巨大的弱点，也是他无法将自己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与他人一起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原因之一。吉安吉认为，马杜苏丹吉本可以默默离开游击队，但他的自尊心阻碍了他，现在他准备摧毁纳萨尔派。

马杜苏丹吉曾是一位如此值得信任和尊敬的纳萨尔派高级领导人，以至于他的行为给这场运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我记得吉安吉为此极度沮丧了几个月。派来消灭游击队的印度安全部队的渗透性增加是一回事，但这种内部的背叛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在背后捅了游击队一刀。

维卡斯现在正躺在黄麻床上，戴着深色太阳镜，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了。吉安吉盯着他，小声嘀咕道：“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我不太明白。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在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 1818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杀死了他的亲友，他自己也为报仇付出了生命，常用来比喻“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吉安吉重复道。他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创造的东西，”。他说，从一个美好的梦想和一群美好的人出发，他们正在生产出将要摧毁这场运动以及摧毁这群对共产主义社会怀有美好愿景的人。

脑海中萦绕着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形象，我很快就不得不回到思考行军的生存策略上来。考虑到下一餐的不确定性，要尽量多吃食物；要把运

运动鞋带系得足够松，以便在一次快速运动中穿上和脱下，但又要系得足够紧，以便在持续数小时的步行中支撑脚踝。又一个步行的夜晚；我们又要走 35 公里吗？

我们现在需要在我们排行军队列的后面的清扫兵来清除之前留下的足迹，因为这个地区还有一个自称为第三筹备委员会（Tritiya Prastuti Committee, TPC）的雇佣军团伙在活动。纳萨尔派最近在与第三筹备委员会的冲突中遭受了伤亡——他们说第三筹备委员会得到了警方的支持——游击队从比哈尔邦穿越到贾坎德邦变得越来越危险。

第三筹备委员会穿着类似印度军队的制服，建立了类似纳萨尔派的军事结构，并与纳萨尔派竞争，通过对该地区的煤矿开采和开发项目征税来获得自身资金。他们唯一宣称的目标是消灭毛派。

他们是巴拉特（Bharat）在八年前组建的。巴拉特曾因贪污和性骚扰妇女的指控而在纳萨尔派中被降职。纳萨尔派声称，由于无法面对降职带来的耻辱，他的反应是带着他的排里的一批最好的武器和几个年轻的纳萨尔派新兵（都是来自他所在村庄地区的亲属）离开了。这名男子声称，毛派由来自比哈尔邦的中间种姓亚达夫人（Yadavs）支配，达利特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空间。

在我进行博士田野研究的地区，再往南几百公里，另一个自称为印度人民解放阵线（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of India，缩写 PLFI）的团伙也有所发展。在贾坎德邦至少有六个这样的团伙。MMMC、JPC、JLT

——一连串首字母缩写词——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被开除出斗争的纳萨尔派，他们随后动员自己种姓的人民来反对游击队。他们也利用武力威胁，通过对其活动区域内的开发、森林产品和采矿活动征税来积累财富。其中一些团伙，如 TPC 和 PLFI，持续了几年，并一度成功增长到了数百名成员。但许多团伙在几个月内就失败了，或者他们的成员都被杀死了。

纳萨尔派声称这些团伙是受政府支持的。他们说，警方很少杀死或监禁这些团伙的成员。一些高级警官也承认，这些团伙不同于纳萨尔派——他们的斗争没有意识形态动机；他们纯粹是敲诈勒索，或者是“造币机”^[1]。无论他们与政府有何确切联系，对纳萨尔派而言，在许多方面，像 TPC 这样的团伙比印度安全部队更危险。他们在其所经过的村庄中也有亲属关系，能够像游击队一样敏捷地穿越森林和山丘。

我们曾享受的沐浴、放松和休养的日子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回想起吉安吉关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以及维卡斯叛逃游击队的潜在可能的评论，我意识到像纳萨尔派这样的武装革命运动是多么容易产生这样的叛徒团伙。我对我们的排长也越发警惕了。

参考

^[1]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splinteringnaxalism-in-india-maoism-or-money/2/>

第六部分：索玛尔：摆脱父权制的枷锁

第一节：仍在第五夜

毛派从印度的另一个地区派来了军事能力高超的两个排作为特遣连，来消灭附近第三筹备委员会的部队。吉安吉知道这个连就在附近，他这一整天都在尝试联络他们。就在日落前，我们收到特遣连的消息，连指挥员要求我们爬上那座山顶有个学校的山。

他们大概有五十个人，排成一直线，背着包，肩挂着枪，正在学校门口脏兮兮的操场上等我们。在他们背后，太阳正在落下。风在林间呼啸。我们的到来惊动了一群大蝙蝠，它们在我们头上飞着，发出混杂地尖叫着。特遣队员们穿着橄榄绿军服一字排开，在橙粉色的天空映衬下就如我们拉长的映像一般，这让我感到十分梦幻。

当我们走近的时候，我看见特遣连的队员中有四位女士，她们的辫子长及肩膀。而我作为女性却打扮得像个男人，这让我感觉格格不入。我问吉安吉能不能花点时间和她们单独谈谈。

这几位女士是散塔尔人^[1]，这是个贾坎德邦最东部的阿迪瓦西社群，临近西孟加拉。她们之中最年轻的估计不超过十六岁。最年长者也仅仅是二十岁出头，吉安吉称赞她是个有天赋的战士，已经被任命为这个排的副指挥员。

我跟她们一道坐在地上。随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笑着、握着手。我赞叹她们无可指摘的笔挺腰背——正如我认识的所有原住民妇女。她们会在头上叠放一壶又一壶水，从井边运到家，从中练出了笔直的腰杆。看起来，她们也很高兴见到我。吉安吉向她们介绍说我是个搞广播节目的

同志，于是她们问我有没有学过最新的抵制矿业公司的歌曲——“它们吸干了国家的血液”。她们开始唱了起来，她们甜蜜的歌声唱出令人陶醉的旋律，最后以一个高音结尾——“要把红旗举得更高、更高！”随后，她们开始害羞地轻笑了起来。

排副指挥员很快严肃了起来，问我有没有卫生巾。她说，组织做出决定，要给女性发放卫生垫，而不是让她们像现在在森林中那样使用旧布片。然而，她们经过的所有市场都找不到卫生巾，而她们中的一位队员现在正急需卫生巾。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卫生巾会污染环境，而老办法虽然不方便，但是也许更环保。我们沉浸在关于月经期的亲密对话中，但我明白，想要尝试了解她们的私人故事，比如她们为什么参加这支军队，尽管我知道这是无用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会很短暂，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要让她们敞开心扉要花好几天。她们在任何情况下，一开始都只会重复自己版本的那个反复排练的通用故事——关于封建主义的经历，关于剥削，关于警察镇压。我需要和她们一起在村里生活，才能了解她们复杂故事的细节。

很快，我们的排又出发了。我们用纳萨尔派的传统方法和特遣连的所有人握了手——先握手，然后把拳头举向天空。女孩们起头，大家一起合唱：

“朋友，再见了，

朋友，要小心，

朋友，要聪明，

前方有仇敌！

我们会再见，

不仅是一次，会是许多次！”

我为这短暂而激烈的相遇感动，而后再不禁暗自发问：她们的未来路在何方？

我还有机会再遇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人吗？

凌晨两点，所有人都累了。我们已经连续走了五个小时。虽然我们所在的这块森林是第三筹备委员会地盘，但是我们确定这里足够安全，可以停下来吃点东西并休息几个小时。在这里，我们需要自己准备食物，因为进入村子并不安全。C 班组的一些年轻男人挖坑生火，开始烧米豆粥（khichdi）。这是一道简单但有营养的菜——大锅烧碎扁豆和大米。

吉安吉的保镖和科利一起在湿漉漉的河床沙地上挖了两个洞，相隔两米远。水慢慢从地底渗入洞里，形成了一个小水塘，很快水中便浮动月亮的倒影。一个水坑用来喝水烧饭，另一个用来洗东西。生火、找水源、洗盘子，加起来只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所有人就都吃饱了。

吉安吉在远离做饭区的地方划定了一片睡眠区，并安排了哨兵在附近站岗。然而排里出现了骚动：几个年轻男人在大声交谈。吉安吉前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科利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附近曾有个女士在分娩时死亡，她愤怒的恶灵就在我们头顶的苦楝树叶之中潜伏着，准备攻击路过的猎物。他说他曾见过有些男人被这种恶灵附身变得疯疯癫癫；在她的地盘下睡觉不是好主意。

吉安吉愤怒地回来了。他说我们必须换个地方。现在根本没办法让那个男人明白世界上没有恶灵。吉安吉曾经遇见过这种局面。

我倒是被逗乐了。森林里危险重重。在我拉尔冈的住所附近，我曾听说有老虎和豹子会偷吃牲畜。大象会踏平房屋。有个邻居死于毒蛇咬伤。但现在，在这帮雇佣军匪徒（译注：指第三筹备委员会）的领土上，这些游击队战士们却害怕异世界生物，害怕森林里可能附到他们身上的恶灵。

我们穿过河床，又走了十分钟。我们在地图上安排好了睡眠区，定下了哨兵岗和站岗轮次。最终，我们终于可以躺下睡觉了，虽然也只能睡几个小时而已。

吉安吉在说关于第三筹备委员会的梦话。他经常说梦话。但是我脑海里还浮现着那些我刚刚告别的特遣连的女战士们。我的脑子里有一大堆问题：她们对游击队里男人们对待她们的方式有何看法？她们想要孩子

吗？以及在这场又男性主导的，争取平等社会的运动中，作为一名女性是什么感觉？

我回想起西玛 (Seema) 同志，她是我认识的唯一毛派高层领导人，参与这场运动已经几十年了。我也回想起我们的行军开始时，我们在比哈尔邦安排睡眠区的场景。在那时，吉安吉提醒我：他们会比较“保守”，我将和新招募的女兵们睡在一个另外的帐篷里，而不是和与我同辈的男性领导人们睡在一起。西玛也曾多次被这样安排，对此，她曾对我表达过她的沮丧。她说：“我永远只能和女孩们呆在一起。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和她们呆在一起。问题是，在那些重大会议上最重要的决策，永远都是在男性的帐篷里、在闲聊调侃中、通常还是在晚上，做出的。”

如果我是西玛，那我的感受又会如何？就在这片雇佣军匪帮的领地里，我和男性睡在一起，明白自己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即便这些年有很多女性主义的读书会和讨论会，即便办了许多活动来动员女性，即便这场运动中有许多吉安吉这样的人，但毛派的领导人们经常还是复刻了他们要打垮的那套体系中的文化教条。我开始觉得非常孤独。这时，我想起了西玛曾说，关键在于要留在运动中，在内部对抗父权制，而不是放弃或者离开。这段话逐渐占据了我的思绪。

参考

[^] /Santhals, 印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境内的一个原始部族 (印地语汉语大词典 P1481)

第二节：性别，世代，阶级和种姓（上）

毛主义者重视干部的政治教育、卫生营地的建立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他们也认为解决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至关重要。“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们说。

我通过阅读他们的文件得知，经过数年的内部讨论，毛主义者开始认识到性别的重要性。就像不能简单地把“种姓”当成是“上层建筑”而将其忽视，而只去更加重视被称为“基础结构”或“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物质关系一样；性别关系也不能只是被留在文化、主观关系和私人领域。

光是提出这样的观点：“让我们先打仗，仗打完了再解决性别问题”是不够的。这只会为父权专制的男性主宰渴望平等的未来新社区铺平道路。性别平等应当在斗争的同时一起争取，在干部和同情者中培养社会关系以反映——至少在游击队的根据地里反映——他们理想的未来社区。

在对毛主义者们的描述中，携带武器的妇女的面孔占据了重要位置。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形象——记者们喜欢拍摄的形象——是一排妇女，她们的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腰部与脚成直角，步枪放在她们的右二头肌和肩膀之间，脸被枪托遮住，枪管瞄准某个假想的目标。

去年在拉尔冈，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场合，组成妇女解放协会 (Nari Mukti Sangh) ¹⁴ 的年轻女性想在我的相机前摆出类似的队形，只是想看看她们带枪的样子。她们从男人那里借来了步枪——其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如

何使用这些武器——在镜头前排好队，然后跑回来看我的数码屏幕上的图像如何。

“等等，姐姐！苏西拉不在队里！等等，姐姐，我笑得太厉害了，你不应该拍我的牙齿。姐姐，你能从这个角度拍吗？”

在这个邦的一些地区，毛主义者说他们 40%的干部是妇女。40%的数字似乎提供了某种性别可信度的印记，因为它在一些斗争中出现过：例如尼泊尔毛派的“人民战争”和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PKK）。

国际上对这些激进运动的报道很快就集中在妇女持枪和游击队战争给妇女生活带来的所谓权力变化上。在尼泊尔发生的变化由李·奥内斯托（Li Onesto）展示，他为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报纸《革命（Revolution）》撰稿，他可能是 1999 年第一个进入游击队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在印度，这样的人则是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就在我在贾坎德邦第三筹备委员会（TPC）占领地区见到那些毛派妇女之后，他到恰蒂斯加尔邦的丹达卡兰亚地区的根据地游览了 10 天。这些声音告诉世界——用奥内斯托的话说——武装斗争如何“像打开了监狱的大门似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冲上前去，要求在战争中获得平等地位。”^[2]现实比这更复杂，但情况往往如此。^[3]

乡村的妇女对于为纳萨尔派提供后勤支持至关重要——提供食物、充当信使、在家中照顾生病的同志，甚至掩护游击队。她们在纳萨尔派组织的抗议活动中也很关键，经常被安排在集会的最前线，因为如果有妇女

和儿童在 frontline，抗议者就不太可能受到攻击。在该国的许多地方，纳萨尔派在乡村建立了妇女组织，要求农业工作的平等工资，为收集黑木柿叶寻求更高的工资，示威反对高种姓男子对低种姓妇女的强奸。

在妇女中多年的艰苦工作让毛主义者们的训练出了一些女战士，并为她们能够在战斗中带领队伍而感到自豪。在某些区域——例如恰蒂斯加尔邦的丹达卡兰亚地区，那里的人们除了被赶出家门和加入毛主义军队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妇女出于与男子相同的原因，连夜跑去加入游击队。民团——和平行动（Salwa Judum）^[4]或被称为“净化狩猎”，以及随后的其他团体——正在焚烧村庄、强奸和谋杀那些留下的人。与这些地区的阿迪瓦西男子一样，妇女们无处可逃，要么去印度政府在路边建立的难民营中过和监狱没有差别的残酷生活，要么越过边境逃到另一个邦，要么与游击队一起在森林中游荡。许多人已经有孩子、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在游击队中，流动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具吸引力的选择。

在阿迪瓦西毛主义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尽管存在毛派的妇女组织，但拿起枪的妇女人数很少，她们的参与往往是短暂的。大多数加入武装队伍的妇女都很年轻——很少有超过 20 岁的，而且她们在游击队中呆的时间往往不超过一年。少数在地下活动时间较长的阿迪瓦西或达利特妇女，通常是因为她们嫁给了高种姓领导人，最终因为待的时间较长被赋予了领导职位。

例如，来自印度南部的西玛（Seema）可能比我更像待在贾坎德邦的外国人，因为她不太会说当地语言。虽然种姓低，但她显然来自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英语说得很好。

多年来，西玛一直在安得拉邦一个大城市的邮局担任职员，同时作为一个人权组织的成员，动员贫民窟居民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当安得拉邦的镇压加强时，她所参加的组织因被识别为毛主义阵线而遭到禁止。尽管她试图以文职工作作为掩护，继续在城市开展这项“地上”工作，但她的朋友却被逮捕和杀害。40岁的西玛被纳萨尔派领导层派往相对安全的贾坎德邦森林，以加强那里的社会运动中的妇女部分。

多年来，西玛一直在安得拉邦一个大城市的邮局担任职员，同时作为一个人权组织的成员，动员贫民窟居民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当安得拉邦的镇压加强时，她所参加的组织因被识别为毛主义阵线而遭到禁止。尽管她试图以文职工作作为掩护，继续在城市开展这项“地上”工作，但她的朋友却被逮捕和杀害。40岁的西玛被纳萨尔派领导层派往相对安全的贾坎德邦森林，以加强那里的社会运动中的妇女部分。

我在拉尔冈呆了六个月后，终于第一次见到西玛。我很好奇，因为我知道像她这样的女性很少。在那之前，我只见过像科利的妹妹安珠那样的年轻女性，她们在运动队伍中短暂逗留。在我遇到的年轻女性中，只有两个人在毛派中呆了一年以上，而且都没有超过五年的时间。

我第一次见到西玛是在我家附近的森林里。我错过了她前两次对该地区的访问，因为她只在该地区停留过一两天。就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她必须不断移动以保护自己。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她正在阅读阿什拉夫·德哈尼（Ashraf Dehghani）的《伊朗的酷刑和抵抗》。^[5]她说，在伊朗国王的独裁统治下，一位女游击队员因其政治信仰而遭受酷刑，这些回忆录就像一本圣经；它们将在未来的困难时期给予她勇气。

西玛后来透露，她刚刚收到一位被捕的女游击队员的来信，她说，在折磨人的审讯过程中，警察向她询问了西玛身上的每一道伤疤、脸上的每一颗痣以及手掌上的每一条线。除了电击、殴打和其他酷刑手段外，警方常用的一个手段是透露他们已经掌握的关于游击队同志的部分信息，以便从新被捕的人那里获取更多细节。

当我靠近她时，西玛正站在一棵硕果累累的番石榴树下。她把她灰白的头发扎成了马尾，穿着休闲黑色运动裤和一条栗色棉布长库尔塔^[6]。她在安珠和其他六个女孩身边向一位驼背瘦削老人和一位我以前在村子里见过的九岁漂亮女孩告别。

西玛说那位老人是小女孩的爷爷，也是小女孩现在的监护人。她的父母两年前死于疟疾，他来带他的孙女回家。

老人说他的小孙女还太小，还不适合跟丛林政权呆在一起，而他也需要她来打水和做其他家务。西玛沮丧地看着我，“我没法留住她，所以我让她乖乖跟爷爷回家。”

我们一起坐在番石榴树下。西玛告诉我，她整天都在想，自她上一次到这个地区以来的三个月里，哪些女孩加入了妇女解放阵线，哪些女孩离开了，都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不确定要不要告诉她，就在前一周我还在一位队员父母家里遇到两位队员。女孩们说她们生病了，离开了妇女解放阵线几天。但我见她们都穿着纱丽和廉价珠宝，涂着大红口红，为每周的赶集日^[7]做准备。她们见到我很高兴，还让我帮她们披上纱丽。

“我以为你们都生病了！”我惊叫道。屋主莎维德丽（Savitri）说她们四个生了病，在她家养病。她们都恢复了，其中两个人离开，而这两个还留在这儿。

离开的两人中，一位是住在小山村里的阿迪瓦西女孩比尔佳（Birjia），她已经回到妇女阵线。她加入纳萨尔派是因为父母去德里当建筑工人后，她在家十分孤独。她生病时来到莎维德丽家中休养，病好就归队了。另一位阿迪瓦西女孩是阿加里娅（Agharia），她在妇女阵线已经工作了四个月，来莎维德丽家里康复，病好后和她的堂兄弟们一起去西孟加拉邦砖窑干活了。第三个女孩普拉蒂芭（Pratibha）则说她有一种撕裂感。她想回到妇女阵线，喜欢和她们住在一起，但担心这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她说她兄弟兰吉特（Ranjeet）就在某个排里，他和丛林政权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他甚至不再承认他们的父母。她说，看到他对他们置之不理让她真的很伤心，她不想变得跟他一样。

“我以为你们都生病了！”我惊叫道。屋主莎维德丽 (Savitri) 说她们四个生了病，在她家养病。她们都恢复了，其中两个人离开，而这两个还留在这儿。

离开的两人中，一位是住在小山村里的阿迪瓦西女孩比尔佳 (Birjia)，她已经回到妇女阵线。她加入纳萨尔派是因为父母去德里当建筑工人后，她在家十分孤独。她生病时来到莎维德丽家中休养，病好就归队了。另一位阿迪瓦西女孩是阿加里娅 (Agharia)，她在妇女阵线已经工作了四个月，来莎维德丽家里康复，病好后和她的堂兄弟们一起去西孟加拉邦砖窑干活了。第三个女孩普拉蒂芭 (Pratibha) 则说她有一种撕裂感。她想回到妇女阵线，喜欢和她们住在一起，但担心这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她说她兄弟兰吉特 (Ranjeet) 就在某个排里，他和丛林政权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他甚至不再承认他们的父母。她说，看到他对他们置之不理让她真的很伤心，她不想变得跟他一样。

过了一会儿，莎维德丽把我拉到一边坐下，告诉我她压根没病，她只是得了“相思病”。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爱上了一个四十公里开外村庄的男孩，她两个姐姐的丈夫都是那个村的。这个男孩曾向她求婚，但她母亲拒绝了这桩门当户对的亲事。她的母亲说这个男孩的村庄被诅咒了，她的一个姐姐被判为女巫，死在那里；另一个姐姐也过得相当不开心。当莎维德丽把她父母的意见告诉男孩时，他立刻娶了另一个女孩。这使普拉蒂芭非常伤心，饭也吃不下。她母亲的哥哥是毛派部队指挥官，

他发现莎维德丽情绪低落，就建议她加入妇女阵线，改变一下“环境”。这看上去是个好主意。

她是从妇女阵线请病假回来的，但她告诉我，她实际是利用病假机会去男孩的村庄看他。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他声称他会为了她离开他的妻子。她回家向母亲坦白，母亲说她不能被他“养”着，不然她总是会被当成他第一任妻子的替代品。她深入思考了她自己的情况，得出结论，她母亲说得确实很对。但她非常难过，因为她仍然爱着这个男孩。

我问普拉蒂芭现在要做什么，她说她要回妇女阵线，因为这让她至少可以忘记那里的男孩。但她一样被撕裂了，因为她知道父母在家里有多需要她。她的母亲几乎失明，父亲包办所有家务，而村里每个人都批评她抛下父母，加入纳萨尔派，然后除了“发胖”什么都不做。她说她体重确实增加了，她曾要求当地江湖郎中给她开一些减肥药，但他告诉她没有这种东西。

西玛不了解这些女孩的去，我也不确定在不破坏她信心的前提下能透露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转而问她比妮塔（Binita）的近况，我几天前在附近村庄里刚见过她。

比妮塔穿着一身亮闪闪的鲜红纱丽，正在给她刚出生的儿子喂东西吃，她叫他“比斯波特·奥朗（Bispot Oraon）”，比斯波特在当地语言里是“爆发”的意思。她漂亮的耳朵被挂着的仿金耳环拉长，胸前挂着一

一条类似图案的项链。她来自贾坎德的另一个行政区，在村子里显得不太合群，也是少数几个在毛派妇女解放阵线工作了一年半的女孩之一。她为毛派服务的时间足够长，长到允许她让她在部队里的爱人成为一名父亲。

我知道她孩子的出生对纳萨尔派而言是个麻烦。虽然行伍中出生的孩子并不罕见，但纳萨尔派领导层的立场是，女战士在斗争中不该生小孩。组织没法照顾他们，他们的存在将对各队安全构成威胁。大多数怀孕事件的结局都是堕胎。但是比妮塔在孕期的前五个月一直设法隐藏怀孕的事实。如果孩子出生了，母亲需要把孩子交给其他人照顾，并最终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很难找到愿意这么干的女性，我也只知道一个。

正如我所怀疑的，西玛说比妮塔将离开纳萨尔派，不久后将带着她的孩子回老家。她试图保持乐观，她说这些女性——曾经在队里生活过的女性——仍然是纳萨尔派在村庄里的重要支持者。她们提供食物，充当可靠信使，提供安全屋。在比哈尔邦，有很多关于这些女性的故事，她们在警察镇压下保护没有地方去或者来不及转移的纳萨尔派领导人，假装床上的是她们丈夫。

不过，西玛并没有否认育儿问题的存在。“妇女在分娩后离开是我们招募女性的一个主要障碍，”她说。我知道这是这种运动的常见问题。也许让父亲也参与育儿有助于解决妇女脱队的问题？

西玛和我一直聊到深夜，好似我们是许久未见的亲姐妹。她告诉我她有多么钦佩吉安吉这样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对妇女问题比较敏感，也对重新思考性别关系持开放态度。她说，他鼓励领导层用自己的行动改变对妇女的应对方式和态度，并积极探索解决纳萨尔派内部的两性平等问题。但她说，像吉安吉这样的男人很少。

大多数领导层男性很难处理好性别平等问题。总有其他更重要的战争事务。所以，除非是为了表彰一位优秀的女战士，性别问题最好都留给了女性自己。这就是性别不平等的延续方式——承认性别关系作为“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并为女性设立一个单独部门，由女性领导和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和两性关系太容易被隔离起来，变成一个次要问题。

参考

- ^一个以比哈尔邦，贾坎德邦为主要根据地的毛派妇女解放组织， ，印汉大词典 p1190, p147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ri_Mukti_Sangh
- ^Li Onesto (1999) 'Report from the People' s War in Nepal.' Available at <http://web.archive.org/web/20050104155223/http://rwor.org/s/dispatch-e.htm>. Last accessed 16 September 2017.
- ^要进一步了解尼泊尔的情况，参见 Judith Pettigrew and Sara Shneiderman (2004) 'Women and the Maobaadi: Ideology and Agency in Nepal' s Maoist Movement,' *Himal South Asia*, 17 (1): 19-29.
- ^ ,贡蒂语，恰蒂斯加尔邦的一个反毛派民兵组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lwa_Judum
- ^Ashraf Deghani (1978) *Torture and Resistance in Iran: Memoirs of the Woman Guerrilla*, accessibl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022120534/http://www.ashrafdeghani.com:80/books>
- ^kurta/ , 南亚一种宽松的无领衬衫，印地语汉语大词典 p349
- ^haat/ , 赶集日，还可译为印度斯坦地区地一种乡村集市，印地语汉语大词典 p1677

第三节：第六夜

士兵的阴影晃动着。他弯腰想叫醒另一位。换岗的时候到了。毯子下面嘟哝了几声。“起来了！起来了！”士兵压低声音说道，但接班的没应声。

“好啦，”他提高了声音，语气也更加烦躁。毯子下裹的那一团最后还是踉踉跄跄地爬起来，嘟嘟囔囔地发着起床气。他会不会在放哨的时候又睡过去？而无论这边吵得再厉害，其他睡着的人仍然一动不动。

我变得愈发沮丧，我知道我必须休息好了才能应付明天的跋涉，但我就是睡不着。我的脑子就是没法停下来，我止不住地回想起西玛和索玛尔。

月光下，吉安吉的面庞显得很黑。躺在我们之间的科利为了取暖而蜷缩在吉安吉的毯子里，我看到科利的侧影翻了个身。如果他和毛主义者呆在一起，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呢？他会不会在长大后对女性持有一个比他的拉尔冈阿迪瓦西家庭更大男子主义的态度？

我感觉像是睡在石头上一样。我回忆起吉安吉和我曾讨论过一种青年聚会用的宽敞泥屋，这种屋子被恰蒂斯加尔邦的穆利亚^[1] (muria) 和贡德^[2] (gond) 阿迪瓦西人称为“戈多 (ghotul)”，被贾坎德邦奥朗 (Oraon) 和蒙达^[3] (Munda) 阿迪瓦西人称之为“杜姆库里亚 (dhumkuria)”。对青年而言，这是一座神圣的部落建筑，维瑞尔·艾温 (Verrier Elwin) 称之为“青少年共和国”。这种建筑在许多村庄都存在，男孩女孩到这里来唱歌跳舞、讲故事、组织乡村节庆、分配任务、有时还在这里一起睡。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赞成戈多；我们反对婚前性行为，因为这样的关系不负责任，除了自己的选择自由之外什么也不考虑。”吉安吉曾这样说道。我试过为戈多辩护，解释这不是他说的那样无法无天，还是有一些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的规则的。而且，婚前性行为又有什么错呢？

我尝试把吉安吉叫醒来讨论我脑子里的这些想法。向他指出加入毛派的阿迪瓦西青年之间恋爱关系的潜在好处，也许游击队恰恰提供了戈多在阿迪瓦西社会中所占据的生态位。我想证明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也许在事实上给恋爱和婚姻中的阿迪瓦西妇女相对于高种姓而言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和尊重。我想问问他，在一个对妇女限制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有多少女性是因为爱上了游击队里的男人而与游击队一同生活。如果他们这段关系不满意，他们也能离开他们的伴侣，这也是一种好处。所以，我抛出了这些观点。

“乱搞男女关系”，吉安吉半梦半醒地嘟哝道。我察觉出这就是他的睡眠方式。我能和他半梦半醒地聊上一整晚，而他第二天早上不仅能记得整段谈话，还会说他睡得很好。

我有点生气，问他为什么不能赞许纳萨尔派无意中为自愿性-爱关系创造的空间，为什么他在这些议题上一副道家嘴脸。我不明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你要崇尚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经常谈论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被当成了男性的私有财产

吗？我问。你不认为你尊崇的恩格斯是对的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跨代转移财富的需要，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对女性越来越多的奴役？

吉安吉很明显对我问出这样的问题，说他不懂还小看他而不高兴。

我知道毛主义者领袖担心大众媒体对他们的宣传。男性领袖被指控对低种姓女干部进行性侵。他们希望保持运动的“纯粹形象”，离纵容滥交的印象远远的。毛主义者试图阻断任何恋爱关系，要么把情侣分进不同连队，要么把其中一个人停职冷静一段时间，又或者采用最常见的方式，鼓励他们干脆结婚来让关系合法化。

尽管没有印度教的仪式，但宣誓结婚是纳萨尔派恋爱交往的唯一合法形式。婚姻许可必须向运动领导层请示，并需要证明结婚目的不只出于性，更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才能获得。一旦结婚，人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终身伴侣关系。婚姻是民主的，禁止丈夫和妻子之间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由于战争的需要，夫妻们不得不为长时间的分离做好准备——许多像吉安吉这样的领导人常常六个月乃至更长时间见不到妻子一面。无正当理由的要求离婚等于不负责任和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不优先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如果夫妻之间发生纠纷，其他同志有责任进行调解，确保只有确实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情况下才可离婚。但最终，我对吉安吉说，在这类事件中，存不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往往由高种姓男领导决定，而强调婚姻作为两性亲密关系的唯一合法方式看上去就是在控制女性。

吉安吉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指责我的想法是“机械”的。从他的角度看，我知道这是比较重的批评。我不确定在这个语境下他说我“机械”除了字面上的“通过讨论和分析对立论点和观点以发现真理”之外还有什么意思，

“那教教我怎么‘辩证’”，我反驳道。但他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表示自己要睡回去了。我都还没心思问他纳萨尔派对同性结合的看法呢，我想我知道那里不会有我想要的答案。

我周围全是熟睡的男人，他们蜷缩在他们收集的毯子下面，相与枕藉，抱团取暖。我觉得冷得要命。我希望西玛能和我呆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谈谈这些事情。西玛最后没能过来和我一起住进索玛尔的房子。这中间一定有她安全上的考量，但我怀疑也有部分原因是这需要男领导的许可。

参考

- ^英文维基，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地区的一个原住民群体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ria_people
- ^中文维基，印度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原住民群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2%E5%BE%B7%E4%BA%BA>
- ^印地语汉语大词典 p1182, ，居住在小那格浦尔等山区的一个原始部族

第七部分：预言

第一节：第七夜

他们告诉我，我最后一夜的行军就要开始了。自我离开比哈尔邦营地那堆喜庆的小帐篷开始，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夜？我想，我也不知道。感觉

就像我已经行军数年一样。当我们无休止地跋涉在印度中部的遥远路途
中时，一种永恒、超越空间的感觉已经征服了我。时间耍了个花招，奇
特地伸展着，仿佛不再存在时间的概念。不同的景象——岩石峡谷、森
林山丘和稻田——似乎融合到了一起。

战争通常有开端、高潮和结束。战争的过程常常被描述成：漫长的百无
聊赖和穿插其中的短暂兴奋。但这种游击战争似乎首先是一种永恒的耐
力行军，我们将自己的存在从一个地方抹去，同时在这个地方生存。在
某些方面，夜行军似乎是长无止境、起起伏伏的，它似乎是纳萨尔派斗
争本身的缩影——它的曲折、失望以及令人困惑的坚持。

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行走。我身体里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疲惫的。我的肩
膀感觉像是累赘，压在我其余的身体部分上。我的腿麻木地震颤。我的
脚一碰就疼。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仿佛说话会浪费我们之间有限的资
源。看来，我们剩余的力量必须都保存下来，都投入重要任务之中。我
试图再次专注于模仿科利的脚步。一只脚接着另一只脚。

我们要穿过一片广阔的农业平原。首先，有一条主要的公路横穿平原，
然后还有一条水流多变的宽阔河流。在雨季，这是一条无法通行的快速
流动的褐色泥浆水，而在旱季，它仅仅是一条涓涓细流，就像现在，它
的深度还无法没过膝盖。

队伍里的人告诉我，只有六七个小时要走了，然后我们会回到贾坎德
邦的森林里，那里是我住的地方，靠近拉尔冈。我知道“六或七个小时”

很可能意味着十或二十小时。我不确定这种不精确的说法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精神状态，还是因为无法判断距离，才导致我们的到达时间不断变化。

我们停在了一片森林中两棵巨大的波罗蜜树下。我们正在等待另一个排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是最后一段路程。我想象着其它的排，它们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许多方向汇集，来自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些排有时会合在一起前进，因为他们都在前往中央枢纽，即贾坎德邦会议的最后营地。

他们向我们走来时，看起来像是一群杂牌军，与我们在雇佣兵匪帮的地盘上遇到的纪律严明的队伍截然不同。在他们中间有一匹蓬头垢面、凌乱不堪的马。当科利看到帕拉斯吉在这个排里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帕拉斯吉多年前曾与科利的父亲结为好友，科利曾恳求帕拉斯吉带他进入丛林政权。

是帕拉斯吉想出了招募一匹马来运送受伤的战友的主意，但科利和其他年轻人一看到这匹动物就笑了起来。它又矮又壮，与其说是马，不如说是小马驹。科利说，它永远无法爬上我们在拉尔加昂的丘陵森林中遇到的岩石小径。帕拉斯吉还没敢自己骑这匹马，尽管他自己一瘸一拐的。他的右脚背上有一个粗糙的巨大伤口，上面贴着一个肮脏的绷带，绷带已经开始散开。

然后还有另一个惊喜。排里有七个女人。其中四个不超过 16 岁，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是 12 岁左右。两个人穿着纱丽，显然是 20 多岁。其中一人背着一个婴儿，用披肩束着。他们都没有穿迷彩服或携带武器。我被告知，这些人来自儿童文化部和妇女解放阵线。我们排的一个人向她们跑去，从他母亲手中接过了那个男婴。“这是孩子的父亲，”科利说。

我认出了带领他们的女人是塔拉，她是科利温柔的大表姐，有一张引人注目的心形脸，科利的姐姐和小表妹都曾跟随她参加过游击队。即使对一个阿迪瓦西人来说，她也很娇小。她在五年前加入了游击队，当时她爱上了一个经常去她家的排长。这对夫妇现在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孩子被送到了阿迪瓦西旅社。这让塔拉深感难过。我们以前曾谈过她的情况，她说她感到被困住了。她现在不能离开游击队去照顾她的儿子，因为安全部队会追捕她，有太多的警方案件指控她。

当帕拉斯吉走到我们面前时，我看到吉安吉用不易察觉的眼神指向女孩们，向帕拉斯吉询问她们的情况。帕拉斯吉耸了耸肩，回答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妇女们坚持要来参加贾坎德邦营地的庆祝活动。他说，怎么能让她们失望呢？你知道她们对这种地形了如指掌，难不成你还能告诉她们走一晚上太危险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聊天。太阳刚刚落山，我们需要开始行进。帕拉斯吉和他的护卫在我身后排成一排，他的其他排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组成游击队所说的“连”。现在我们有八十人以一路纵队行走。我们对我们的

所有人的行动速度和纪律印象深刻。在两个半小时里，我们只停了一次，是为了小便。

一群年轻人早先被派往前方为我们准备晚饭。我们的人数太多，不能给一个村庄带来负担，所以决定我们自己做饭。这些年轻人从村里的一个店主那里买了大米和豆子，并拿到了当地小学厨房的钥匙。他们用大桶和炉灶做饭，这些炉灶在白天被用来给孩子们提供“免费午餐”。

吉安吉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激烈的反封建斗争中，一位勇敢的纳萨尔派女领导人在这个村庄被安全部队杀害。为了纪念她的殉难，纳萨尔派建立了一个纪念馆，也建了这所学校。虽然那个混凝土金字塔式的纪念碑现在不过是一堆破碎的瓦砾，但它的痕迹仍然存在。然而，纳萨尔派建立的学校已被政府接管，所以它现在看起来就像该地区的任何其他公立小学一样。

当我们到达时，食物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帕拉斯吉把我叫过去，给了我一盆水，让我在吃饭前洗手；无论我们是否在行军，基本的卫生都要遵守。令我惊讶的是，这水是温的。他说，他总是尽量用温水洗手，否则手就会出现裂纹。即使在这些完全疲惫的紧张时刻，帕拉斯吉也很关心他的手！

我走到打饭区去帮忙。我想和正在分发一盘盘米饭的新排长谈谈。他说：

“你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遇到的一位女士。她说的英语就像你一样。”

我很好奇，请他告诉我更多。他说她是欧洲人，但嫁给了一个古吉拉特人，他认识她是因为他绑架了她以求获得她丈夫的枪。

我发出了一声惊呼。我在我的奥地利朋友的绑架者身边端着米饭和豆子。我责备他把这个可怜的女人从她在农村的家赶到城市。我问道，绑架不正是那种将纳萨尔派与罪犯和恐怖分子划上等号的重罪吗？他同意，但他说他们当时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需要那些枪，并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尽力以“五星级客人”的身份对待她，确保她不会面临任何形式的不适。他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尽管这件事让我的奥地利朋友感到害怕，但她还是因为那一晚与他们的接触，对纳萨尔派产生了好感。

大家花了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吃完饭，并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了学校里的原处。我吞下了木豆和大米。最简单的一餐，在经历了从那天早上开始的空腹艰苦跋涉后，已经变成了一场盛宴。我回想起，在比哈尔邦的森林城市营地，在我们离开的的前一天晚上，普拉桑特嘲笑我。他说，如果我继续像老鼠一样吃东西，就不可能在未来的长途跋涉中生存。他是对的。我现在需要吃大份的大米。我的饭量没有其他人那么多，其他人的食物已经堆成了小山。尽管如此，我现在的饭量至少是我在开始行军前的两倍。

我用手压水泵洗了手、洗了盘子，然后去和其他几个刚到的人谈话。我和塔拉一起在学校长廊里坐下，但我刚坐下就累得立刻睡着了。

十点钟的时候，我被点名的声音弄醒了。吉安吉向我保证，这确实会是最后一段路程了。我们只需要再花四个小时穿过平原地区，就能到达拉尔加昂附近安全的林地。

我们一步接一步地走着。突然，我的脖子抽动了一下。我的脑袋压倒在我的胸口。我意识到我走着走着就开始打瞌睡，于是突然惊醒。我的眼皮子直打架，我努力睁着眼睛走路。我的脖子又一再抽动。

游击队员管这叫做“瞌睡行军”。他们都能做到瞌睡行军。他们几个月之前跟我说起过这事，而我那时并不相信他们，对此嗤之以鼻。很难想象，现在我也开始以如此相同的方式生活，跟他们一样在走路的时候打瞌睡。我还从没体验过这种走路方式。我的脑子毫无意识，意识像是转移到了我的脚上——它们仍在机械而一致地一步一步向前走。我的脚似乎自己就能感觉到脚底凹凸不平的土地，根本不需要依赖眼睛或者大脑。

四个小时之后，显然出了些问题。我们本应已经深入密林之中。吉安吉从第三个小时开始就有点焦虑。显然，我们穿越这块地区的路线并不是游击队常走的路。

另外，这块平原上有两个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营地，至少驻扎了一千人的安全部队——他们是训练有素的突击队，专精于反恐、丛林战战术。他们在这片区域开展“控制演习”，进行定时巡逻、设置埋伏，以便清扫这片区域并消灭游击队。

维卡斯领着队伍。吉安吉频频招手把他召回。每次，维卡斯都保证，一切都可控，前方探路兵走的路是正确的路。然而，显然有些地方不对劲。

我对吉安吉感到不满。他似乎对维卡斯的态度太过宽容了。维卡斯知道他正在往哪走吗？他是不是故意带偏路线？警方的埋伏不就是这样安排的吗？我们似乎是坐以待毙。

此时，帕拉斯吉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对维卡斯的疑虑。他看见我比较努力才能跟上队伍，于是提议让我骑马。我想要抗议，我不想把我的行动能力托付给动物。然而他坚持要这么做。我实在太累了，不再抗议。不管怎样，在这个时期，我也不确定我需要什么，也许别人比我更清楚。于是我放弃了，同意骑马。

马鞍实际上是一叠毯子，而马镫则是用麻绳连起来的两个圈儿。这算不上舒适，但是悠闲地骑在这匹马上摇晃肯定能让我清醒。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砰”的声响。马冲出了队伍。我心跳到了嗓子眼。这几秒钟里，我用腿夹紧马身两边，徒劳地拽着缰绳，然后用手臂抱着马脖子，拼了老命坚持着。就当我的脚快要掉下马镫的时候，又传来了“轰”的一声。

科利跑到我身边，抓住缰绳，把受惊的马拉住。然后他帮我下马。

人们都在喊：“快跑！”

科利说：“姐姐，我们走。”于是我跑了起来，试图跟紧他。这一夜的早些时候我一直差点在走路的时候睡着，我根本想不到我居然还有体力

奔跑。我现在才明白——如果你觉得有一伙带武器的人在追你，你就有力气奔跑。我被吓得有点不适。

周围许多人停下了脚步，飞身扑倒在地上，卧倒在田埂后面。有些人似乎是在贴地爬行，爬向有芦苇轮廓的地方。我思考着我是不是也应该有样学样。我跟不上科利了，我已经看不见他了。

然后，我听见了印度北部地区的士兵的声音。虽然我不知道这声音是真的存在还是我幻听了，虽然我不知道应该往哪走，但是这声音刺激我跑得更快了。

“所有人回到队伍！”我听见吉安吉喊，然后帕拉斯吉也跟着这样喊。

“别跑了！冷静下来！别散开！”帕拉斯吉得声音穿透空气。

他们说那响声只是一声枪响。也许是丛林里的猎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正在练习射击。他们保证，印度安全部队现在并没有离开营地。

我停下了脚步。游击队员像鬼魂一样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这一队人又排好了队伍。

但是，在刚刚这次慌乱过后，队伍时常散开。每个人都神经紧张。战士们挤在一起，而每组战士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要让 80 个人走在一起很困难，我们很快变成了一堆散漫的流浪者，四散穿过郊野。吉安吉很绝望，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失去纪律，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恰恰就是纪律。这就好像那声枪响击穿了每个人对这支军队的信心。

我始终不知道那声枪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对吉安吉也越发不满——他没有责怪维卡斯，也没有担负起领导队伍的责任。因此，现在许多战士的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然而，我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我集中精力一步一步走路。

当我们进入林地的时候，应当是早上五点钟。我们只能在那儿休息十分钟。然而，人们把包扔到地上，瘫倒在离自己最近的空地上。他们根本不想维持军事阵型。几分钟以内，这支 80 来个人的队伍大部分都睡着了。我惊讶于人们居然可以在这么神经紧张的情况下睡眠。

我在吉安吉身边坐下，明显发觉他对大家都睡着感到惊讶。我知道，一旦停了下来，大家都很难再继续走路。在这样疲惫的条件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走路的节奏。我对自己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闭上眼睛。然而我的眼皮却如同灌了铅一般，不停地下坠。

我被吉安吉的怒吼惊醒了。我从没听过这种声音。他无法压抑对维卡斯的怒火，在一个土堆上对我们喊话。“你们都想死在这篇林子里吗？”他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他说清晨将至，那两个安全部队营地将要派出巡逻队。他们十分钟内就会包围我们，而我们却如此疲惫，任何交火都会非常危险。

我没扛住睡意打了瞌睡，我对此感到很糟糕。然而没时间后悔了。在吉安吉的怒吼中，大家都起身把包和步枪背上肩膀。吉安吉把我们分成三

个排。他说马上就要日落了，不能再一起行动了，我们分开的话会走得更快。

每个排将要走不同的路线回到山里。我现在被告知，我们明天将在最终的营地会合。我失望又无奈，我怀疑是否真的只需再走一天。

每个排都安排了一个新的熟悉路的领队。妇女、女孩和儿童单独成队，塔拉是他们的领队。他们穿着莎丽或者宽松裙，总之不是橄榄绿迷彩服。他们收到指令，要扮作探亲访友和普通村民行进。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可以轻易散开，消失在村民人群里。另一组人由帕拉斯吉带领。吉安吉带着最后一组人，组员大概就是原来那个排的所有人。科利、我、维卡斯都跟他走。后两个排间隔一公里行进，这样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互相支援。

没有道别仪式。没时间搞这个。只有吉安吉一个人说话，他也只是喊出指令。虽然太阳正在升起，但似乎头顶有浓密的乌云。

清晨，我们走到了一个宽阔多沙的河床前。河床岸边有许多突出的陡峭花岗岩大石块。有些大石块甚至比我们都高。水很清澈，甚至可以看到小鱼游窜。我们脱下鞋，把裤脚卷到大腿，调整背包，确保它整个在腰以上。我的腿感到水很暖和、很舒适。脚趾间的沙子凉爽、柔软、舒缓。渡河似乎让所有人都平静了下来，让我们都复苏了。只剩最后一个障碍需要跨越，然后我们就能到达山地。

我们的前方是一条铁轨。远处可以听到火车的声音，但在铁轨和我们之间有一排灌木丛。我们蹲在灌木丛中躲避。火车的喇叭声越来越大，警告动物和人离开轨道。铁轨上的隆隆声变成了轰鸣声。地面在我脚下摇晃，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的疲惫被一股肾上腺素取代了。如果我们被发现了，会发生什么？如果火车上有保安部队怎么办？我该往哪边跑？

当火车转过拐角时，我看到它是一列货物列车。它的蓝色火车头拖着一长排褐红色的车皮，向天空敞开，堆满了深灰色货物：就像我们先前经过的卡车一样，它也在运煤。一节又一节的车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驶过，让我陷入了一种催眠般的恍惚之中。也许总共有 50 辆，它们似乎永无止境。它要把煤运到哪里？送到哪个公司的工厂？塔塔集团^[1]？金达公司^[2]？米塔尔集团^[3]？

我意识到，这些是我在当地报纸上读到的铁轨。自纳萨尔派宣布对该州进行经济封锁的那一天开始，游击队曾多次在这里伏击试图通过的火车。也是在这里，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炸毁了部分轨道。想到我所在的排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在这些铁轨下埋设地雷，就觉得很真实。

当最后一辆车离开视线时，我们继续向前走。我开始看到几棵娑罗树^[4]轮廓，并出现出一块块鲜绿色树林的形状。随着森林向我们逼近，出现了一个小的阿迪瓦西村庄。我们在那里稍作休息，每个人都从井里打水，浇灌他们干涸的喉咙。吉安吉坚持说，只有当我们进入山里一段距离后，我们才会休息。

终于，我们停了下来，我倒在了在一片竹林边长满苔藓的草滩上。紧张感开始离开我的肩膀；尽管我的腿和脚很疼，但我的身体还是放松了。我脱掉了鞋子和袜子。普拉桑特在徒步旅行开始时给我的全新绿色运动鞋现在变成了棕色，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已经穿了好几年了。我的脚和我晒得黝黑的手相比，白得吓人，又湿又嫩。在涉水过河之后，我没有仔细擦干它们。我扭动着脚趾，以恢复血液循环和感觉。

吉安吉在我身边坐下。我问道，你认为维卡斯是故意把我们引向那条路，让我们最后筋疲力尽，倒在那一小片森林里，任由安全部队摆布吗？

没等吉安吉回应，科利端着两杯红茶向我们走来。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绿色的番荔枝，有我的拳头那么大，是他刚摘的。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男孩般的兴奋和热情。他想用他的发现给我们带来惊喜，希望我们能像他一样感到高兴。他灵巧的手指熟练地将果实拉开，露出里面的白色果肉。他把最大的那块送给我和吉安吉，把较小的那块留给自己，他笑着用亮白的牙齿咬住水果，把果核吐在地上。在这个简单的幸福时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它的甜香，把牙齿咬进了它的果肉里。

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一幕成为我对科利最持久的记忆之一。就在那时，我觉得我们终于进入了安全地带。我们又走了一天，进入了游击队的据点，在一个村庄郊外的一个竹制结构上的干草堆下，在黑暗中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晨3点，村民们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们就从我在拉尔冈的家门口走过了。

我们爬上了房子后面高高的山丘。在那里，另一个纳萨尔派的丛林城市一周前已经建立起来了。至少有 500 名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员已经聚集在那里。在最后一座山的半山腰上，当我们走到厨房和用餐区的空地时，我们看到一排游击队员——一个接一个的士兵——在等着欢迎我们。

记忆里接下来的几天是模糊的。我记得吃饭、洗澡、换上普拉桑特给我的红色刺绣长裙，在归还橄榄绿的游击队制服后松了一口气，不再需要记住自己是个男人。我一定是在不久之后倒在了一个帐篷下，被深深的睡眠所笼罩。当我终于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已经睡了一天一夜。

我顺着鼓点和歌声望去。除了放哨的士兵外，所有的士兵都聚集在附近森林的一块空地上，围成一个大圈。气氛很欢快，来自比哈尔邦的各排士兵跃跃欲试，打着朵尔鼓，印度北部的一种鼓，唱着比哈尔语的歌曲。但是，歌曲一首接着一首，我看到一些阿迪瓦西士兵站在一旁，拿着他们的纳格达和曼达，即阿迪瓦西鼓，看着这一切，跃跃欲试。

安吉很快注意到了他们的苦恼并进行了干预。他说，比哈尔语已经够多了，我们现在需要来自南方的歌曲，阿迪瓦西人的歌曲，用那格蒲尔语^[5]和萨德里语^[6]。这让士兵们平静下来。但第二天，科利告诉我，所有的阿迪瓦西人都在谈论比哈尔人接管贾坎德邦的事情，需要确保歌舞的民主。平原和山地之间的断层很难消除。

一天清晨，我在吉安吉、科利、那位绑架我奥地利朋友的人，和其他几个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营地。他们把我送到了索玛尔家附近的树林。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一年半，而我也将在那里度过最后一个晚上。我无法在分别的时刻看着他们的眼睛。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

索玛尔准备了我最喜欢吃的干土豆咖喱和用大米面粉做成的烙饼^[7]当早餐。我沉默地吃完了。然后，她小心翼翼地为我披上一件印有白色圆点的绿纱丽，就好像我是一件易碎的包裹，必须安全地包好才能寄出。我登上吉普车，看着她试图愉快地挥手送别，但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

我试图止住从心底迸发出的啜泣，庆幸自己还有努力挤进吉普车里这项可以让我分神的实际任务。我挤进了 8 个女人中间的一个小座位——这辆车本来只可容纳 4 个人。和她们一样，我现在是一个调整空间的专家——一个人身体前倾，半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靠在椅背上，然后至少一人坐在她的大腿上，别人也效仿这种方式坐在座位上。两个年轻人爬上车顶，坐在车尾，另外两个坐在车盖上，只留下一半的足以让司机看到外面的挡风玻璃。

车主人显然对这辆吉普车感到自豪。红色天鹅绒的图案和酒红色的玫瑰图案被并排印在车顶，一个花哨的音响系统播放着纳格普里亚^[8]的音乐。地面十分干燥，我们在崎岖的路上被弹上弹下，每个人的头发很快看起来就像沾满了强生的婴儿爽身粉一样。我们穿过森林，以极快的速度冲下山坡。我的头开始刺痛，但我知道司机大声鸣笛和大声播放音乐是十分重要的。游击队准许播放这种刺耳的声音，这样他们就能知道是一辆

公共吉普车——而不是一辆警车——正在下坡，从而游击队不会引爆埋在路下的地雷。

我看到，在远远的柏油路开始的地方，安全部队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检查点。至少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聚集在那里，他们拦住了一辆吉普车，那辆吉普车至少比我们早离开了十五分钟。他们把车内所有人都赶了出来，对每个乘客进行搜身，并且打开了每个人的行李。

汗水从我的脊梁上淌下来，我浑身发冷。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笔记本、照相机、麦克风和录音机。我不能在最后失去他们。但令我恐惧的是，我意识到更高昂的代价正在等待着我。我急切地希望自己能被当做本地人放行，也希望因为自己身上的灰尘，安全部队不会把我同其他人区分开来。在这里，一个外地人会立即被认定为毛派的领导人。我没有机会拿出我的英国护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学给我的介绍信，或打电话给朋友。这些人是一群相当难对付的家伙。

在我眼前闪过的是一家废弃的旧油厂，这段时间，这里被接管并改造成了 CRPF 的营地。高高的围墙上设置着带刺的铁丝网，每个岗哨都有三名士兵，他们手持机枪，随时准备开火。这就是人们在路边能看到的全部。里面的构造简直是一种想象的黑洞。人们在那里消失。一旦我被带走，我就会被带到那里。拉尔冈的村民称它为“酷刑中心”。

几个来自拉尔冈的年轻人已经被带到过那里，在被警察正式拘留之前，他们遭到毒打，腿被张开，四肢被打断，并且受到过电击。而一个女人又会被怎样对待？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被送入监狱的妇女的故事简直骇人听闻。她们被脱光衣服。被性侵。被强奸。私处被插入石头。我不禁颤抖了。

吉普车停下了。我不敢抬头。我能看到的只有周围套着黑色靴子的大脚。他们的印地语很难听懂。他们说的话和当地方言萨德里语很不一样。他们都是北方人。

他们命令我们离开车厢。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坐在我旁边的妇女试图“帮忙”，她拿走了我的包。我试图阻止她，但她已经拿着它向那挡住我们去路的三个士兵走去了。我惊恐地看着一个高大的、皮肤白皙、身材魁梧、蓄着浓密胡子的男人把他的来复枪枪托捅进我同行的妇女的身边和我的包里。

她是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大喊着叫士兵小心。我屏住呼吸向他们走去，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是应该在她被扔进警车前宣称行李是我自己的，还是应该保持沉默？

然后我想起，之前我把我的设备都埋在了行李的底部。胸罩和裤子都盖在上面。士兵不好意思再深挖下去，就把步枪从袋子里拿了出来。

我的同行者和我的包转移了那个士兵的注意力，当我径直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没有注意到我。我无声地松了一口气，迅速向乘客们纷纷爬回的吉普车走去。

这是离拉尔冈最近的一个检查站。安全部队正在慢慢地逼近游击队的据点。再过多久，他们就会把通往拉尔冈的公路铺上柏油，并在那里建起永久的兵营呢？再过多久，涌入的外地人就会在拉尔冈地区为了矿业资源建起商业公司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再过多久，村民们就会被被收买、拉拢、明面上“投降”、或者被驱逐呢？我觉得自己见证了这个时代或许最大型的清剿活动，而我现在正在被这奎师那的献祭战车^[9]远远地抛在身后。

参考

- ^印度巨型企业，主营汽车制造，钢铁等
- ^金达钢铁电力有限公司，印度第三大电力供应商，主营电力和煤炭钢铁
- ^米塔尔钢铁集团，世界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
- ^ ， Shorea robusta,一种主要生长在南亚次大陆的常青树
-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种语言，印汉大词典 p787
- ^广义上和那格浦尔语是同一种语言
- ^原文：Chilka Roti。一种印度烙饼，由小麦粉制成。常被当做配菜的主食食用。
- ^Nagpuria。印度贾坎德邦地区。
- ^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第二节：化身

试图重新融入伦敦的生活是很困难的。用刀叉吃饭，观看电影或戏剧，睡在柔软的床垫上，这些都像是陌生的经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事。也许最困难的是穿过路障，与伦敦地铁的工作人员

一起排队进入地铁站。我发现自己在骑着自行车沿着埃塞克斯路时，沿着罗斯贝里大道时，进入霍尔本时，会幻想自己在与科利交谈，面对着吉安吉，想着普拉桑特，与索玛尔开玩笑，仿佛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无论在哪里，我似乎都在寻找可以将我现在的生活和我过去结识的人联系起来的方法。

通往拉尔冈山丘的道路已经铺好，电缆遮蔽了天际线，我在 2010 年参与夜行军途径的那片区域已经被封锁。一个安全部队的营地在拉尔冈设立。印度政府的国家军事力量已经包围了这个矿产丰富的游击区，有些记者、人权活动家和学者试图揭露印度中部的偏远地区和东部的偏远地区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们的声音被越来越被压制。

在拉尔冈，士兵们占领了我曾经任教过几个月书的学校，并在隔壁修建了永久性的兵营。孩子们现在在高墙和带刺铁丝网的陪衬下上课。至少有 500 名士兵驻扎在那里。有人告诉我，很多时候驻扎士兵人数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作为消除“纳萨尔主义威胁”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自 2014 年以来，贾坎德邦的偏远森林修建了 18 个这样的安全部队营地，拉尔冈的营地是其中之一。另有 30 个安全营地计划在 2018 年增设。

与此同时，许多我认识的人——如拉菲克这样的人，在警察的指控下，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在我离开后的六年里，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 (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 声称印度全国有 6000 多人投降。政府提供了丰富的悬赏——通常在 150 万至 250 万卢比之间，对武器的

悬赏则更多——数额取决于纳萨尔派分子的资历和他/她投降时所缴获的步枪。但学者、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表示，很多投降是“伪造”的，而且“投降”的阿迪瓦西人是被胁迫的。

1.在贾坎德邦，国家人权委员会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表示，2012 年至 2013 年之间，超过 500 名与纳萨尔派没有联系的阿迪瓦西青年被迫投降。

2.人权活动家还提出报告，被指控为“纳萨尔派”的 4000 名阿迪瓦西人被关押在贾坎德邦的监狱中，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连续被监禁多年。

3.贾坎德邦警察局长承诺在 2018 年底前“根除纳萨尔主义”。

4.印度政府的行动似乎不惜一切代价。

回到伦敦后，出于绝望，我全身心投入到学术写作和演讲中，不停地分析着一个又一个问题。似乎只要通过把吉安吉、科利、维卡斯、普拉桑特或索玛尔从贾坎德邦的森林中抽象化，就能达到我需要的距离，从而了解他们故事的意义。

2013 年 3 月底，也就是我离开印度东部丛林的三年后，我坐在伦敦北部的书房里，茉莉花香透过我打开的窗户扑鼻而来，这时我收到了一则军事冲突的消息。我最初是在《印度时报》上看到这条新闻的。几乎同时，我的收件箱里收到了来自印度公民自由和人权组织——革命民主阵线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的新闻稿，这封新闻稿传达了

同样的消息。我在一份又一份的印度报纸上读到这件事，我疯狂地搜索互联网，试图拼解出这个故事的谜，尽管我知道通过这些方式，我永远无法得知事件的真实过程。

在于 2010 年 2 月开始的同一旅程中，我与一个规模相似的排从比哈尔邦走到贾坎德邦，十名毛派游击队员在拉卡班达森林被印度安全部队杀害。除了空弹壳之外，警察还缴获了包括一只 AK-47 在内的 7 只步枪、土制炸弹和毛派文学作品。印度安全部队在突袭中没有遭受损失。

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的描述各有不同。有人说，一个雇佣军团与游击队发生了夜间枪战。印度安全部队到达时，双方的伤亡已经很严重了。警方结束杀戮之后，声称该雇佣军团是一支分离出来的毛派组织。与此同时，游击队的同情者声称该军团是受雇于政府的雇佣兵团。我知道这两个故事可能都是对的。雇佣军团的领导成员是叛变的前毛派成员，但他们现在在为印度政府工作。

另有报道说，游击队在当地村庄吃晚饭时被下药。毒药被添加在由炼乳和糖制成的印度甜糖果芭菲里 (bafri) 中，这些被下了毒的食品被一名道路承包商送给了一个游击队员。这个游击队员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分享了食品。游击队中的叛徒很可能充当了这次行动的同谋。他们的哨兵在被下药后昏迷了，游击队就这样轻易地被包围、俘虏，其中有些游击队员遭到杀害。

当我继续读下去时，我的脑中浮现出了三年前维卡斯从承包商那里把玫瑰石榴糖¹⁴带到我们排时回忆的闪光。

还有报道称，在半夜，由印度安全部队和雇佣兵团共 200 人组成的联合营，包围并制服了在树下睡着的三十名游击队员。游击队的排里有个告密者。战斗在凌晨 3 点半开始，两名游击队员不久后战死。到了第二天中午，游击队的子弹打光了，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干涸的河床中，除了投降外别无选择。雇佣兵团和安全部队接受他们的投降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但随后，他们围捕、折磨并枪杀了其中最资深的 9 名游击队员。

从那次遭遇战的新闻报道中，我才知道那个现已死亡的排长的真名是拉雷什·亚达夫。正如报告证实的那样，拉雷什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的面部轮廓分明，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当我在比哈尔邦从“地上”转移到“地下”时，他是第一个欢迎我的纳萨尔派游击队员，并用一瓶滋补液招待了我。在纳萨尔派里，他以他的化名——普拉桑特而闻名。

在这次旅途中是否又出现了一个与游击队作对的“叛徒维卡斯”？

而维卡斯本人怎么样了？在我们的行军结束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当我计划给拉尔冈的人打电话时，我听说维卡斯策反了游击队里的八名年轻人，并带走了排里最好的七支步枪。有传闻说，他现在正在为印度安全部队和一个雇佣兵团工作，被第三筹备委员会 (TPC) 招安并成立了自己的 TPC 支队。有人说，他从开发项目中征税，和毛派作对，并告诉当地人他将用何种手段杀死吉安吉。

然而，维卡斯的下场就如在他之前以同样方式叛逃的其他人一样。我后来听说毛派领导人集结了几个排去消灭他。四个月后，维卡斯所在村庄的一位毛派支持者通知游击队他已经回家。两个排得知上述情报后包围了他的房子并将他活捉。第二天，在附近森林举行的毛派公开听证会上，维卡斯被指控为警方的告密者和某一个雇佣军团伙的头目。他在纳萨尔派“人民法院”接受审判，被判有罪并由行刑队执行死刑。

正如吉安吉所说，毛主义者在这个世界——孕育了维卡斯这种人的世界中总是处于危险之中。2013年3月，普拉桑特被杀，很可能就是因为有另一个“维卡斯”，一个来自毛派内部的线人，协助了警方和一个雇佣军团伙。

在严酷的国家镇压下，革命游击队很容易沦为暴力运动组织，特别是在他们不再是一个群众基础广泛、关心当地人民的组织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培养，破坏，再创造吉安吉口中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条件会越来越成熟。

然而，不是每一个毛派培养的人都会像维卡斯那样背叛组织，必然有其他人选择走上不同的道路。2013年的一天，我打电话给索玛尔，她告诉我，年轻可爱的科利曾在当年雨季时回到了村子，但在某天晚上又消失了。科利曾在夜间行军时担任我的保镖，为我提供了温柔体贴的照料。也许他回到了纳萨尔派的部队里，被派往了另一个地区。也许他和一些朋友一起离开了，前往邻近的恰蒂斯加尔邦的一家工厂工作。

他的父母并未得知他的去向，并在此后一直担心着他的命运。科利会是在变成一具镇压中被杀害的尸体后被归还给父母吗？亦或是他会和许多建筑工人一样消失不见呢？依我的经历判断，科利应该会继续留在游击队里。他似乎有潜力成为吉安吉那样的领导者。但事实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

索玛尔也曾因为合伙人的前妻对她和她的丈夫提起的诉讼而在监狱里呆了三个月。她不得不把我和她住在一起时出生的最小的女儿带进监狱，因为她只有三岁，家里没有别人照顾她。与此同时，安全部队的军营从平原慢慢向山区里推进。一个驻军营地就在索玛尔的房子附近。

索玛尔还皈依了一个印度教的精神教派，该教派在该地区不断扩张。以她为代表的部分老一代阿迪瓦西人反对他们的（旧）世界被游击队迅速撕裂——正如他们的儿子和侄子离开家成为像维卡斯那样的威胁，以及毛派无意中带来的政府安全部队。索玛尔通过加入这些精神教派来改变自己，这也许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但她企图通过这种精神寄托把碎成一地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拼回一起。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与极左势力（毛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派很可能会被极右势力——印度教教徒所吸纳。

那吉安吉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在那次夜行军的几个月后，我在一份印度报纸上读到，警方包围了贾坎德邦某座城市的一间房子。他们窃听了吉安吉的电话（他的一名助手背叛了组织，成了警方的线人）。为了见妻

子一面，吉安吉牺牲了自己的安全离开了森林。当他的妻子为了回家而与他告别后不久，他就被警方逮捕了。

吉安吉经常批评其他人采取的有可能给运动带来风险的（个人）行为；所以，他最终屈服于同样的压力，这一结局令人吃惊。归根结底，吉安吉不可能完全脱离他的家庭，而只在纳萨尔派游击队社区中实现他的理想，就好像他们的历史不能只在一个岛上创造一样。

那所房子的房东肯定在吉安吉被捕后立即通知了他的妻子。吉安吉的妻子凭借（高超的媒体）战术技巧和敏锐感知，立即将吉安吉的故事广泛传播，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刊载和播出，有意挽救他的生命。尽管这可能意味着向全世界展示吉安吉是一个“被抓获的恐怖分子”；尽管这并不能阻止警察折磨他；尽管这能让他免于安全部队的谋杀，但他最后的结局也很可能被官方有意地、错误地描述为在一次暴力的“意外”中被杀。

关押吉安吉的监狱的条件之恶劣令人震惊。从在那里工作过的村民口中，我得知几百名囚犯共用两个厕所是很常见的。那里的供水不可靠，而且被铁锈污染了。监狱当局和提供食品的承包商狼狈为奸，企图在黑市上出售供应给囚犯的食品以中饱私囊。而留给囚犯们的大米和木豆与其说是谷物，不如说是沙砾。在狱中，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铺睡垫的地方，都需要通过贿赂获得。但监狱一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被重新思考、重塑和激活的地方。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吉安吉正在被转移到贾坎德邦、比哈尔邦和恰蒂斯加尔邦的监狱，他将在那些地方等待接受印度政府对他提出的大约 40 项指控的审判。这些指控包括在逮捕时持有武器和策划伏击，以及 2010 年在恰蒂斯加尔邦的丹达那拉尼亚参与杀害 75 名中央预备警察部队 (CRPF) 人员的行动。但他曾告诉我，他从未去过恰蒂斯加尔邦。

吉安吉将面临终身监禁或死刑。

(全书完)

参考

. [^gulab jamun/](#) ,一种甜点, 印汉大词典-P430,P555